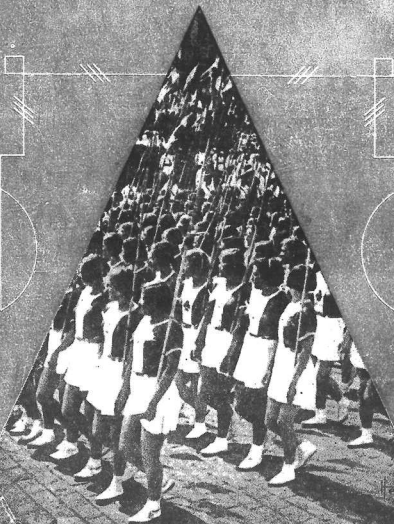


二之書叢活生女婦

# 論女婦新

譯合理 羅 九茲沈 著泰崙柯



婦女生活叢書之二

# 新 婦 女 論

柯 崙 泰 女 士 著  
沈 茲 九 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 譯者序

柯崙泰這個名字在中國，已不是怎樣生疏的了。她的文學名著：如赤戀，三代戀愛等，早已介紹到了中國，為青年們所愛讀；而這本說明婦女解放路徑的論著新婦女論，到如今却還沒有人介紹過。

譯者過去讀了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一書，覺得這確是一部研究婦女問題的聖典，可惜它只有將歐戰以前的婦女生活史，唯物地告訴了我們，使我們知道了過去婦女的光榮與慘痛的史跡；而對於婦女的真正解放，它只告訴了我們該採取怎樣的奮鬥方策。我們不能在那本書中，看到新婦女們勇敢地鬥爭的實際經驗和成功的史跡，這確是一個遺憾；因此，譯者便想到了柯崙泰女士的這部新婦女論，它正好來填補那個空白。所以，就決定抽空把它譯出，獻給讀者。

本書內容，計十四章，是柯崙泰女士在莫斯科斯凡陀洛夫大學教授婦女問題時的講義。

本書的中心宗旨，是在說明：「婦女的地位，常由於她們經濟的職務來決定的。」

她根據這個宗旨，首先將婦女的生活史，簡明地加以通俗的敘述外；最重要的，她還在後四章告訴我們：婦女要成爲社會中有用的勞動單位，除出政治革命外，還得伴以生活習慣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不然，即使有政權握在手裏，仍舊是空洞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即普設合作社、公共住宅、託兒所，提倡社會教育兒童，切實保護母性等，來解除婦女生活上的重担。隨着生活的變革，過去對婦女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觀念，也跟着淘汰了。現在誰都不否認蘇聯婦女是過着真正的新生活，做着真正的社會份子。然而這種勝利是經過一個極大的犧牲與奮鬥才獲得的啊！



中國婦女大眾，是生活在次殖民地裏面，受着雙層的壓迫：除國內數千年來舊禮教的束縛外，還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在現階段上，中國婦女運動的唯一目的，還是反封建和抗帝，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從這一點說來，蘇聯婦女的鬥爭經歷實在值得我們加以虛心的學習。

本書前六章是由羅瓊先生譯的，後半部是由譯者來完成的，全書由譯者校過一遍。所以，雖係兩人分譯，但語氣和名詞的譯語都是統一的。不過大家都在匆忙中譯出，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此外原著者尚有一篇精粹的序文，因了環境的關係，沒有將它介紹過來；這些都希望原著者和讀者原諒並指教的。

茲九 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544.5  
239

2

1

## 目次

譯者序	一
第一章 原始共營共享時代婦女的地位和職務	一
第二章 奴隸經濟中婦女的職務	三七
第三章 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下的婦女	五一
第四章 行會手工業生產及共有體農業下的婦女勞動	六六
第五章 商業資本發展期和手工業作坊初期的婦女地位	九六
第六章 大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婦女勞動	一二九
第七章 婦女問題的成因	一五一
第八章 女權運動和女工的參加社會鬥爭	一七五

第九章	世界大戰與婦女勞動·····	二〇七
第十章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	二一四
	一 勞動的組織·····	二一四
	二 勞動條件與其保護·····	二四三
第十一章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	二四三
	一 勞動條件與其保護·····	二四三
	二 勞動條件與其保護·····	二四三
第十二章	生活的革命·····	二五九
第十三章	道德的革命·····	二八三
第十四章	婦女問題的展望·····	三一

## 第一章

### 原始共營共享時代婦女的地位

婦女在社會、在家庭的地位，和經濟的發展階段，有着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

所以從事領導女工和農婦進入新的經濟形態——新的經濟生活——建設中的人們，有理解這種關係，清楚地了解這種存在的必要。但從事這種工作時，你會碰到反駁的論調，他們會說改變婦女的地位和生活條件，完全是不可能的空想，他們認為婦女的那些不平等條件，完全從性的特質而來的。當婦女要求男女平等，要從家庭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鬥爭，向兩性關係中爭取較多的平等權利的時候，他們就常會搬出那種陳舊的爛調：婦女的無權利，不平等，乃是歷史所決定的，婦女的不能獨立，必須隸屬於男子，不論何時，而且是永久地存在的。

對於這種的反駁，最好是歷史自身，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引證過去的事

實，依據這種事實，而得出結論，那比任何反駁都有力。如果我們翻開幾千年前的人類社會蒙昧時期的史實來看，我們知道那時婦女完全被認為和男子具有同樣價值的人類，甚至有一個時代，婦女反被認為有某種特定的優越權。所以男女的不平等，和婦女的隸屬於男子，並不是永久地不變地存在的。並且當我們仔細觀察婦女地位在各社會發展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近代婦女之所以在家庭與社會中，不能和男子享受同樣的權利，不能獨立生存，都與婦女自身生理特性無關；這絕非因為婦女的智力比男子低劣所致。使婦女缺乏權利，不能獨立，和不能平等的真正原因，不是婦女的自然特質；相反的是她們在社會中所負擔的勞動性質。倍倍爾在婦人與社會第一章中，曾說：婦女在生產中的職能和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有着非常密切的有機的聯繫。這是經濟的社會的法則，我們有將牠弄清楚的必要。這樣對於全部的婦女解放的任務，和與此有關係的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還有許多人，他們似乎認爲人類在過去的野蠻時代，婦女所遭遇到的壓迫，比現在更厲害，在那時候婦女會是徹底的奴隸。這是錯誤的。認爲婦女解放是同文化和知識相關聯，在文化較高的國民中，婦女才能獲得較多的自由。這種想法，無疑地也是妄想，只有布爾喬亞學者才如此說教。我們知道婦女要獲得自由，獲得解放，決不是靠文化和教育，只有使她們參加——全社會勞動的集團力量——有用的生產勞動底經濟組織，才能夠把婦女澈底解放。這種經濟組織不是別的，就是真真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

婦女的地位，常是依據各時代的經濟發展所給與她們的義務而決定的。在上古原始共營共享時代，無所謂「私有權」；在人類分着極小集團而生活的時代，無所謂性的差別，男女的不平等。他們的生活靠着狩獵與野生植物和果實而維持。在這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前的原始時代中，男女間的職務，並沒有什麼差別。當人類生活在比較低度發展的時候，——即人類還靠狩獵而生活的時代，婦

女的肉體，根據人類學者的研究，它的敏捷和有力，同男子的肉體，並沒有多大差別。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趣，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

至於現代婦女肉體上的許多特點——如發達的胸部，纖細的四肢，非常圓滿的體態，和軟弱的肌肉等等，都是歷代婦女把生育作為主要任務而養成的，所以這一切都是後代的成果。到現在，野蠻女子的乳房，並不十分發達，四肢的肉，確是非常有力，老遠地看去，很難分別出她是男或女來。並且在她們的體力和耐勞方面，還是和男女沒有很大差異的原始時代相同。分娩的時候，也不過暫時中斷了她們的經常工作——狩獵和採集果實——和原始集團的共同工作而已。而且在人類集團中，她們從單純的自衛觀念出發，必須和其他的同伴，兄弟，姊妹，以及雙親等在一起幫助氏族共同防禦當時最可怖的敵人——猛獸，此外她們更和全氏族的人員共同找尋和採集果實。

在當時一切權利、法律和財產的分配都沒有產生，所以婦女被男子束縛，或



男女不平等的事實也不會存在。即使男子自身，也被集團和氏族所束縛着，一切由氏族決定，聽取氏族的命令。如果不服從集團或氏族的命令，那麼就要被殺戮，被餓死，成爲猛獸底餌食。那時人類要從他們恐怖的強有力的敵人——猛獸——中拯救出來，只有靠着堅固的協力和氏族集團。集團的團結愈堅固，氏族全體人員便愈服從集團的意志；他們對於共同敵人愈能一致地行動，那麼鬥爭便會成功，氏族就能安定地生活了。所以，原始生活的平等和協力，是最好的自衛手段。從而在人類生活初期發展階段時，氏族人員中，隨便那一個人既不要服從任何個人，也不要被任何人所束縛。在原始共營共享時代，人類不知道有階級、勞動榨取、私有產等等；同時在婦女也沒有什麼被奴役，被束縛，和不平等的事實。人類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生活了好幾十萬年。

在以後的發展階段上，人類生活形式就發生了變化。人類在探得了能保證自己長期生活的最好的手段，和集積了長期的歷史經驗以後，就使生產勞動經濟的

萌芽發展起來了。某一種族由於氣候和地理的原因，定居在原野的森林地帶，專門經營農耕；旁的種族，則轉而從事牧畜。這就就是次於原始的狩獵和採集野生果實時代的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和這種經濟的新形態相聯繫的，人類就創造了社會生活的新形態。現在來把生活在同時代的人類，但各自有着不同的經濟形態的種族中的婦女地位，作一比較吧。

某個種族，走向四周有森林包圍的耕作便利的平原地帶，停住下來，成爲農耕民族。別的種族，走向野生的牛馬羊羣極多的沙漠地帶，從事狩獵生活，就成爲牧畜民族。最初在這兩種種族中，仍舊繼續保存着原始共產制，在他們中間私有財產制還沒有確立。然而在這兩種民族中間，婦女的地位，確已經不相同了。農耕民族中的婦女，不但獲得完全平等權，有時還在這民族中間獲得優越的職位；相反地，在遊牧民族中，婦女底處於從屬與不自由的狀態，却在逐漸顯著起來。

在歷史經濟學中，還有另一種學說，以為人類必然要經過一切經濟發展階段，任何民族必首先從事於狩獵，其次牧畜，其次農業，最後經營工商業。

這種單純化的見解，當然是錯誤的。根據後來社會學者的研究，有不少民族，它們顯然能夠從原始的採集果實和狩獵生活，越過牧畜時代，而直接轉化到農業經營。所有這些，是和各人類集團所處的氣候的地理的條件——一切自然條件之不同有關係。

因此，各種不同的自然條件，能在同一時代中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即所謂原始的農耕與畜牧。婦女在農耕民族中，獲得了更大的平等權，這已是確定的事實。某種農耕民族，能使母權發達起來（註：在希臘語裏，母權二字底原意是指司分娩的婦人與母親底主權而言）。

相反地，在牧畜民族和游牧民族中，則氏族中的父權——即年長男子的權力，極為發達。

這種事實，怎樣產生？爲什麼會產生的呢？這是由婦女在經濟組織中所擔任的職位而決定的。在農耕民族中，主要的生產者是婦女；她們最初發明播種，只有她們才是「最初的土地耕作者」，這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

攜帶孩子的母親，當氏族出發狩獵的時候，不能隨着他們遠遠地出行，她們被留在後方，結果就發明了播種。氏族出外狩獵時，她們殘留在後方，不得不等待氏族攜帶食物回來。在那時代，獲得食物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往往要使她們長期的等待着。這時沒有食物儲藏，她們必須自己努力獲得食物，找尋養活自己和孩子的手段。婦女究竟根據怎樣的方法而發明農耕的呢？據學者們說是這樣的：婦女一方面等着氏族的回來，一方面在附近的果實已經吃完時，她們自然開始探求着能夠作爲食料的植物，用它來充飢，和哺育孩子們。最初的穀粒收穫，就是這樣開始的。

被採集的穀粒，一部份落在地上，這樣經過了一個時期，再回到原地來的婦

女，就發見從前落掉的穀粒已經出了芽。她們知道等待這些穀物成熟了再回來可以比較有利，知道這樣可以少費一點力量，找到食物，於是就在這個地方做起記號來。這樣，她就知道了得以收集最多量的穀物的場所了。人類依據經驗，知道落在地上的穀粒能夠發芽；更知道假使耕種土地就可得到更好的收成。但是，這種經驗屢次被人忘掉。於是她們感覺到要把這種個人的知識，普及到民族，普及到集團的必要，有把它傳給子孫的必要。在我們看來，是這樣明白而簡單的事情，但原始人類為要理解它，把握它，却不知遇到了多少困難呢！為要使這樣的知識能深深地凝結在集團的意識中，這有把它轉化為習慣的必要。

婦女要使自己的氏族和集團，回到她們從前播種植物而已經發了芽的地方；但是她們不能使自己底氏族同情她們這樣的經濟計劃；她們也不能用語言來告訴自己的同族，使他們聽從自己的意見。於是她們造出了一種使她們容易實行這種計劃的習慣和信仰。譬如：某氏族在某月望日帶着孩子們離母親而他去以後——

做母親的仍舊留在老地方——那麼到了幾個月後的望日，他們必須再回到那塊原來的地方；她們造成了這樣的習慣，說這是神的命令，如果不實行這樣的習慣，就要受道德的指責。因此，當氏族由經驗而知道，不聽婦女的說話，即「不回到播種的場所，孩子們便容易死亡」這件事實以後，他們就開始嚴格地遵守這種習慣，信賴婦女們的「聰明」了。

消費最少的勞動力，獲得最大的成果，關心着這一原則的婦女們，認為在播種了的土地上，再加以耕作，一定能獲得更大的收成。她們就彎着腰，拿着尖的棒和石鶴嘴，開始原始的耕作。雖然這樣，但在食物的供給上，比了一面不斷地被猛獸所威脅，一面在樹林裏，這裏那裏地找尋果實的那種工作是進步得多了。爲了要做母親，她們被氏族放在特殊的條件之內，就在這樣的特殊條件內，她們發見了農業，使人類經濟發展有了新的偉大的進步。而且這樣的發見，就長期地決定了她們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職位，使她們成爲氏族中主要的分子。

許多學者們認為最先知道把火作為經濟力來利用的人，也是婦女。當氏族人員出發狩獵或和別的氏族戰爭的時候，婦女中的母親（沒有孩子的姑娘與婦女和氏族裏的男子一同出發）留在後方，這樣她們就不得不從猛獸的襲擊中設法保衛自己和孩子們。蠻人們根據他們底經驗，知道當猛獸襲擊的時候，火是最好的守衛自己的武器。原始人已知道摩擦原始的武器和石器，就能夠生火。氏族當出發狩獵的時候，爲了保護孩子和母親，就建築燒火的灶場。這時，母親底神聖的義務，就是使火焰不斷地燒着，以威脅猛獸。留在灶場附近的婦女（男子們尙只以爲火是神聖的極不可解的一種力量）常常和火在一起，已瞭解了火的特性，學會了爲自己的須要而利用它，藉着它的力量，使自己的勞動容易生效。她們在灶場上燒山羊的毛和野雉的羽毛；又在同一灶場上燒土器，使它堅牢。她們更在灶上烤肉，以便保存長久。

做着母親的婦女，和灶場結合以後，她們就想法支配火力，使它爲自己服

務。然而經濟發展法則，又向另一方向進展了。在原始家族中，灶場上燃燒的火焰，征服了婦女，使她們長期地成爲從順的、沒有權利的、灶場的奴婢了。

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到，人類因爲要保護自己的小孩，避免強烈的陽光，冰冷的雨點而造小屋，也是首先由婦女來開始建築的。她們不但能用簡單的石鶴嘴耕種土地，散播種子，收穫穀物，建築房屋，而且還是最初的手工製造者，關於紡織方法，製造食器的模型，和在那上面加上色彩花紋等，都是由婦女發端的。這可以說是人類藝術的最初萌芽。婦女更接觸各種各樣的草類，研究牠的特質，所以最初的醫生，就是我們遠祖中的祖母——古代婦女。古代的傳說和氏族信仰，都反映着老遠的過去。在二千年前，燦爛輝耀的、古代希臘的最初的藥師，實在不是愛斯克拉普，而是他的母親。藝術之神也是海卡太和朱亞娜兩女神。古代諾曼人，把愛哀爾作爲醫神；即使到現在，在僻遠的鄉村中還以爲老嫗是百事通，是魔術使，就是例子。男子們因常常從事於狩獵，戰爭，和筋肉勞動，對於價值



高的勞動經驗和關於自然特質的知識，沒有積集的可能；所以婦女所有的知識，不能普及到男子中去。在當時，知識是握在婦女手中的一種力量，男子既尊敬她們，自然也畏懼她們這種力量。這樣看來，在人類社會的蒙昧時期——原始共營共享時代中，婦女能推進人類的經驗和經濟的社會的發展，積集豐富的知識，以及完成各種各樣的發見；所以她們不但和男子同樣勞動，甚至凌駕在男子之上。

某時代的婦女，對於知識的蓄積，和使人類文化豐富的一點上所盡的任務，比了布爾喬亞科學所任意加上的估量是遠而巨大的。此外，布爾喬亞科學也沒有十分弄明白，在人類學的領域中的另一種現象——即從人猿發展到人類的過程中，婦女究竟盡了何種任務。即在我們人類成爲直立的動物——從四足動物進化到兩足動物這一點上，人類也是顯然受了婦女的許多恩惠。當生育人類的四足母親，被敵人襲擊，或被男性危迫着的時候，她們爲了要攜帶着縛在頭上的孩子們逃避，她們就學會了用一隻手抱孩子的技術；在這場合，她們就不得不做成半直

立的姿勢。這樣的姿勢，能夠幫助腦子發達。但是從身體的構造上看來，婦女却因此受了很大的犧牲。因為子宮的位置，不適於直立的姿勢，所以她們就經驗到了人類的祖先——猿所沒有經驗到的分娩的苦痛。

在這裏我們再回來觀察農耕民族經濟中間婦女的職位吧。

在原始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不能養活全體人類，它必須靠狩獵來補充。於是，很自然的發生了勞動分業。住居在一定場所的許多婦女，從事於耕種穀物，男子擔任狩獵和戰爭——繼續從事掠奪鄰近的民族。但是，農耕一方面，比較狩獵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收穫底獲得方面，也比狩獵和掠奪更為可靠。於是，土地耕作就開始成了民族的經濟計劃的基礎。

在這場合，婦女是農業經濟形態中的主要的生產者。氏族對於她們的尊敬，她們底勞動之含有重大的意義，以及她們自身底被人家所重視，自然毫不足怪了。直到現在，在非洲中部黑人的農耕民族「巴倫」中間，婦女還是集團中的最

可敬的成員，英吉利有名的旅行家李維各敦氏關於這個民族曾有如次的談話：

「婦女參加國民集會的討論。男子必須遷移到自己未婚妻的村上去過生活。男子從婚約成立的時候起，到死為止，必須供養自己的岳母。只有妻子有向丈夫提出離婚的權利；倘使離婚，那麼所有的孩子都留給母親。丈夫就連小額的借款，也必須得到了妻的允許，才能履行。」

而且丈夫對於他們自己底境遇，都很安靜，沒有任何反抗。妻子對於不服從的丈夫，可以奪掉他的食物，也可以毆打。在這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有聽從被「尊敬」者的義務。

李維各敦氏報告說，在「巴倫」族中無疑地有婦女支配權的存在。這樣的民族，不是惟一的；而且不但李維各敦這樣說，其他的野蠻民族研究者也說；非洲的許多民族中，在田野上工作，建築小屋等，都是婦女們的勞動生活，她們非但保持完全的自由，並且在智慧方面，也比男子優良。這許多民族中的男子，因為坐吃着自己妻子所做的麵包，正在走向退化和愚笨化。據曾經旅行過那地方的學

者報告：「他們的生活，只是榨榨牛乳，講講空話而已。」像這種古代婦女支配權的例子，實在不少。在許多農耕民族中，孩子們不依父親的姓，而依母親的姓，承繼的（在已受私有財產制支配的場合）不是兒子而是女兒。

在農耕民族中，婦女的威信，經過了許多世紀，都很發達。婦女是習俗的主要維持者，即主要的立法者。氏族必需遵守這樣的習俗，因為沒有習俗，很難使氏族全體人員，服從這種氏族中的年長者所依據經濟任務而發出的命令。氏族必定要在一定時候播種，一定時候收割。然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時代的人類是不能給與論理的科學的說明的。他們覺得當可這樣說，倒還便當：

「已經這樣做了，這樣做是必要的。這是祖先的遺訓。不遵守便是罪人。」

維持這種習俗的，是氏族中的年長者——婦女，母親，富有經驗的老嫗的任務。

在農耕和牧畜民族中的兩性分業，是男子負擔狩獵和戰爭，因此他們具有勇

敢敏捷而強壯的體力；婦女則留在後方從事生育的經濟的工作，因此她們的智慧、理性、觀察力比較發達。在這樣的人類發展階段中，婦女在精神方面，比男子發達；在集團中婦女的主權——母權自然就確立起來了。

又當剩餘物蓄積極少的時代，我們必需記着，勞動者和動物的勞動力，乃是人類繁榮的自然源泉。然而當時人口增加很緩慢，生育率比較低下，因此母性被評價得極高。母性在原始民族的眼光中，認為是有極大的價值。生育率低下，是民族裏沒有混血結合的結果；血族結婚顯然地使生育率降低，阻止民族順調地發展。

當人類靠狩獵和採集果實而生活的時代，氏族中勞動力的數量問題，他們認為並不重大。相反的，氏族發展到非常膨大的時候，給養問題反感困難。所以在這時候，做母親的婦女，並不被尊敬，小孩和老人也被認為阻礙工作而遭殺戮，有時甚至作為食料。可是在勞動生產——經營農業的民族中，勞動力就成為必要

的東西。生育嬰兒既被認為是增加新的勞動力的方法，所以婦女就具有特殊的價值了。於是，母性就被尊重。在許多古代的宗教中，最高的神都是女性，例如埃及及最高的神是女神依基達，希獵是黑亞。古代人認為土地是一切生命的泉源。以研究母權著名的巴可恩夫，曾證明在古代宗教裏婦女比男子優越，這就是說，婦女替古代人類做着意義重大的工作。土地和婦女，是財富的第一源泉；在特質上，婦女和土地是被看作同一的東西的。土地和婦女都能給與生命，創造生命，生產生命。他們認為侮辱婦女就是侮辱土地。在古代人類中，認為最重的罪是對母親犯罪。婦女是最初的聖人，也就是古代神的使徒。小孩的主權，和其他一切生產組織同樣，不屬於父親而屬於母親。關於母權的遺跡，殘留在許多民族的傳說中和習俗中，不但西洋如此，即使東洋也是這樣。然而農耕民族中，母權成立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母性，無寧說是她們的職位，即在經濟方面當作基礎的生產者的職位。在男子狩獵，婦女經營農業，各各從事適合於自己性質的勞動分業

的時候，婦女絕不會被男子束縛，絕不會從屬於子男的。

婦女在經濟上的職位，決定着她們在社會上婚姻上的權利。這一命題，當我們比較農耕民族和遊牧，牧畜民族中間婦女地位的時候，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母性——婦女的自然的性的特質，在各種經濟條件之下，發生各種不同的結果，下面我們將要觀察這種現象。

在古代日爾曼人的編年史中，我們也可以理解這種關係。古代史家奎季斯對於他們曾說過：這是經營農業的健康的偉大的戰鬥的民族。根據達季斯底話，日爾曼人是崇拜婦女，聽從婦女的意見的。這是婦女負擔農業勞動的結果。在經營農業的捷克人中間，婦女也同樣被尊敬着，關於封侯的姑娘麗普西亞的「聰明」，有種種傳說：她的姊妹中的一個靠着她的天才而行醫施藥，另一個姊妹則建設了都市。當麗普西亞接王位的時候，在她左右的是兩個研究裁判的少女。這位女王天性主張民主，解決一切重要問題，都採納人民的意見。以後，她的兄弟曾奪了

她的王位。這種傳說，把婦女在這民族中掌握主權而指導整個民族的母權時代，鮮明地給我們描寫出來了。這就是說：因為這民族正經營着集團生活，所以他們以爲婦女底支配，乃是比較幸福的正當的時代。

在牧畜民族中，婦女的地位怎樣呢？某種民族所以轉化爲牧畜民族，一方面是由於自然條件，他們遇到了適合於牧畜的廣大的沙漠，豐富的牧草和成羣的畜類與野馬所聚集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們本來是優等的狩獵民族，不是單純的僅殺戮畜類，並且能夠活捕畜類。在這種狩獵的肉體的特徵方面，男子更加來得顯著。婦女則只在不做母親的時候，才有這樣的能力。母性給與她們以特殊的條件，這就產生了依據性別的勞動分業。男子和未婚的少女出外狩獵，捕獲畜類和野馬，做着母親的婦女，則因母性的特殊條件，留在後方照料已經捕獲的家畜。她們的工作是馴養家畜；從許多家畜中，爲氏族創造出必要的利益。然而，這種經濟的任務乃是從屬的。從經濟的利益觀點上看來，在氏族裏誰的價值比較高



呢？是捕獲畜類的男子，還是能夠從畜類榨乳的婦女呢？不消說是男子。因為他們認為：氏族繁榮，是由捕獲家畜的數量來決定的；因此經濟繁榮的基礎源泉，是能夠使家畜數量增加者的人們底勞動。

在牧畜民族的經濟領域中，婦女的職務是補助的職務。因此，從經濟觀點上看來，婦女是沒有同等的價值的。他們認為：假使婦女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下，不能同樣程度地增加羣團的繁榮，則關於其他一切方面，婦女都沒有和男子同等的價值了。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牧畜民族中婦女照料家畜的補助勞動，沒有像農耕民族中那樣使婦女必需具備有修養的牢固的勞動習慣之必要和條件。因為在狩獵牧畜民族中，餵養的家畜，常常可以作為母子們的食料，使殘留在後方的婦女，從來不會愁着儲蓄食物的不足。因此她們可以不必像農耕民族的婦女那樣，考慮並探求給養的方法，和增加蓄積的手段。而且照料家畜，比較那複雜的田野工作，所需要的智慧，理性和思考要少得多哩！

在牧畜民族中間，智能方面，婦女不能凌駕在男子之上；在筋肉方面，有力和敏捷的程度，也都比男子低劣。所有這些，都幫助鞏固了婦女價值低於男子的見解。氏族中的家畜愈多，於是看守家畜，作為家畜的附屬物的婦女的職務，就愈加低劣；兩性的差別，也就漸漸地深刻起來。農民的繁榮是靠和平的勞動；遊牧、牧畜民族的繁榮，是靠掠奪。這樣看來，遊牧、牧畜民族比較農耕民族，其戰鬥與掠奪的程度要深得多。最初他們僅僅掠奪畜類；以後更襲擊近鄰的民族，掠奪該民族的儲藏物；搶劫俘虜，作為他們的奴隸，為他們而勞動。甚至強奪近鄰民族的婦女的「掠奪婚」，在牧畜民族間，也比任何民族來得盛行。掠奪婚可從人類生活的各方面來描寫出來；不消說，這種現象促成了男女的不平等。被強制被掠奪到別一民族去的婦女，身為俘虜，在掠奪者的支配之下，感到孤立而無援。當私有財產制發生以後，勇敢的戰勝者，拒絕別的民族所給與的牛馬羊羣的賠償，而要求婦女——即勞動力的完全私有。當婦女作為俘虜而被別一民族奪去

的時候，婦女對男子的平等權當然大受打擊。她對於整個民族，特別對於掠奪者的男子，不消說是處在隸屬的喪失權利的狀態中了。雖然這樣，但是有一部份學者，以為遊牧民族中婦女不自由的狀態，完全由於結婚的形態，而專在結婚形態中去探求婦女喪失權利的的原因，這種見解，却也是不妥當的。在某幾個農耕民族中，也有掠奪婚存在，然而這種民族中，婦女的權利，仍然存在，並沒有因此而破壞。古代羅馬人，從塞皮尼亞族掠奪婦女的事實，是歷史上有名的。當時羅馬人雖然從別的民族中強奪妻子，但是當羅馬沒有被別的經濟組織替代以前，婦女是被尊敬的。直到現在，那種在家族中受崇拜，在社會上受尊敬的婦女，還有人說「這是羅馬夫人」！至於羅馬婦女的地位惡化，那是以後的事情。相反地在牧畜民族中，婦女從沒有受過很大的尊敬；在這裏，男子保有了主權。這種男子的主權，直到現在還存在着。例如在加入蘇維埃聯邦的巴什克爾，啓爾吉斯，伽莫伊克等遊牧、收畜民族中，直到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婦女還完全處在被咒咀的

狀態。因此婦女是男子的所有物；男子簡直像買羊一般買進婦女來，把她們當作沒有權利的家畜，同時又作爲自己享樂和使喚的工具。遊牧人民爲要知道妻子的工作能力，預先叫她握鐵試驗。假使買進來的妻子生了病，他想到了因爲買她而費掉的金錢，就把她逐出家門。在非濟島，直到最近，丈夫還有吃掉自己妻子的完全權利。在古代野蠻民族中，妻子是丈夫的私產，所以當丈夫死了以後，她就不得不隨着他走入墳墓。這樣的習慣，在古代洛西也曾存在着。在印度直到最近，也還保有這樣的習慣，妻子要被燒死在丈夫的墳場上。同樣的在美洲印地安人，非洲的黑人和古代的挪威的居民，古代俄羅斯的斯拉夫人，特別是主要靠着牧畜生活的南部沙漠地方的民族中，都保有這樣的習慣。黑人中的許多民族和亞細亞各民族中，婦女和羊、羊毛、果物同樣，有一定的價錢，這許多婦女生活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假使男子富有，他可以買許多婦女。這樣他非但有許多有用的勞動力，還可

以有時常變換的對象來滿足性慾。在東洋，貧窮的男子不能不滿足於一個女人；但是富裕階級却馴養着許多家奴。例如阿西亞基野蠻民族的王有三百個妻子。印度的王侯，常以能娶幾百個妻子自誇。還有在土耳其波斯，這許多不幸的婦女，一生一世被關在深閨之中，成爲有錢人的玩物。在東洋，在某種程度內，直到現在還被這種秩序所支配着；在那裏，因爲還存在着古代的經濟組織，所以婦女的命運就注定在不自由和奴隸化之中了。然而問題不單在婚姻的形態上；婚姻形態是常常和經濟組織和在這組織中的地位如何相關聯着的。

問題是這樣的：婦女在婚姻上政治上以及社會上所享受的一切權利，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總被她們經濟上的地位決定着。這種情形，雖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已經可以明白地看到。當時，同時存在着兩種基本的經濟形態——同狩獵並行着的農業經濟和同狩獵結合着的牧畜經濟。婦女在這同時代的兩種民族經濟中所處的地位，完全不同。婦女在經濟上担任着主要的生產職務的地方，她們就被尊

敬，而且享有平等的權利；在她們的工作是屬於補助性質的地方，她們就漸漸陷入於不能獨立，不能和男子享受同等權利的狀態，而被男子所使喚甚至成爲奴隸。

隨着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和財富的蓄積，經濟組織漸漸地複雜，原始共營共享的制度和血族結婚生活就被遺棄了。

代之而起的，是基於私有制的經濟組織。隨着交換——商業的發展，社會就漸漸地分裂成許多階級。

這時候婦女的位置是怎樣的呢？關於這點，將在下章敘述。

### 參考書

- (一) 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
- (二) 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
- (三) 塔夫太略夫的原始文化論

## 第二章 奴隸經濟中婦女的職務

婦女在悠長的原始共營共享的時代裏——比私有財產制產生後的時代更長久——在和平的農耕民族的經濟組織中，由於她們自己所擔負的職務，使她們的支配權維持到幾千年之久。關於戰鬥民族中，崇拜婦女——女傑（*Achinos*）的偉大事業——的許多傳說和神話，到現在還殘留得很多。希臘，波羅的海沿岸，非洲，波希米亞和其它的神話中，都載着女傑的故事。某種神話，傳說在女傑之下，有二萬個騎士。還有別種神話，曾說女傑曾經威脅過當時強有力的埃及。大約在二千年前，當羅馬襲擊古代日耳曼農耕戰鬥民族的時候，婦女曾經參加戰爭而擊退過敵人。就是到現在，非洲達各娜依野蠻民族中女王的衛兵，也是由該族婦女武裝隊編成的。

上述的一切，都說明了在經濟發展的某一階段，婦女不但是生產者，也是戰鬥者。這是因為要使微弱集團的一切力量，集中於協同一致的防衛而產生的。

婦女的所以被崇拜，正像我們前章所說，是因為當時她們的勞動，成爲主要生產者底勞動而發生的。固然在牧畜民族中，婦女也有不自由的。但是這種不自由的現象，尙未成爲一般的以前，婦女的支配權，早已被傳說殆遍了的。

至於男權佔優勢的父權制——父權的支配，在許多民族的傳說中，都說它和母權制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才得勝利而確立的。這種鬥爭，在各種古代神的生活和鬥爭的傳說中，都有精彩的描寫。

關於希臘的英雄——半神黑拉可里斯的傳說中，曾經描寫着黑拉可里斯怎樣遠征過女傑——戰鬥氏族——所支配着的國家，及征服了以後，棄了母權而解放了男子等等。還有在別的寓言中也有：在神的審判席上，曾怎樣地剝奪了以前雅典市的女市民的權利，因為當時的婦女都有發言權，她們拿女神雅典娜的名字稱



呼該市，表示不崇拜男神派首敦。

日耳曼民族有名的「尼倍倫根歌」中，常常敘說着：勇敢的武士，爲了要使婦女從屬於自己，作爲自己的妻子，不得不常常和最善于戰鬥的美人軍作戰。據說美麗的女王琶侖希達雖會被她的丈夫用狡計戰勝，然而結果琶侖希達僅僅和他結婚，沒有向他降服。相反的，當一個打一個的時候，她還是勝利者，再拿她丈夫縛在屋樑上，自己安然入睡。還有在俄羅斯舊童話中，也有不少說明婦女不僅在經濟方面，即使在擇配方面，也是和男子自由和平等的記載。說明她們並不是無抵抗地拋棄自己的自由。有勇士徒蒲奇尼亞·尼開基基，和「偉大的婦女」——在當時還是母權支配氏族，是氏族的代表者——在曠野見面的時候，他們曾發生戰鬥。結果女的抓住了他的頭髮，把他塞到「袋子裏」，並說，他如向她求愛，她可以和他結婚。

這一切活生生的傳說，都敘述着人類曾經經過一個長期的母權和父權的鬥

爭。這種鬥爭，在宗教信仰上也反映出來。野蠻人，穴居人都把土地當作神靈。偉大的夏娃 (Eve) 誕生了一切的生命，她在還沒有經驗的時代，並不認識自己，她以爲土地所以能給與收穫，還是托天之福。天時好的季節，有了雨和太陽，那麼就有果實；假使沒有天，那麼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這和沒有男子婦女就不會生小孩同樣，土地不受到天的恩惠，就沒有花和果。地是母，天是父，自土地神化了以後，人們也崇拜太陽，安西里斯，愛普羅和俄羅斯古代的神阿里洛了。

在社會羣是以相同的利害互相結合着，經濟狀態並不複雜，同時婦女在集團中還是主要生產者的時候，婦女的地位總是鞏固的。

自從脫離了公共的母親支配，和本能地結合在公共灶場周圍的時代起；隨着財產爲私有而各自分割，母權氏族的成員就發生了不平等。爲了防止生產率的降低，必需有強固的權利，於是父權就鞏固起來了。

私有財產制，在婦女的地位上，究竟怎樣地反映着呢；有許多人，認爲婦女

的隸屬和無權利，是與私有財產制同時產生的，這是錯誤的見解。實際上婦女隨着勞動分業的逐漸發達，已經喪失了自己在生產上的意義，私有財產只是加深了她們的隸屬程度而已，這種例子可以在農耕民族中舉出來。婦女崇拜，只有在尚未因財富的蓄積和勞動分業發達的影響而開始破壞原來經濟狀態時，才能存在。

在發展到某一階段中間，耕作者之外又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職業的發達，各部門的專家——陶工、皮革工、紡織工、武士、僧侶等等都漸次出現了。農耕勞動已經不是民族生存的主要源泉；農耕勞動之外，手工業也開始發達了。手工業發達的地方，必然地產生交換，商業——換句話說，產生了追求利潤的事情。能夠製造粘土壺的陶工，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生產物的權利；在貨物交換的時候，自己就可獲得了勞動的利潤。農民方面也努力於想用儘量少量的穀物，去交換陶工的製造品。這種情形，已經不像過去原始共營共享時代那樣，爲着補充氏族消費而努力；這時追求利潤，已經開始成爲經濟發展的真正的刺激了。

在這樣的發展階段間，陶工、皮革工、織物工等等的勞動價值，比農民勞動要高得多。從此農民勞動就成爲價值比較低的東西。這並不是因爲農業已不是社會生活的主要源泉；而是因爲農業需要消費多量的勞動力。比較富有的民族手工業者，就強迫俘虜和奴隸加入農業勞動。在這樣情形之下，經濟上的婦女的職位如何呢？過去當做婦女崇拜的基礎的主要經濟部門，現在却變成「賤民」的勞動，奴隸的工作，那麼對於她們的崇拜還能繼續維持嗎？古代最大的文明國家之一的埃及——（五六千年以前，埃及是最強的國家）那有着無限的財富和有名的金字塔，及其他巨大建築，富裕的都市，驚人的領域和廣大的殖民地，發達的工業、科學、藝術，以及最先發見了天文學的法則的國家，它的偉大性簡直就像神話一樣的埃及，原來的婦女主權——母權，在很長久的期間都佔着支配的地位。

當世界上其餘一切地方，甚至像古代文化極發達的希臘和羅馬那些國家，婦女正是奴隸化和無權利的時代，在埃及，她們還能比較自由地平等地生活着。

(註) 根據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希臘史家洛階階斯的記載，埃及妻子在結婚契約上獲得比丈夫高的權力；少女的妝奩，並不是從父親那裏拿到的，而是母親給她的。扶養老年的兩親，不是女兒們的義務，而是兒子的義務，埃及王——法拉恩由于法律的規定，是安置在母親保護之下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埃及，農業是長期地成爲國民繁榮的主要源泉。被洪水浸洶得沃腴的尼羅河兩岸，有着當時任何國家都沒有的那樣發達氣象。住在埃及的人民是農耕民族，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婦女是農耕民族主要的生產者。所以在埃及經濟上，婦女所擔任的職務，雖然到私有財產制發達和階級產生以後，還是長期地使婦女保持着權利和優越的地位。此後跟着製造業和商業的發達，提高國內生活的主幹的，已經不是農民，而是製造業者和商人。這原因就是商業和手工業者的勞動，比較農民勞動有利得多，能夠獲得很多的剩餘。而且在私有財產制確立以後，經濟的基礎，不是爲着集團生活的幸福，而是爲着滿足榨取者的

慾望而已。這時候農業勞動就被放在奴隸身上，農民勞動成爲無價值的東西，婦女崇拜，在埃及已絕了跡！在法律上，只有特殊階級和高貴民族中的老婦人，可以繼續維持其支配權；其他居民中，所有特殊身份的婦女（不是奴隸）——工商階級的婦女，也和當時別的許多國家同樣，是無權利的附屬者。

我們關於埃及的情形已經很詳細地敘述過了，我們所以要敘述埃及，因爲埃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的婦女隨着她們在經濟上的職務，決定了她們的權利。當婦女握有經濟上的主要生產者的職位時，她們是有權利者，即在從原始共產制轉化到以私有財產制爲基礎的經濟組織時，她們的權利，還能長期地維持着。

直到私有財產制成立之初，婦女還沒有喪失繁榮氏族的基本生產者的地位；所以私有財產的產生，並沒有使婦女隸屬化。然而私有財產制和階級的分裂，却創造了經濟上的諸條件和形態，使婦女在生產上的職務降低。所以，婦女隸屬化的關鍵，是在性別的勞動分業上——男子担任生產勞動，婦女担任補助勞動——

這種分業愈顯著，那麼婦女就更加不可避免地被束縛着。

把婦女從生產勞動推到狹隘範圍的事情，就連生活在原始共營共享制下的民族間，也是早已開始了；私有財產制，不過在形式上加強了一些而已。這樣看來，婦女在集團中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私有財產制；然而私有財產制的存在，始終是加強了男女的不平等，婦女的非獨立性和隸屬化，並且盡了直接的作用的。

第一，私有財產制，將以民族為單位的共同經濟，分成了個別的經濟。獨立的分裂的經濟細胞出現以後，助成了家族底陷于孤立形態。在這種經濟細胞和個人主義的獨立經濟中，更推進了家族的勞動分業，管理家庭與廚房的工作，自然是婦女——母性的勞動部份。一切戶外的生產的經濟的勞動部份，則由家族中的男子來担任。

自然，那種使家庭經濟可以存在的私有財產制，把婦女束縛在狹隘的家事

——非生產性的——工作上。婦女勞動的意義，從國民經濟和生產發展的見地上看來，已成為非常低下，且沒有獨自的價值；成為財富的創造者，和新價值的真正生產者——男子的附屬物了。

婦女最初為着替幼兒打碎食物從地上拾起或磨礪而成的植子，土器和石器等，現在都從勤勉的婦女手裏，移到男子的手裏去了。田野已經不是婦女經營和指導的領域；在田野中自由勞動自由生活的那種寬暢情形，已經不是婦女所有的了。婦女長期地脫離了生產勞動，被禁閉在狹隘的家庭以內。這裏，她們已不是民族的共同的母親；而是握有主權的丈夫的妻子、奴婢、廚房管理者；終日做着家庭的洗濯、織布、縫衣、煮飯……等工作。固然，直到現在，在農民經濟中，麻和亞麻的加工，主要的還是婦女的工作；但是這在農業勞動部門中，僅僅是第二義的補助工作；不是具有基本作用的東西了。

其次來觀察一下此後的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中，婦女的地位是怎樣？在未說到



這一階段之前，首先來回顧一下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情形吧。這一時期，已經不是幼稚文化才誕生萌芽的民族，而是已經展開到了完全成熟的活動的國家了——基督降生前的古代世界——這裏，已有着鞏固的私有財產制，很發達的工業和商業；且已是階級深嚴俱有很大的戰鬥能力的國家了。這時候的經濟形態，是建築在奴隸勞動上的私有形態，他們的組織是從自然經濟，漸漸發展到交換的轉化形態。

在這種經濟發展階段中，婦女盡了怎樣的任務呢？還有，在古代希臘和羅馬共和國的伽爾夫阿伽自由市中，她們有怎樣的權利呢？在這個歷史的時代中，婦女在生產上的職務和權利，已經不能把它當作一般的東西而論述了，首先必須決定她是屬於那一階級，她是那一種身份的婦女。在古代世界，經濟發展比較高的階段，人類已經分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自由市民和奴隸。

自由市民在他們新的社會集團——有組織的國家中，所受到的尊敬，比他們

對於國家的貢獻爲巨大。一般認爲比誰都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些能使集團服從的國家支配者。他們在生活組織中規定了秩序和制度。次於他們的是武士、商人和手工業者，這許多人也獲得了一些權利。只有奴隸，雖然是創造財富的主要分子，却是處在完全無權利的狀態中。

勞動者給與人類集團以最大的利益，在原始時代是受到極大的尊敬的；但是現在爲什麼會當作賤民中的賤民處理呢？助成這種異常現象的就是商業和私有財產之確立。他們（自由民——譯者註）認爲自己的勞動極有價值，而不承認奴隸勞動的價值。能夠集合奴隸在他們的秩序之中，從奴隸身上榨取必要的生產物的領主，就被尊敬。奴隸所有者，從奴隸身上榨取的利潤，倒被認爲是有價值的。

我們可以看出：在羅馬和希臘等文化水準很高的國家，當極度繁榮的時代，婦女完全是無權利的不能獨立者。但在上古時代的希臘，當民族還沒有形成很大的集團，還不知道私有財產和國家的時候，婦女的地位却是很高的。固然，希臘

人也是牧畜農耕民族，但爲燦爛光輝的文化和海洋的暖流所沖洗，爲豐富的果實和美麗的山嶽所修飾的這種半島的氣候和地勢的影響，使希臘人很早就轉化爲混合的經濟形態。

農業不只是婦女的工作，然而在牧畜——遊牧民族的集約化的經濟形態中所必需的剪取羊毛和毛絲紡織等工作，却必須婦女共同勞動。

荷馬描寫古代希臘人生活的敘事詩中，敘述當時的婦女和少女，和男子共同參加生產，縱使她們是不平等，却是比較地自由的。

希臘是否有過母權時代，這問題很難斷言。在希臘民族中，從發展初期以來，混合經濟形態即佔着支配的地位。據我們想來，像純農業經濟的埃及和其他地方那樣發達的母權，在希臘也許從未有過的。然而我們也能夠在他們的宗教中，找出古代希臘婦女獲得怎樣高的地位的證據。

例如，希臘人對於收獲神荳沫徒拉曾極力地崇拜過。他們不是和太古的蠻人

那樣，單純地崇拜土地，他們特別崇拜收穫。他們對於教育人類製造和紡織的婦女哀夫依娜的聰明，也很崇拜。還有，希臘人傳說，哀夫依娜神就是發明秤和橄欖油的古代婦女。其他的古代宗教，也反映着婦女在當時的經濟上的職務。例如古代挪威人就是崇拜蘋果的栽種者伊朵娜女神等。

據說希臘人判斷正義的，不是男的審判者，而是女神。這就是說，以前在氏族內部發生爭議時，是由家長——婦女中的母親出來解決的。希臘人認為火是女神凡斯達（*Vesta*）發明的；因此，教堂裏的聖燈，必需由處女捧提。這又重新證明了學者們的想像，即最初支配火力，而使它為自己服務的也是婦女。在希臘教的傳說中，母權和父權鬥爭的例子特別來得多。這樣說來，希臘民族中，在經濟上作為主要生產者的婦女，是曾經有一個時候也做過首領的。

在荷馬時代，婦女能夠出席宴會；在結婚生活中愛和尊敬佔着支配地位，男子必需以尊敬和溫柔對待婦女。然而關於母權，却什麼話都沒有提及。

荷馬也敘述到和這相反的事情，倍納綠巴的兒子的忠實的妻子，一面忍耐地等待着，思慕着行跡不明的丈夫；一面又代替丈夫怎樣地侍奉他的母親。當時形式上的結婚，私有財產制和以家族為單位的經濟制度，已經存在；在這一經濟發展階段中，無怪希臘人要開始向婦女高喊着「家庭的良心」和應該完全服從丈夫等等的說教了。布里瑪王的妻子，曾經哀訴過她像「被鎖的狗」那樣，關閉在家庭 and 丈夫的深閨中間。

荷馬還曾經描寫過先史時代希臘人的生活。在這些描寫裏面，說明了在這以奴隸勞動做基礎的私有經濟的發展形態中，婦女所處的是怎樣的地位？原來在當時那種文化燦爛——彫刻家建築了美麗的寺院，彫塑了那不可毀滅的維娜司和愛普羅的像；各國商人充滿着各都市；手工業非常發達，哲學也很興盛；最初的學者們在這裏建立着科學的基礎——的時代中，希臘婦女已是一切權利和特權全被剝奪；在事實上，開始成為那些男主人的奴隸了。

在那時代，所謂兩性同權，只在非自由民中存在。這是何種性質的同權呢？就是共通的不自由，無權利和從屬於別人。他們處在不停的、艱苦的、疲乏的、飢餓中間，共同勞動、共同受苦，這就是所謂同權。非自由民的困苦境遇，是由於他們成爲奴隸，在社會中喪失權利，而形成的。在文化水準很高的希臘共和國，婦女——女自由民的不能獨立和沒有權利，尙有別的根據和原因。不消說，雅典和斯巴達的女市民——自由而有完全的權利的市民的妻和女等，同女奴隸比起來，當然比較地有權利甚至有特權了。然而這許多權利和特權，並不是她們自己所有，而是托庇於她們丈夫所獲得的。她們自身沒有獨立的人格，不是一個獨立的人，不是一個獨立的女市民，僅僅是丈夫的附屬物而已。婦女的一生，最初從屬於父親，以後從屬丈夫。以希臘生活底如此豐滿，但在愉快而明朗的祭場上，却沒有婦女的席次。在希臘羅馬和伽爾夫伽自由國中的女市民，她們結婚以後即被束縛在家庭裏，僅僅知道狹隘的家事經濟。她們的工作是洗衣服、織布、

燒麵包和指導家僕及奴隸。比較富裕人家的婦女，雖可免除這種苦役，但她們失去了活潑的生活，只在倦怠中，過着溫柔的安靜歲月。後來，俄羅斯的諸侯，還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兒，關閉在深閨之中，像戲劇作家愛麗斯曾經嘲笑過的那樣，把半裸體的綢衣和流行的賽達麗穿上，化粧身軀。靠着丈夫的勞動和奴隸的勞動來養活她們，她們自己是一個寄生者。無怪在丈夫們看來，她們只是生育子孫的工具了。她們爲了家庭而受教育，「從順」，少見聞，少知識，作爲「善良」婦女的標準。無論好歹，婦女總以少說話最好。丈夫可以因爲她變節，把她作爲奴隸而轉賣給別人。而且丈夫對於自己妻子已經厭倦的時候，他可以再有情人。即使在法律上規定着一夫一妻制，然而非法的公然被人承認的多妻主義的特殊形態，却很發達。例如：

「合法的妻子是用來管家和生孩子，奴婢可以滿足情慾，娼婦可以愉快精神。」

文化水準較高的希臘女自由民，和在希臘羅馬共和國中，過着富裕奢侈生活

的自由民的妻子們，她們本身，都和藉丈夫之力而使用着的女奴隸，同樣地處於無權利和被束縛的地位之中。生活在竹舍中的巴倫達族的女黑人，比較住在大理石宮裏的希臘婦女，要自由平等得多！

財富和文化發達之後，爲什麼婦女要喪失權利呢？原因是很簡單的。巴倫達族的女黑人，從事於集團的生產勞動。文明的希臘婦女，即使勞動，也僅僅爲家族或家而在狹隘的範圍中。在經濟發展比較初期的階段中，有價值的勞動力的婦女，隨着私有財產和奴隸生產的興起，她們已成爲生育兒子——法律上的承繼人——的單純工具了。總之不管在文化水準較高的希臘，領有廣大殖民地的羅馬，和富裕的伽爾夫阿伽自由市中，即使是自由的市民，婦女都是沒有權利，沒有獨立性的。

在希臘因爲母權沒有完全發達，父權早已鞏固，婦女才會受束縛和不平等到最高形態。反之，在羅馬，直等到它已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已有健全的



國法，私有財產制已經確立，生產勞動已經加到奴隸肩上的時候，母權的痕跡還存在着，婦女尙受到某種程度的尊敬和崇拜。在路上市民們要對婦女讓路，在家庭裏承認她們的威。她們信執掌着孩子們底教育。

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在建設羅馬國的民族中，母權曾有過鞏固的根源；因此即使到了此後的發展階段，母權的追憶，還存在於農耕民族的社會見解和道德中。

然而在希臘，除掉陪伴自己的侍女和善良的妻子——寄生者以外，還有名爲娼婦的愛人以及所謂希臘底偉大的丈夫的小妾等等自由的特殊階層存在。娼妓是任何人都可以向她買歡的女奴隸，她們是越過當時結婚道德的通例，勇敢地站在規律之外的女自由民。雅典的支配者蒲麗可洛的情人，哀斯蒲其亞、萊依散、花麗娜、萊安娜等，都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娼婦。她們受到很高的教養，具有科學和哲學的興味，能夠參加政治，影響國家生活。儘管她們是受到了那些可尊敬的善

良家庭婦女的指責，然而男子却要在她們的羣中去獻殷勤。當時男子——哲學家、思想家、和學者們，往往在她們中間發見聰明的弟子，和她們親近，有時竟聽了那些有教養的娼婦們所敘述的新思想而鼓舞着。近代人還可以想得起來，有名哲學家蘇格拉底曾和哀斯蒲其亞交遊過，她是有過完美的政治講演的。

花麗娜曾鼓舞過大政治家蒲萊可斯太。紀元前五百年左右，娼婦萊安娜曾參加過反對篡奪當時共和國政權的陰謀，而且發生了作用。她們和勇敢的擁護自由的同志們同時被捕，雖然被殘酷地拷問，死不肯口供，反而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吐到裁判官面上。

娼婦的存在，證明了當時婦女們要想努力從精神俘虜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而她們缺乏達到自己目的的重要基礎，她們不是生產勞動的代表者，所以她們和羅馬希臘那些沒有修養的善良妻子——家庭的主婦們同樣，在國民經濟中是沒有價值的。她們在物質上被男子束縛着，她們爭取到的自由，不過是海市蜃樓而

已。

在希臘，還有許多個別的婦女，在藝術科學和哲學方面，有卓越的研究。她們充實人類的文化，努力給與知識和藝術的寶庫一些東西。從這些弟子們中，產生了很多的思想家。有女詩人愛斯福，有勇敢地男裝着學完醫學全部課程，而做最初的女醫生的阿達拿奇咖，還有阿列可散徒麗女教授和美人哲學者依巴奇亞，全世界各地的學者們，會津津有味地來聽她們的講學。依奇巴亞在基督世紀的初期，終被迷頑的基督徒，煽動了愚昧的羣衆所殘害，而死於非命。這許多都是很優良很堅強的婦女的典型。由於這些女性，可以證明，假使不抑壓婦女們的智慧和精神，不把她們推進狹隘的家庭囚牢中，那麼她們能夠發揮出如何的才能啊！然而這種勇敢的姿態，一般地都消滅在寄生生活之中了。以上的幾個，只是例外的人。因此，假使婦女在國民經濟中的職務是被局限着的話，要使對於婦女的態度發生轉變，是不可能的。婦女由於一般文化和教育的發達，深深感到了自身的

無權利和被束縛。於是有些婦女努力開發獨立的道路；然而大多數的婦女，還是逗留在家庭和丈夫的束縛之下。

由此我們可以明瞭：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私有財產制、束縛的結婚制度等等，是橫梗在婦女解放前的障礙物，使婦女不能發揮其本能的特徵。

希臘有名的喜劇「婦女國民會議」，曾描寫着婦女很想建立新的國家，很想獲得政權的思想。在這喜劇中的女主人翁倍拉可蘇可拉，首先提議財產公有，這是很有趣的。倍拉可蘇可拉說：

「我要求一切東西公有，一切東西屬於大家，從此沒有貧富之分，消滅一人佔有廣大的田園，而他人死無葬身之地的那種情形。婦女不應該成爲私有物，各自同她所喜歡的人生育子女。」

這是婦女站在反對私有財產制、強制婚姻、和婦女被壓迫立場上所提出的抗議。這是紀元前四百年——大約二千五百年前已經存在的抗議，在這裏我們可以了解到這種抗議，將如何地被廣播開來；同時又可以想到，當時天才的愛麗斯，

在喜劇中提出了：只有實行共營共享的制度，才能將婦女從無權利狀態中解放出來的理論以後，曾如何喚起多數婦女的歡迎和共鳴啊！這種反映原始共營共享時代婦女幸福的文字，使希臘婦女，從那理想中去尋求解脫無權利狀態的道路。

希臘婦女要改變她們的社會地位，無論如何必須根本推翻放在階級國家和奴隸勞動之上的社會基礎和繁榮；個別的勇敢和努力，是沒有力量能把婦女大眾從肉體的家族的隸屬之下解放出來的。

經過了二千多年，方才實現了愛麗斯喜劇中的女主角倍拉可蘇可拉的空想。

倍拉可蘇可拉相信，只有通過社會主義和完全平等的制度，婦女才能真真地解放，這是很正確的；現在我們已在蘇聯，得到了一個實例。

### 參考書

- (一) 倍首斯可洛的古代希臘的婦女問題
- (二) 里里倍倫的婦女問題

(三) 西西可夫的婦女的歷史命運

(四) 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

### 第三章 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下的婦女

被困在家庭中的婦女，漸漸地失掉了在國民經濟上的一切意義，她們的職務，已不是什麼幫助國家和社會繁榮的「勞動單位」，而只是替丈夫生育承繼人的機器，男子的玩具，甚至更惡劣地形成了瘦弱的娼妓那樣的妾和女奴隸。由於這種支配的經濟關係，已使婦女變成了社會的寄生蟲。

女奴隸和失掉自由的婦女，被束縛在勞動的羈絆上，和其他男奴隸同樣過着地獄生活——社會公認的範圍圈內。任她們怎樣勞動，怎樣創造財富，但誰也不會來承認她們就是真正國富的生產者，因此她們的地位，也不得改變。

勤勞大眾階層，既在古代世界的胎內，慢慢地萌芽了；階級鬥爭的焰火也旺盛起來。於是，由於這種鬥爭而分裂，和以極低級的奴隸生產勞動作基礎，在生

產上已經不能再發展的私有財產制所破壞了的古代國家，也就漸漸地衰頹無力，以致於滅亡。代之而起的是別種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的新的國家了。從埃及和羅馬的古代文明世界，到距我們更近的八九百年前的所謂中世紀時代了。

這時代的人類生活，在歐洲，已經不是古代世界那樣的奴隸勞動，而是以農奴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制度所支配着了。在這種組織之下，農民已經不必將自己全部的勞動生產物貢獻給領主，他們將生產物的一部份，移作自己改善和推進農奴經濟的東西。農奴對於領主，雖要繳納現物稅和提供勞動力；但有一部份生產物，却殘留在他們的手裏。他們就將這一部份生產物，移向商業和交換市場，自由地交換着自己所必要的商品。農民間的交換，根據各地域舉行定期的市集；從定期市集，再漸漸地成爲經常的交換商業區域，這樣都市就發達起來了。假使都市是建立在領主的土地上的，那末領主就是都市的所有者，他們便能夠從這裏獲得租稅。



然而也有從領主和諸侯的權力之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市，例如俄羅斯的古代自由市——洛弗哥洛得和普斯可夫等。

這時代在人民中間，已經分成領主農民市民三個階級。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的中世紀繁榮時代中，婦女的地位是怎樣的呢？

婦女的地位，由於她們所屬階級的不同，有極大的差異。各階級的婦女，她們的地位所以各不相同，根本原因，是被她們在生產上的職務所決定的。首先我們來看有產層的貴族以及諸侯層的生活吧！

封建時代，就是領主、地主、貴族的權力最大的時代（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這時的經濟是自然經濟。換一句話說，就是佔有廣大領土和農奴的領主、莊園主、貴族、諸侯、的生活必需品，是由他們的農奴和臣僕們努力生產出來的。商業和交換還不十分發達。歷史給我們保留着當時的生活和經濟底記錄。經濟中心，是諸侯、領主的堡壘，農奴侍候着他們。領主的許多臣僕，家族親戚、

賓客、武士們，都被收容在堡壘之內，他們的一切消費品，都在堡壘外面生產的。農民和農奴對領主和莊園主要繳納租稅，貢獻原料品、皮革、羊毛、肉和穀物。原料的加工，是在堡壘裏面進行的。這種莊園主和諸侯的經濟既已複雜化，必須要有善於組織的領袖。在法德英等國，普通誰是中世紀堡壘經濟的組織者呢？諸侯呢？莊園主呢？武士呢？不，一個都不是。家長們通常都忙於戰爭和掠奪，留下他們的妻子來經營着非常複雜的自然的堡壘經濟。她們支配農民，在適當的時候繳納貢物，在她們的監督之下，準備麻和絲的貯藏品，織物縫衣，做鞋子。這許多事情，並不僅僅爲着家族，也是替武士們準備的。在冬天，她們也必須費心準備在堡壘被襲擊時所需要的食糧，在堡壘的地窖裏保存幾千樽葡萄酒和啤酒；在倉庫裏，隨着領主的妻的指揮，藏滿了織工、鞋匠、鍛冶工所製造的東西。並且爲着冬天的準備，在堡壘裏不斷地磨着麥粉。總之，領主、臣僕、武士和賓客們，在堡壘內消費的一切東西，爲了即使要買這許多東西，也沒有什麼地

方可以買到，所以不得不自己製造出來。在堡壘內你可看到很少的商人模樣的人，是買賣外國所產的普通奢侈品，例如東洋的綢，威尼斯貴重的玻璃品，高價的武器和寶石等。

這時代有產階級婦女的地位是兩重性的，一面是生產的組織者，一面又作爲領主和莊園主的妻子，而受到相當的尊敬。在德英法各國的法律上，諸侯的妻子在丈夫死後，能夠繼承他的官職和領土。在十二世紀初頭，英吉利法蘭徒里布里蓬基伽斯德里等法律上規定婦女有領地的承繼權；這種現象，是由於十字軍遠征以後，直接承繼領地的男子減少而產生的。中世紀的歷史，到處贊美聰明而慈悲的女領主。亞開達尼亞的女領主愛留拿拉嫁給法王的時候，全國國民因爲捨不得她而下淚。愛留拿拉關心她的領民，減輕租稅，便利經商，允許都市自治；頒佈防止地主橫暴的法律，對無產者施捨慈悲。又在歷史和神話中，還贊美着安娜·蒲樓徒斯伽。更傳說着在古代俄國諸侯中，最初受基督教洗禮的女侯安麗伽，是

聰明的女侯。

古代法國的法律，丈夫死了或出門的時候，家族中父的權力是要讓給母親的；認爲她們是自己孩子的保護人。領主的妻——高貴的婦女，則有裁判和課刑的權利；甚至女修道院的院長，也有裁判權。歷史告訴我們，貴族姑娘也能夠承繼裁判權。在當時的法庭上，戴法冠的婦女，可以和裁判官並坐。

領主出門的時候，不僅是農民，就連治下的小侯，都要服從領主的妻。妻子有維持家系的義務，當時武士們舉行宴會的時候，婦女列入上席，而且受騎士們極大的跪拜禮。當時歌人在歌詞裏面贊美婦女，「守護婦女是騎士的義務，騎士遇到婦女就要下馬；無論那一個騎士，遠遠地就須向婦女行敬禮。這許多事情，不消說只是對血管裏流着貴族血的婦女的禮貌，至於別的階級的婦女，騎士的敬意和義務，是達不到她們中間的。」

然而貴婦人也在很不合理的關係下存在着，她們除了幫助鞏固封建權力，被

認為堡壘經濟的組織者以外，並不被承認有獨立的人格。當有權力的諸侯外出時期，在他的妻子之前，不但統治下的農民，就連當時在她的丈夫勢力支配之下的許多小領主，也要向她低頭。然而根據當時的法律和權利，她們仍是丈夫的奴隸和所有物。

貴族支配着的時代，是武力的時代，是強權的時代。領主的才能，就是掠奪和強迫。他們爲着維持他們對於自己的臣僕領民和農奴的權力起見，必定要在生動的各方面加強家長的威信。在古代世界，就連羅馬和希臘，父和夫的權力，也從沒有像中世紀那樣龐大過。在中世紀，父、家長、領主對全家族有生殺予奪之權，對子女和妻子有無限制的權利。丈夫對於妻子，可以打，可以逐出，還可以和自己所愛的馬和劍一樣，把她轉送給親友。十八世紀以前，英國的法律甚且允許丈夫出賣妻子。最後妻子如果變節或者有什麼不良行爲的時候，丈夫可以因此把她殺掉。這就是主人、支配者、丈夫的權利！

傲慢而高貴的諸侯夫人，當她不合意在她丈夫支配下的武士時，她就向丈夫屈膝；請求他去爲她決鬥……在英國，大的女莊園主和諸侯們同樣，在議會中有選舉權。但是隨着社會組織的變化，和布爾喬亞社會基礎的鞏固，使這許多婦女的權利，已逐漸喪失了。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只有英國的女莊園主安娜·可里夫德，還保有過去一切權利。雖然這樣，同是在英國，那時丈夫能夠把不馴服的妻子，在市場上出賣。貴族婦女的地位爲什麼是這樣雙重性的呢？這是因爲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度，是把全家族的命運放在家長支配之下的；家長握有一切權力。又在那時代，所以形成家長的強制力和家族的無權利，乃是爲了如此方能絕對擁護一家的利益。

指導堡壘經濟，作爲組織者的貴婦人的勞動，即使如何必要，如何有效，但是武士階級的戰爭的勳功，却被更高地評價着。到底那一樣使諸侯的財富和收入容易增加呢？是諸侯的妻子的巧妙的經營呢？還是進攻近隣の領主，掠奪隣近地

帶和住着很多農民的村落呢？從諸侯和武士的家族收入一點上說，攻擊和征服近隣，比較和平的經濟發展，自然要有利得多！所以，從貴族看來，婦女組織者的勞動，自然不過是第二義的從屬的勞動而已。掠奪別人的財產以增加自己的財富，這種不勞而獲的習慣確立以後，就把尊敬各種勞動的觀念打消了。因此，貴族婦女的地位，就形成這樣的雙重性：一方面她們獲得保有土地和官職的權利，對於領民是全權的主人，甚至婦女統治王國也不少，她們和丈夫同樣對於農奴有無限的權利；能夠驅逐農奴，責罰農奴，甚至殺戮農奴。然而另一方面，她們對於家長——夫，甚至最最基本的個人權利都喪失掉了。

中世紀諸侯的妻子對於丈夫的地位，和野蠻的東洋牧畜民族中的婦女無權利和被壓迫，毫無不同之點。俄國的貴族婦女，更是可憐……，俄國貴婦人，只在俄國歷史上很初期的時代，是從事生產勞動的經濟組織者，她們很早就脫離生產，在貴族領地裏的組織的職務，是由男系親族或臣僕來執行的；貴族婦人僅僅

限制在狹隘的家事工作中。她們的一切作用，只是生育家族的承繼人而已。

在很早的時候，俄國的父權已經確立，使婦女完全隸屬於男子的韃靼遊牧、牧畜民族的支配，不過把一切已存的事實——男子主權——更進一層地鞏固而已。雖然這樣，俄國人民在很長的時期中，沒有完全忘掉古老的母權，它的遺跡，一直殘留到十七世紀。例如當時普通的習慣，妻子可以不徵求丈夫的同意，而處置財產，古代婦女還能夠參加裁判和審判決鬥。根據十七世紀所寫的一本俄羅斯的真理書上，最初的法律，規定氏族不是男系而是女系。這很明白地說，在古代斯拉夫人，特別是生活在森林地帶的民族之中，是存在着和原始共產制及原始農耕制相結合着的母權制的。此後由於複雜的經濟形態和俄羅斯的地理條件，比較有利於牧畜，所以隨着牧畜的發展，俄國的父權就獲得了勝利。同牧畜比較起來，能夠費較少的勞動力，獲得較大成果的農耕，在那時候，却成爲經濟上的補助部門。然而在北部農耕民族中間，婦女在經濟上的職務和主權的遺跡，還長



期地保存着。這種遺跡，到了貴族的妻被深藏在閨閣之中，農民的妻只是從事於家畜的時候，還當作追憶過去的牧歌而歌唱着。

隨着黑暗而苦悶的中世紀時代的強權——私有權和榨取權的鞏固，在家族中，婦女的隸屬，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呢？在西西可夫的關於俄國婦女的歷史命運的著作中，我們能夠看到很有興味的情景。

因為高貴的家族利益，重重壓迫着婦女的命運，所以高貴婦女在家族中的隸屬地位，更深一層的壓低下去，姑娘沒有權利可以自由處置她自己的命運和意志，雙親，家族中的長者——主要的是父親操縱了她的命運。婚禮即是家族利益的擁護者的工作。結婚並不根據互相的愛情，而是根據純物質的投機念頭。娶媳婦是要藉此增加財產，擴大領地。嫁女兒給鄰近的領主或領主的兒子，是要藉此妥協，擴大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官職——這就是結婚的基礎。新娘新郎直到結婚的一天，沒有見過面，這種例子很多。有的把姑娘嫁到很遠的國家去，有的爲了

政策關係，五歲七歲的小孩就給他訂了婚。在中世紀，幼年結婚是普通現象，吃了大敗仗的蒲里恩侯，爲要獲得新娘所有的財產，曾與十二歲的少女結過婚。德恩侯同兩歲的新娘訂婚，約定每年支付聘金的一部，直到結婚爲止。聰明和高貴的沙菲伯爵夫人阿斗拉依達（十一世紀），把自己年幼的女兒許給開爾瑪公爵的承繼人蒲爾德，但是一對未婚夫妻的年齡，合起來還不到六歲。眼光尖銳的雙親，甚至於爲自己的子女指腹爲婚。而且子女對於雙親的約定，絕對不能違背。家長的權力，使少年和少女，對這事情無權過問。他們的婚姻，不僅是父親，就是叔父祖父姑母祖母都有權干涉。

並不根據自由意志，只是根據雙親的選擇，而在對於丈夫有利的法律條件之下締結婚姻；婦女在結婚後的生活情形如何，也就不難想像了。當時結婚的唯一的意義，只是替高貴的宗族繁殖子孫；因此婦女的多產，比隨便什麼事情都被尊重。此外丈夫對於已經變節的妻子，可以課以非常嚴格的罪狀。理由是：她將別

人的血運入家族之中，因而混亂了血統。丈夫對於變節的妻子，不僅能夠把她像家畜一樣驅逐出去，而且可以把她殺掉，或者任意加以刑罰。門第不合的婚姻，則被嚴格取締；爲了家族的利益，可以剝奪他的承繼權，把他關入寺院之中，甚至可以把她殺死。婦女不生兒子，不僅認爲不幸，而且是應該被咒罵的。丈夫可以依據沒有承繼人的理由，和妻子離婚。不生兒子的諸侯和武士的妻子，要被送入寺院，這許多棄婦，當他們的丈夫迎娶新妻以後，被迫着永久過着孤獨的生活。當時理想的妻子是健康而多產，並且是計算精明的主婦，能夠管理家族的一切事務。關於多產是被尊敬的這件事，會有許多把這問題作爲中心的傳說。例如傳說在一三七六年根內倍洛可伯爵夫人，曾生三百六十四個孩子，所有的兒子都稱伊萬，所有的女兒都稱愛麗載維太。但是，妻子和母親——家庭管理人——的義務，不單單是生育孩子，而且必須教育孩子，拿生活的主要規範教給孩子，教他們要服從雙親，特別是父親。

在中世紀時代，許多文章上寫着做理想的妻子的條件。爲了擁護那種制度——建築在強制農奴勞動和婦女的無權力上的那種制度——而深思的人們，著了書來給與婦女特殊指導和教訓：——武士和諸侯的模範妻子，應該如何愛好自己的身份，維持夫妻關係；在家裏，妻子應該負擔那些義務，在經濟和勞動方面，婦女應該參加那些項目等等。

在十四世紀，著作家巴爾斗里拿的書上說：少女應該靜靜地低着眼睛，不出門外，在家裏幫助她的母親管理家政；這本書有非常廣大的讀者。根據巴爾斗里拿的意見，姑娘不必受教育。在俄羅斯僧侶西里夫愛斯徒在家庭指導一書中也寫着這樣的教訓。

這一切說教的書，都勸告做丈夫的人，應該非常嚴酷地指導妻子。並且以爲對於妻子用各種體刑，絲毫都不必戒忌。但是，在這種家族隸屬與無權利之下，城市經濟轉形期（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的貴婦人，却受到了在那時代算是比較

好的教養。對於高貴氏族中的姑娘們，不僅教以手工（紡績）技術，並且教她們讀書、算術、唱歌、跳舞、一切科學書，尤其是拉丁語。在英國寺院中，讀書以外，還拿聖經、音樂、看護、圖畫、手工、教導姑娘們。在男子——勇敢的武士往往不知讀書寫字為何物的時代，却有不少婦女從拉丁語中（當時一切科學都用拉丁語寫的）來學習天文學和其他科學。建立赫赫的戰功，統治廣大土地的武士，往往不能讀信；因此接到了愛人的信以後，在未遇到能夠讀信的戰友以前，只能把它原封不動地藏在自己懷裏。所以武士們往往爲了通情書而雇用書記。婦女雖和書記通信，却仍以爲她在和自己的愛人通信。她由於這許多信，學到了這樣一件事，即她應該愛她愛人的「心」。自己心中的一切祕密，却在愛人的書記面前打開；如果她知道了這件事，不知要作何感想呢！當時有名的歌手兼詩人澳耳夫萊風·德心巴海，竟不能把自己的詩寫出來，要請書記幫助。

歷史告訴我們，在中世紀初，在有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中，有許多婦女的名

字。

十世紀時，——離開現在一千年前，尼姑洛斯夫依散會著有宗教劇，及許多學術書。八世紀時，英國女修道院院長不僅描寫了當時非常聰明的人類生活；她且是當時英國初期時代的教會的活躍的建設者。她甚至參加過爲了教會問題而召集的國際會議。此外，十一世紀時，尼姑希爾斗伽爾達是當時道地的哲學家。在這時代，教會的黑暗權力支配着人類，基督教是應該信仰而無可批判的東西。希爾斗伽爾達意識到生活力與自然，她的一切世界觀是汎神論；她以爲創造生物的自然力，一定是神。大約和這同時代，德國女修道院的院長海拉亞達寫過一本學術著作樂園，祖述當時的天文學，歷史和別種科學的一切基礎。在中世紀的十一世紀中，尼姑在修道院裏曾經建設學校，聚集着許多青年男女，去傾聽聰明的尼姑的講學。這種學校特別在法國和倍阿基依的女修道院裏，會連續地設立過。納皮依愛爾出身的海爾蒲洛達，瑪倍愛依出身的阿爾斗伽爾達，西愛爾出身

的皮愛爾德拉等等，都是能夠感化學生們的有名人物。

在十八世紀，法國的尼姑愛綠綺思，在寄給她的朋友阿倍拉的信裏，闡發哲學理論，因而受到很大的尊敬。當時的修道院，並不是無聊、墮落和罪惡的巢穴；而往往是勞動的共產團。在這裏存在着素朴的偉大事業，就是探求科學思維和哲學。在這時代，看遍了世界全是一切強者的壓制，掠奪和無可容忍的專橫。爲了要在科學的領域內，發現、創造思索和討論新的道理的人，要求寂靜和安穩，自然要避到修道院裏去了。那邊不僅有未嫁作貴人妻的女子，和被逐的姑娘們，還有在永遠的壓迫和不相愛的丈夫的束縛之下，因而厭惡結婚的自覺的逃亡者。因此從九世紀到十二世紀時代，在文學和科學方面成名的婦女們中，有很多是尼姑。

此後，從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在修道院以外學習科學，甚至具有達到教授地位的知識和學問的婦女也出現了。據說在意大利古都蒲洛尼有名的大學中，在

十三世紀時，已經有婦女佔到哲學教授的地位；那位教授是絕世的美人，爲了要使大學生不要因爲她的美而精神恍惚，思想混亂起見，她站在窗紗之下講學。此後同在蒲洛尼大學中，徒恩德樓教授的二位姑娘，也以精通法學成名，而擔任講學，哀萊奧諾拉·桑斐脫·唐琪是當時認爲最精於數學的人。

在中世紀，不僅在科學和思想方面有許多有名的婦女，特別是從九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貴族婦女們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徒斯伽尼·瑪爾伽樓伯爵夫人和阿薄拉依達夫人，便是兩位有名的女性；她們從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紀初，生活在北部意大利。以傲慢聞名的徒斯伽尼伯爵夫人瑪基爾達，支配着燦爛的發達的極繁盛而豐富的工商都市佛羅蘭斯。她在法律上是徒斯伽尼伯爵的妻子，但是做了寡婦以後，仍以伯爵夫人的資格而掌握着廣大的丈夫的領地。在她的統治下，有都市，有廣大的共產村落，有小的男爵和貴族的領地。

活動的聰明的伯爵夫人，根據當時的習慣和法律，在自己的臣僕和市民中



間，規定了裁判法，自己做裁判長而指導裁判，簽名在宣判書上。瑪基爾達在佛羅蘭斯曾留下來了許多有趣的宣判書。這位伯爵夫人和一切貴族婦女同樣，她依據法律，雖沒有什麼保護人，却保有處置自己的財產和土地的權利。當時正是皇帝和法王的宗權之間發生激劇鬥爭的時代。瑪基爾達是有力的野心家法王古里可里依七世的親密的朋友，當她死的時候，遺囑把自己廣大的領土和其他一切讓給法王；這樣法王的權力更加強大起來，因此激起了皇帝的怒火。和她同時代的沙依·亞斗萊依達伯爵夫人，雖然有兩個兒子，但是自己統治着廣大的領土，自己任意地掌握着政治。她和握有很大權力的古里可里依七世鬥爭的時候，毫不退讓，甚至能夠威脅法王；因此，歷史上把她稱爲「傲慢的勇敢的婦女」。據說她有「寬大而正直的心」；然而公正的歷史，却能明瞭地指出，這乃是她底權力的化身。她雖然有時扶助弱者；但她是用盡各種手段，榨取着她所統治之下的都市的。這兩個女性是尊重科學的；她們能夠爲了自己的繁榮，而採用科學的力量。

有名的蒲洛尼大學，就是因為馬基爾達到這裏來聘請了有名的法學博士依爾內里那，而開始繁榮起來的。

固然，這許多婦女是例外的。但是這種事實可以證明在黑暗、強制、無權利的時代，她們的產生，是有什麼共通的原因的。

既然是婦女，則在主人、丈夫看起來，是沒有意志的隸屬物而已。她的父親既然給她規定了這樣的命運——強制她和不相愛的丈夫訂婚，丈夫對她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她的全部任務，只是為高貴的氏族生育承繼人——那麼對於這種不幸的動物，為什麼還有教育的必要呢？是的，給與教育，仍舊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在這種自足自給的經濟組織之下，因為要使大莊園主底家庭中的婦女和妻子，盡她們的職務，所以對於高貴的氏族的姑娘和婦女們給與一種能夠使她獲得知識和科學的權利。在這種經濟組織中，生產是複雜的；婦女的職務，就是在領土的範圍內組織生產者。

能夠讀書，善於計算的妻子，和文盲，不懂算法，沒有眼光的主婦比較，當然要有利得多。她們能夠好好地管理堡壘中的收支，能夠節儉，能夠適當地監督農民底遲延繳租，能夠正確地計算在冬季被敵人襲擊的場合，必須準備的東西的數量。當時被人尊重的貴族和武士階級的妻子，不僅要美麗，並且要聰明。十一世紀的歷史，記載着洛巴徒的妻子西達海依徒，說她具有成爲一個高貴婦人的一切素質——即「高尚的人格，美麗和聰明」。甚至她還具有當時婦女被尊重的另一種特徵——即知識部門。她有一個藥劑師的才能。

我們已經說過，從古代起，醫藥就是婦女的工作。在太古時代，婦女已經知道藥草的種類；知道利用它來治病。在中世紀醫藥還沒有十分發達；只有很大的諸侯和伯爵，才在堡壘內養着醫生。其他人民，便只得用自己的力量來治病。但是，因爲和隣近的人不斷地衝突，因爲與師動衆，和異族蠻族發生戰爭，所以堡壘不僅成爲製造藥品的中心，而且成爲充滿傷兵的病院和診察室。還有農民們也

到這裏來請求醫治。假使婦女不僅要使周圍的人民畏懼領主，而且要使他們在必要的時候，知道堡壘乃是必須依靠的中心，則她們——領主的妻——的懂得醫術，實是必要的事情，所以假使領主的妻精於醫術，能夠挽救瀕於死亡的傷兵，並調配適度的藥而治愈他們；在農民的妻子難產時候，給她們以各種「聰明的忠告」，而能挽救她們；則農民也就可以容忍領主的各種專橫了。中世紀的醫術是在婦女手裏，在中世紀的許多傳說中，描寫理想婦女的時候，能夠行醫是她們必要的條件。在醫術方面，誰都知道中世紀的名醫龐滑哀爾西曾說過，他的醫術，從婦女方面學得的，比從當時亂七八糟的不正確的醫學書中學到的，要多得多呢！法王路易九世，在一二五〇年從愛爾散萊瑪遠征回來，曾獲獎在戰爭中建立大功的女藥劑師徒洛斗亞·普開。徒洛斗亞·普開是十五世紀蒲洛尼大學的醫學教授，當時的醫學，還不是被精深地研究着的科學部門哩！

當時的醫學是和迷信與空虛的偏見混合着的東西；人們還不知道它是正確的

科學，甚至於連自己身體的構造都不知道。因此醫藥反映在一般愚昧的大眾眼裏，僅僅是一種魔術而已。他們認為投藥的老嫗，往往具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夠支配一般人類的命運生命幸福和健康的魔術使。這種女醫生是被人尊敬又被人畏懼的。她們在醫學領域內的實際知識，在自足自給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中，曾引起了對婦女的崇拜。然而在廣大的經濟和社會組織之下，這種婦女變成可咒罵的東西……。

婦女往往做了迷信的犧牲品，在歐洲，「神父」——教會高僧——曾經以為婦女是不潔淨的，疑心婦女是可以咒罵的，於是把幾千婦女燒死在灶內，灶內的烟經過了很長的時間，還不斷絕。

在封建時代，有產的貴婦人是這樣的：她們是自己階層的代表，並且擔當着家族的名稱，所以她們是被尊敬，有權利的。她們在家族之外，受到武士的尊敬和跪拜；但是在家族和夫婦之中，也和一切農奴的女兒那樣，被束縛在無權利之

中。在十三世紀以前，城市經濟極殷盛，諸侯的妻子指導着經濟的時候，婦女是受到相當的教育的。她們在家族中，對子女且有很大的權力。此後隨着商業和交通的發達，城市經濟開始崩潰；貨幣的流通發達起來，至貨幣開始成爲主要的價值，成爲繁榮的基礎時，婦女在城市經濟中的職務漸漸凋零；於是在貴族之中，婦女漸漸降低到執行生殖的職務，她們轉化爲希臘市民法律上的妻那樣的寄生者了。城主的妻已經不要監督鍛冶場的工作，也不要做織布婦女，站在紗羅綢緞機的旁邊發明新的機器；不要她們去磨拔麥機底輪齒，也不要她們去做盔甲。所有這些生產部門，已經不是城市經濟不可分的部門了。這許多工作已經移到堡壘外的都市和農民手工業者的小屋中間去了。在諸侯和武士的堡壘和莊園內，只殘留着狹隘的家事。而且高貴的領主的妻，就是處置這種狹隘的家事工作，也不親自操作；她們把這種事情統統交給了僱傭的僕奴和管理人。隨着這種只吃不做的懶惰的寄生生活的成長，她們的權利的限制，也就漸漸地增加。在此閉關自守的自

然經濟為基礎的莊園經濟沒落時代，貴婦人的教養也漸漸地低劣。在第九世紀那樣早的時代，何以會有洛斯夫達和希爾斗伽爾達那樣聰明而有教養的婦女出現呢？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時代的婦女又為什麼會不學無知，被迷信所包圍着，而專門能耽溺於美麗的服裝和空虛的享樂之中，以消磨日子呢？粗看起來，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可是，我們只要知道婦女的地位和權利、人格的被承認，和婦女對於知識寶庫的要求，常常是從她們經濟上生產上的職位而來的。那末，那種粗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的事情，也就不難理解了。

### 參考書

- (一) 亞薄古拿夫和斯斗巴拿夫合著的經濟學教程第一卷
- (二) 薄可羅夫斯基的俄羅斯史第一第三卷
- (三) 麗麗普萊恩女士的婦女問題第三第四章

## 第四章 行會手工業生產及共有體農業下的婦女

### 勞動

在中世紀，女市民和農婦的地位和權利是怎樣？她們的私生活和生活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她們的權利等等能夠成爲問題嗎？總之農婦也仍舊同農民一樣，是「領主」的農奴。領主地主在農民之上，有無限的權力。

要理解中世紀的武士、貴族、莊園主同農民間的關係，首先必須了解封建制度是以什麼爲基礎的。封建制度經濟是和大規模的土地私有權相結合的。在掠奪者——武士和諸侯大地主——所支配着的土地上，農民在那裏勞動、居住而成立了自己的小經濟；這許多農民不是存在於古代英吉利羅馬埃及的奴隸制度之下的那種奴隸；而是承認他們是人，有獨立人格，而被主人所束縛着的奴隸。這許多



被認為「人」的自由農民，一切儲蓄都不可避免地被地主所剝奪，不得不像「農奴」那樣受他的政治的經濟的羈絆。好的土地完全被貴族和武士所佔有，農民在地主的土地上生活和耕作，因此不得不繳納重的貢物，起初是貨物，後改現金。地主對於農民有法律以上的無限的權利（在俄國根據法律，對於農奴的私有權，到十六世紀還存在着）。此外，中世紀的地主諸侯，不是單純的土地所有者，而有極大的政治權力；他們實際支配整個領域，發布自己的命令，管理裁判，向人民徵收租稅，執行死刑和大赦。大諸侯對於小諸侯，小諸侯對於小貴族，都保持着各自的權力。

由於領地的大小，而產生了和無數從屬關係相結合的各種高低的官職。這種相互的從屬關係，使封建制度鞏固，使「國王」君臨在諸侯之上，具有很高的權威。這一串束縛農民的官職的鎖練，無非要束縛農民，要他們對於貴族和武士無條件的服從，強迫他們把勞苦的勞動所生產的收穫，大部份供奉給領主，去用作

貴族莊園和武士堡壘中的消費。

當時農婦的地位，和農民地位沒有什麼不同，男女共同從早到晚勞苦工作，他們既不被尊敬，也沒有權利；只有領主、土地私有者、貴族，才有權利，才被尊敬。諸侯武士乃至貴族可以把農民從土地上逐出，可以任意課刑；被領主所束縛，這在農民和他的妻子之間，沒有什麼不同，夫和妻共同分担地主的枷鎖。然而無權利的農奴，被束縛着的農民們，在家族中，對於妻子還是支配者，還是主人。和武士們把妻作為財產而關入修道院同樣，農民也有權利支配孩子和妻子。農民社會中，結婚也都不憑戀愛，而是由經濟的計算決定的。莊園主有權命令任何人的兒子，和這村或那村的女兒結婚；莊園主或丈夫，對於農婦都有支配權。

武士和他們的兒子，不和農民應酬。武士在高貴民族的貴婦人前，願意很冷的赤着足立一通夜，以表示自己對於愛人的愛情；然而對於農婦——賤民的妻和姑娘，那簡直好像對付野蠻人那樣橫暴。爲了安慰自己上面的武士和貴族，常常

徵集了農民的姑娘，到酒席上來任他們調戲。如果不幸而農民的妻被主人所寵幸的時候，主人可以很容易地易把她的丈夫從小屋中逐出，而自由地玩弄他的妻子。莊園主把堡壘內的工場和妓院，認為是自己的後園。武士們一方面在詩裏贊頌女性，一方面又很慘酷地蹂躪她的意志，藐視她的感情，這真是黑暗而殘酷的時代！這是權力和強力到處橫行，忽視法律，任意支配的時代。直到中世紀的末年，農民們才開始以暴動來答覆莊園主的暴虐。在這種暴動中，婦女，農婦也不絕地積極地參加，在法國有一時代，她們曾經幫助農民用大斧砍斫主人，燒毀城郭。在英國，她們和賤民同做暴徒；在德國她們加強過農民的暴動。

歷史家描寫中世紀的做暴徒的農婦，說她們比農民野蠻得多，好像殘酷刻薄的野獸。這是理所必然的事情。原來中世紀黑暗時代的農婦，在支配者莊園主之前，無權利，暴虐殘酷的习惯；和父權之下的道德所奴化的農婦，自然要像野獸一樣野蠻了。農婦除耕種、收穫外，還要照料家畜，比加在農婦身上更苦重的勞

動，在當時是沒有的。她們的可悲的束縛，在俄國邊境和其他經濟落後的國家，特別是東洋，到現在還有這種痕跡遺留着，農婦和農民雖然同樣負擔着生產勞動，但在當時社會，她們的權利還是不被承認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中世紀時代的經濟，已經建立在私有財產制上了。而且在私有財產制所支配着的場所，使經濟繁榮和供給必要品的勞動和勞動的產物，已經不被認為有價值；私有財產和生產工具，特別是依據土地和勞動力而獲得的收入和利潤，反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了。雖則希臘的財富——且不問他們以爲何種是財富，希臘共和國畢竟是當時最富強的國家——的創造者全是奴隸，但是他們的勞動却不承認有任何價值，只有計算他們的勞動力，能更好地利用這種力量的人，和能從自己奴隸身上榨取比較多的利益和利潤的人，他們的勞動才算是有價值的。這在農奴制之下也是相同的。在這裏所確立的私有財產制，則更策動着農民經濟的分裂爲小的獨立單位。耕地、牧場、森林雖仍殘留在村落或土地共有體

的共同管理之下，共同耕種；可是農夫已經各自主持着自己的農戶，這種農戶，不是屬於妻，婦女，而是屬於男子——夫、父、兄弟的。這種支配權是把父權制道德作爲出發點的。現在舉出幾件重大而有趣味的事實在下面：在農民社會中的婦女，雖然在服從丈夫和家族的制度下，但在自己階層中，倒底還被承認有某種程度的權利的。在從古代農耕民族傳下來會經過母權階段的民族之中，特別是這樣。德法英的許多民族，對待婦女的農民道德，比較劫掠夫恩韃靼和其他歐洲民族，蹂躪了平和的農耕民族的遊牧民族，要溫和得多啦。在中世紀時代，不僅在歐洲，甚至在俄國土地私有制和共有制之間，還正在起着鬥爭。俄國的土地共有制，是被尼古拉二世時代的大臣，斯徒里賓的法律所強制破壞的。在土地共有體的經濟之下，婦女是重要的勞動力。對於整個共有體經濟的繁榮，他們和男子具有同樣的關係。因此在自己家庭中，在夫與父之前無權利的農婦，往往很多能夠作爲村落會議的一員而出席參加，有鬍鬚的老農，也肯傾聽她們的說話。在俄

國雖則婦女很早就失去了權利；她們隨着家族中的長老——「男主人」的權力的鞏固，所遭受的殘酷程度，也早就發達；普通習慣，丈夫可以毫不容情地打妻子，把她打到半死；可是在許多縣份中，農婦仍舊保有出席村落會議的權利，尤其是在丈夫出門的時候；她同男子具有同樣的權利。

在中世紀，農婦的地位，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驕慢的貴族和武士階級的妻子，同農婦比較起來，她們中間的地位最容易區別。地主對於農婦儘管有無限的權力，儘管他能使農民們結婚，使農民們離婚；同時雖則在全歐洲有那種無忌憚的地主「初夜權」的習慣；但是戀愛結婚，在農民社會中，却仍很多。農民的女兒，比較武士和貴族的女兒要自由得多。這在古歌和傳說中我們可以知道。還有一件有興味的事實，假使武士的女兒在結婚前與男子發生關係，那麼她被全家族所賤視，任何人也不要娶她；然而在當時農民社會中，對這問題却認為是極簡單的。在自己的夥伴中間，結婚前發生性的關係，是不算罪惡的。這種見解，也是

由於經濟關係而產生的。在當時農民社會中，在非常艱苦的田野工作下，勞動力是具有非常大的價值的。孩子的衆多就是勞動力的充足；對於農民經濟很有利益。在這情形之下，所以農民與「初夜權」妥協，不驅逐被「地主」蹂躪過的妻子。農民對於他的妻子的被蹂躪，雖認爲是件不幸的事情，但並不認爲是難以容許的罪惡。不過從脫離土地共有體以後，農民經濟漸漸分裂，因而經營單位逐漸縮小，農村中的風俗習慣也就發生變化了。在教會中舉行婚禮以前生過孩子的女兒，要被父親從家庭中逐出；農民打他的「姦婦」可以打到半死。

在農民社會中，隨着私有財產制的產生，農婦的生活也漸漸地變爲無權利，勞苦，暗淡無光了。

「可憐生爲女兒身」，是在莊園制度支配之下，土地私有權的經濟形態，和農奴制勞動之下婦女的命運。

這樣，在總清算了農民階級和貴族婦女的地位以後，我們不得不承認，中世

紀人類沒有完全的平等權和獨立性的理由，主要是由於支配着的經濟關係和私有財產制而產生的。現在我們且來觀察第三階層——市民層（從這階層中會逐漸形成了兩個敵對的階層——布爾喬亞和普羅里塔里亞）的婦女地位罷。

都市普通是從作為商業和物品交換場所的定期市集和常設市場——發達而成的，都市主要的住民，是行會手工業者和商人，這裏所謂女市民，主要是指行會手工業者的婦女而言。在商人階級中的婦女是沒有任何獨立的職務的，這大約是因為當時的商人，普通都是販賣海外商品，所以必需具有婦女所沒有的敏捷性和獨立性。在都市和近郊生產的一切生產物，普通沒有經紀人從中經紀，而是定購者和生產者直接交易的。不過此後，在中世紀末期的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時代，商品落在經紀人·商人手中；生產者（行會手工業者和農民）和生產者之間失去了直接交換。

商人們的婦女，不過是家庭的主婦，丈夫的妻子而已。當時家族的消費品，大部分經主婦之手所造成，所以她們的職務相當繁多，但這只局限在家事範圍以



內而已。這種家事勞動，並不創造商品的價值，不過是爲直接的消費而已。因此婦女勞動不能夠被極高的評價，在市民階級中，特別是商人階級中，作爲扶養者的，僅僅是夫，家長而已。

行會手工業者的妻子和女兒的地位，和這稍有不同，行會手工業者的生活，不是依靠販賣海外商品——非生產勞動的——而是靠自己勞作而生活的。假使他能製造許多鞋子桌子衣櫃裝飾品和衣服，他就能夠使自己的家族生活，因此行會手工業者，自然要叫他們的妻子、家人——子女共同來參加勞動了。設立起極好的手工店鋪來。勞動者愈多，就能創造愈多愈好的東西；而且工作也能進步。定貨的人總喜歡向出貨快的行會手工業者定貨，獨身的行會手工業者爲了要和人口衆多的行會手工業者競爭，就不得不僱傭助手。他教育徒弟，作爲自己的助手。這樣許多新的經濟組織——站在徒弟和夥計之上的師傅的手工業經濟組織就發生了。爲了調劑定購者和行會手工業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使行會手工業者不因

爲競爭而降低他們的生活起見，行會手工業者就組織特殊的職業團體——行會。行會手工業者常同農民的農奴勞動制同時存在，而補充着以農奴勞動制爲基礎的封建經濟。在行會手工生產之中，婦女有極大的職務；特別是在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時，更是如此；甚至婦女勞動佔優越地位的也很多。例如織物、刺繡、編製品、襪子、荷包等都是婦女的產物。到十四世紀時，任何地方，不僅採用少年，而且還採用少女來做徒弟。妻子常和丈夫共同勞動；丈夫死了以後，妻子能夠接受他的遺產——手工店鋪和担任店鋪的主人。然而她却不能招收新的徒弟；她繼續丈夫的事業的惟一出路，是和助手結婚；助手與女店主結婚而成爲主人之後，一方繼續事業，甚至能夠擴充範圍。而且從此即可以加僱徒弟。

在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德法意英等國的各都市，婦女勞動極盛，甚至有婦女的行會。毛織工作，從古以來就是婦女的事情。中世紀有毛織女工、檢毛女工，練毛女工等行會的設立；在法國，荷包女工和裁縫女工的行會都很發達。此

外棉織工，主要的也是婦女們的工作。織布和漂白的工作，完全握在婦女手裏；她們自己已有特別的行會。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時代，更有北邊的女工行會的產生。英國在十四世紀的時候，五百個行會中四百九十五個是男女同等待遇的。十四世紀愛特華三世的法律，規定婦女有製酒、燒麵包、紡織和經營其他事業的權利。由此充分表示着當時婦女勞動的普及於行會手工業間。在英國，特別普遍的是婦女所經營的菜館和小賣店。啤酒的釀造也完全認為是婦女的事業。在婦女勞動中最普遍的，一部份是不加入行會的「自由職業」，一部份是加入行會的手工業，如織布、漂布、紡麻、裁縫、蠟燭、烤麵包、編織、製襪等職業。燒麵包、洗衣等工作，從來就是婦女們的事情。這時甚至理髮匠也有婦女在擔任的。在中世紀末期，婦女雖沒有經營大不了的商業，但小本生意，大多都是婦女在擔任。市場上，她們經營着雞鵝、鮮花、野菜、果物及其他食糧品的賣買；做收買原料品和經紀人的也不少。

在男子勞動和婦女勞動混合着的職業裏，女手工業者普通和男子保持同等的權利，而加入行會。根據十四世紀時代行會的規約，如德國的米恩海開倫達基希等，都市各手工店鋪的師傅可以有男女徒弟各一人，在漢堡和司徒拉司堡，織物女工是行會的會員。婦女也參加皮革製造業；金箔業的行會也有許多婦女加入。

在行會手工業生產下的婦女勞動，跟着行會規約的開始成爲婦女勞動的特殊調節器而普及。例如金箔手工業者，規定不準錄用三人以上的童工，婦女却可担任店鋪主人和副主人。在一二九〇年巴黎絨氈手工業的行會，爲了子女的利益和減少婦女的競爭，已規定禁止妊娠婦女參加勞動，此後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隨着行會手工業者之間競爭的尖銳化，就不允許婦女加入組織之中。在行會手工業生產的繁盛期間，婦女勞動在都市裏負擔着極大的任務。從人口統計中，都市婦女的人口，往往凌駕於男子這一點上，可以看得出來。在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的各都市中，男女人口的比率，是一千和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五十之比；有時

比這更多的也有。一方婦女在人口中佔多數，另一方作爲妻女扶養者的男子却顯示不足，於是婦女不得不爲維持自己的生活而要求工作。婦女的人口所以會超過男子，首先是因爲男子不間斷地參加戰爭，戰神毫不留情地吞滅了許多青年男子；此外，農村婦女爲了避開地主和男子壓迫，都跑到都市裏來避難，也是一個原因。從農奴制桎梏中逃出來的農婦，生活在都市裏，精神上自然比較愉快，所以修道院和都市，是她們的避難所，婦女爲了養活自己，還有少數婦女要用自己的勞動來養活孩子而走到了都市；如果單靠勞動，不能活命時，最後的手段——開始出賣肉體。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有許多都市爲這些婦女組織了市立機關，婦女可從市長那裏取得合法地賣淫。至於不參加賣笑婦組織的婦女們，則用「女子公寓」的名義，在家庭以外經營賣笑生意的，常會受到殘酷的迫害。

女市民與行會手工業者，參加了有用的生產勞動，所以她們和同時代的農婦和高貴的武士的妻子所處的地位，顯然不同。女手工業者能夠參與當時生產和政

治問題的決定；而且能夠自己處置工資，參加中世紀的都市生活所特有的各種宴會和祭禮，能比較自由地獨立地生活。即使在俄國，雖然到十六世紀還繼續着中世紀的生活，可是女市民的地位，比武士的妻女好得多。尤其在自由工業都市普斯科夫和諾伏格拉等地方，更佔有良好的地位。諾伏格拉的女市長馬爾勒，曾經對抗諸侯、掠奪者，而熱烈地擁護着這個都市的自由；由於她底這種英勇姿態，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婦女參加自由市的政治生活，是無分男女的。甚至行會手工業者結婚，比較此後的布爾喬亞結婚，更為平等。

這種狀態的起因，只有一個，就是在行會手工業經濟制度之下婦女和男子——夫、兄弟、父等同樣地參加生產，同樣地創造價值；這件事情，抑制了父權制高於一切的風俗習慣，甚至使妻子忘掉了丈夫的權力。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婦女在當時一般生產組織和都市經濟上的意義，過高評價。雖然許多婦女靠着自己的勞動而生活；但是大多數的婦女，仍舊依賴丈夫而活命；做着狹隘的家事勞動。因

此影響行會會員中的女手工業者，發生不能和她的丈夫、兄弟們保持完全同等權利的事實了。婦女爲了要在社會上被承認有同等的價值和權利，必須有多數的婦女，至少其中的大部份，成爲價值生產者的普通市民，從國民經濟見地看來，是有用的勞動時才能實現。但在中世紀，一切階級（貴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的基本生產者和財富的創造者，大多都建立在男子身上。因此婦女在社會國家中，依舊是被視爲無權利，在家族和夫婦間沒有獨立性的東西。

布爾喬亞的歷史家描寫中世紀時，常喜歡說得中世紀市民過着怎樣理想的家庭生活，婦女，女市民都有很好的職務，保持着自己的獨立性。可是高貴的婦女們，却是隸屬於與她們同一階級的男子的。在布爾喬亞作家的文章中，寫得中世紀是在怎樣地薔薇色的羅曼諦克的美好夢園中。然而從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那是殘忍的半野蠻時代：虐待各階級的婦女，把殘忍而黑暗的風俗習慣的責任，統統加在婦女身上。在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的影響之下，污穢婦女，將婦女當作惡魔。

得實行禁慾的主張，不僅修道士和僧侶（天主教徒），就是其他人民，也要使他實行獨身。他們認為結婚只是「肉體的安慰」，第九世紀時，法國的馬可恩開僧侶會議時，甚至通過：「善良的基督教徒，應各自要禁止肉慾」的決議。由這些地方，基督教對於「女子」的態度怎樣，是不難想像了。

在父權支配下，發達出來的一切宗教，認為婦女必須服從男子，這是神定的法律。然而從奴隸宗教成為財富者的宗教，並且又成為有產者權勢的辯護者的基督教以後，對於婦女尤為殘酷。在中世紀基督教所以能夠普及，就是因為它替私有財產制和各種不平等——有產者對無產者的強制和壓迫——辯護的緣故。基督教告訴無權利的賤民和農奴要忍耐與平和：「你們一走進這世界，上帝就賜與你們這忍耐與平和了！」說這種話的基督教，爲了要蒙蔽思想和自由，所以熱心地暗中消滅思想和自由。他們的說教是：「信仰，信仰，信仰，毋用爭辯！」這些都是地主貴族尤其是支配階級們，爲了要依賴神的威力來堅固自己的支配所感到必要



的。「肉慾禁制」不必說是有違自然，且是行不通的，武士和貴族們，甚至最熱心的基督徒，能夠遵守這種規律嗎？他們使修道士和隱士代表「禁慾」，自己却過着最淫穢醜劣的生活。他們一面犯罪，一面爲了要消滅他們的罪惡而獻金錢給修道院。

基督教非常方便於有產者的權力，對於無產者和婦女的壓迫却絲毫不肯放鬆。基督教依靠神的威信，來鞏固家族中的強者的權利，使婦女服從，維護丈夫對妻子的權力。他們一方面高唱「禁慾」，一方面則把一切戀愛的罪惡加在婦女身上。中世紀的修道士、僧侶和基督教的神父們，寫了不少本書，說明婦女罪惡深重的本性，把從肉慾上產生的一切罪惡，歸在婦女身上。在經濟和社會一般落後，國民思想狹隘的時代，自然會盲目地信仰着這種教會的說教。然而實際上，頹廢和墮落一點不會減少。在這時候賣淫是極盛的。我們研究着當時的風俗習慣，就會知道中世紀墮落和頹廢的程度，決不低於大資本主義時代。另一方面，

虛禮和偽善，却靠了基督教而發達起來。他們把一切重壓加在婦女身上，建立兩重道德。加在母親和女兒身上的苛酷的監督，和教會輿論對於結婚生活的極大的干涉，引發了女兒和母親的自殺的現象，殺子的數量也增加起來。這種不幸的人們，都在基督教虛偽的禮教之下犧牲了。基督徒壓迫科學，恐懼足以動搖一切的那種強大的科學之光。凡是不披着法衣而給與周圍的人們以精神的影響的，基督教就要迫害他們。然而，在神父們認為是罪惡的化身的婦女，特別在中世紀，她們的精神發達的程度，却比男子要高得多啦。武士過着戰爭、掠奪、強迫的頹廢生活，造成了難以言語形容的殘暴性；可是，他們既沒有思索，也不知道根據自己的理智而生活。犯了罪，就在神父面前懺悔，爲了贖罪而獻金給教會。武士階級的婦女却不是這樣，她們所受的教養，和作城市經濟組織者的義務，使她們的思想的才能高超，使她們有比自己的丈夫較爲豐滿的精神。因此，僧侶們不得不使勁地壓迫婦女，抑制着婦女的思惟和意志，並在她們之上保持權威。不然的

話，那麼在神父和武士的妻之間，就會開始激烈的鬥爭。假使神父失敗，武士就不聽僧侶和修道士的話，而聽聰明的妻的說話，於是問題就要發生了。教會決不能夠讓婦女勝利，因此它們用全力來迫害婦女，有時甚至消滅婦女。這種事情，在「善良的基督教徒」看來，並不是很大的難事。因為婦女——惡魔——各方面都是受壓迫的。婦女的運命，就這樣握在僧侶和修道士的手中，他們拚命反對她們。假使農婦醫好自己同村的人，而受到了同村的人的尊敬，教會便因為她不能影響周圍人的精神，便對於這女藥師造謠中傷——說她是行使魔術。中世紀的婦女，知識愈是發達，愈被神父認為是女妖魔術師。於是，對於女魔術師就開始處以重刑，婦女就這樣地長期受着這種殘酷的刑罰。

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裁判女魔術師的事件特別多，有幾千幾百個女巫和魔術師曾被燒殺。例如在夫爾達市，一年中會燒殺七百個「女魔術師」。在意大利北部風景極好的可莫可附近，每年有一百個以上的婦女因為「接近魔女」而

被處死刑。他們甚至有特別的指南，指導怎樣來識破女魔術師，和處罰她們。多數被「慈悲」的基督教所迫害的不幸的犧牲者，因為不堪拷問，於是昧了良心招認說：自己曾逃往山中魔女的岩窟，同惡魔相來往，化身為動物，祈禱惡魔向人民降災，傳布疫病。

愚昧的人民相信這種荒唐無稽之談，神父們也惟有利利用這種愚昧的信仰，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是，正惟是這種殘酷的女妖術師的裁判，顯示着當時教會之對婦女的壓迫。同時又顯示着：當時的婦女們，雖然經濟條件剝奪了她們的積極性，把她們關在狹隘的家事範圍中，消滅了她們的思惟和一切獨立性；但是她們並不是當時基督教牧師的順從而無害的女兒們。

說婦女行使妖術，加以壓迫，這在中世紀初期已很盛行。此後到了布爾喬亞制度之下，婦女已變成被禁閉在家中，單純地做男子的附屬物時，這種現象却還繼續着。這樣，為封建貴族生活和自然經濟組織所支配的九世紀到十五世紀之

間，婦女是無權利者、是不能獨立者。雖然這樣，但她們的地位，比較以後的資本主義時代——商業資本和手工業作坊的全盛時代，却還要高！

在貴族諸侯階級，婦女作爲組織者而保持相當的特權；她們對於別一階級的支配權，和一定的財產優越權等問題上，都還被承認有相當的權利。然而在丈夫面前，她仍是無權力的；在法律上，也得完全服從丈夫。雖然在市民階級也是同樣。女手工業者作爲手工業的代表而保持她的權力；但是在家族中，很明確地父權是支配着妻和子女。即使在農民社會，也存在着和這同樣的關係。理論上農民雖還追憶着過去的如何把婦女當做自己經濟的象徵，還把她們作爲一家的承擔人，作爲經濟上的主要生產者而尊敬着（特別在德意志民族中）；然而在家庭生活，她已是丈夫的婢女和奴隸了。

在封建經濟之下，婦女的地位如何，已在上述的情形之中表明。

婦女爲了要從這樣地束縛着的，重重壓迫的像婢女和無權利的女奴隸那樣屈

辱地位中解放出來，不得不再經過一個自己的生活階段。這就是克服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的工資勞動的殘酷而勞苦的生活。資本主義把婦女引入生產勞動和社會的勞動之中，替婦女準備了爲要求男女同權和解放而鬥爭的基礎，而且使她們獲得了解放的可能。

徹底的解放婦女，只有在把婦女的力量，爲着集團的繁榮而很巧妙地應用的新經濟形態——社會主義生產——中才能完成。

### 考 參 書

- (一) 皮域海爾的中世紀的勞動問題
- (二) 加爾·考次基的中世紀的勞動問題
- (三) 麗照·普萊恩及倍倍爾的著作之歷史部份

## 第五章 商業資本發展期和手工業作坊初期的婦

### 女地位

封建貴族的經濟組織，既高度發展，農奴勞動就開始成爲生產發展的障礙。由於經濟發展必然的法則，起而代替舊經濟組織的，是從交換制度中生長出來的新的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經濟。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資本主義的成熟形態，不是一時就突然出現的，它會經過幾個階段。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形態，一方面是商業中的資本集中，另一方面是手工業作坊中的資本集中，手工業作坊漸漸地變成工場製造所（到十八世紀末），工業資本凌駕在商業資本之上，在國民經濟中開始佔了支配的地位。同時就是無限制的競爭。大企業大資本家和多數小生產者之間，經過了激烈的鬥爭，後者就

完全沒落。於是勞動市場經常充滿了失業的隊伍。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隨着大規模的生產的勝利，大資本家結合的組織，即所謂辛狄卡的制度就確立起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新力量——金融資本出現了。

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各國，生產過剩和蓄積着的資本，要求有利的投資地方，結果資本主義各國立刻走到掠奪殖民地的路上。這是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階段，也是最成熟的形態。此後這種形態，成爲生產力廣泛的發展障礙物，於是這種生產組織就必然的崩壞了。血的道路已經在向另一個完成的新經濟組織，即社會主義轉向了。這種經濟組織保證着經濟創造的領域，和勞動集團的勞動力的發展。

下面我們來考察一下商業資本發展時期和資本主義初期的情形。

首先我們看到，在封建經濟組織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尖銳地鬥爭的時代——在資本主義開始克服古老的自然經濟組織的常見——某一國家，例如意大利，在



十二世紀初期已經開始這一過程；還有別的國家，例如法國英國在十四世紀初就開始了這種過程，德國比較遲一點，到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之間才開始的。俄國在彼得大帝時代（十八世紀初）方才開始，到十九世紀才廣泛地展開。東洋各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這一過程。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被各不相同的條件所支配，所以不能用同樣的速度進行。然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一般形態，在任何地方都相同。這一階段對於此後婦女命運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對於這一時代要稍稍詳細地說明一下。

資本主義的特徵是什麼呢？資本主義經濟和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什麼不同呢？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它並不是以農奴勞動為基礎，而是以自由工·銀·勞·動·者·的·勞·動·為·基·礎·的。在交換制度不很發達的自然經濟之下，生產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市場，而是爲了直接的消費。在行會手工業者的生產形態之下，行會手工業者爲了定貨者而勞動，因此市場非常狹隘。行會手工業者不是出賣自己的

勞力，而是出賣自己的生產物。在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之下，自由的工銀勞動者，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行會手工業者生產之下，師傅並不關心勞動生產率，因為有固定的定貨者，而生產物的價格，又有行會規定，這種情形，使生產力發達非常緩慢。在資本主義之下，則企業家和經紀人不停地追求利潤，一方面努力擴大自己的市場，另一方面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企業的種類也擴大了。他們為要達到這種目的，於是實施新的生產形態（例如手工作坊的組織）或使技術發展。行會的師傅恐懼競爭，熱烈地反對增加徒弟——手工業者的數量——換言之，就是防止勞動者數量的增加；和這相反，企業家却關心於佔有許多廉價的勞動力。由於這樣的要求，於是開了將婦女引入生產的大道。這種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大約是在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甚至——十八世紀之中。這一個時代凡是沒有很多財產的人，都覺得是最苦痛，也是意味全人類急轉突變的時代；是沒落的貴族階級，同新興布爾喬亞，發生激烈內戰的時代——舊的生產組

織崩壞，和新的經濟組織產生的苦惱時代。都市和農村都荒廢起來，乞食者浮浪者無家者失業者羣都空前的增多，特別是投到勞動市場上的孤立無援的婦女數量，呈現了空前的數量。在這中間，有沒落的手工業者的妻，也有從地主的暴壓下逃出來的農民的妻，此外還有民族戰爭和內戰中陣亡的兵士的寡婦們，和失掉兩親的孤兒們，無量數地流浪在街頭。這種被飢餓逼迫而無所寄托的女流浪者，充滿了都市，擁擠在街頭。無家可歸的失業婦女中，大部份造成了賣笑婦的洪流。其餘一部份不得不站在作坊的門前，出賣低廉的——比資本主義發展期更低廉的——勞動力。然而師傅的女助手們，已在作坊中有了鞏固的基礎。這些都是手工業者的妻和有小技才的手工業者的女兒，她們認為熟悉工作，乃是獲得較好的丈夫的可能條件。價格低廉的婦女勞動，從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初期，充滿了作坊。狼狽的行會，爲了對付婦女的競爭，不得不設立各種規則，防止婦女加入作坊。有種行會的規則禁止採用女徒弟，別的行會禁止婦女參加若干種職業。

花邊從來是婦女的工作，然而在法國一六四〇年的法律上，竟禁止婦女參加這種職業。飢餓貧困，無所依靠的婦女，自然不得不在禁止法所禁止掉的工作以外，另找別的工作；不得不在男子所沒有插足的職業中去找飯碗。在這種場合，婦女意識到自己困苦的地位——自己的勞動力走向無價值的道路，因而地位便只有更惡化。

從十三世紀末到十四世紀初，女修道院的數量很快地增加，這並不是不可思議的現象。本來女修道院，是沒有任何保護的孤獨的農婦和女市民，以及貧困而無所寄托，從主人和富人的抑壓下逃生出來的婦女的避難場所；上層婦女們，也有從夫、父的壓迫下逃出來，而托庇於女修道院的。在這樣情形之下，到了中世紀的末年，竟有專為孤獨的婦女，姑娘和寡婦而開始設立名為「神之家」的特殊的避難所。這許多「家」，普通是用慈善家的私財來維持的；他們希望從這種慈善事業裏，挽救自己的靈魂。「神之家」同勞動公社那樣，似乎是勞動婦女特殊

的寄宿舍，在這裏被嚴格的勞動制度所支配着。加入這裏的婦女們，不得不嚴格地遵守獨身主義，履行分給她的各種各樣的工作。她們和女市民穿着不同的衣服，頭上扎着白布。

（註）這種「家」的創始者是基督教信徒倍格。意大利的「倍格之家」，在十二世紀已經盛行，到十三世紀末年開始衰落。

收容在這種「家」中間的婦女們，依賴自己的勞動而生活。她們看護病人，答應城市官吏和個人的招請，做着各種工作。這許多「神之家」，在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中間，是很興盛的。但是此後因環境變化——新興手工業作坊的工業勞動已吸收了許多孤獨的婦女，使她們漸漸獲得工作——結果「神之家」就開始衰微了。然而即使在此後的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靠着各種各樣教會和同盟的幫助，婦女還努力同惡化生活和勞動條件相鬥爭。

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歷史上用「復興期」的美名稱呼它。其實稱作資本主

義的萌芽時代，反比較妥當。這時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形態已經過去了。新的經濟組織應生產發展而產生了。有的是勃然抬頭的商業資本，巧妙地運用着有利的資本，爲了獲得較多的蓄積和利息，投資於各地。拿了鞭子追打農奴的貴族地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代替它而興起的是企業家和經紀人，購買無產者的勞動力，使新興無產者生活窮困，因而充實自己的私腹的。不受任何方面擁護和支持的無權利的無產婦女，便成爲新興的剝削者——企業家的——最初的獵獲物。和被行會的規則所十分保障十分擁護的行會手工業生產同時，新的工業部門——家庭手工業生產興起了。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家庭手工業幾乎普及於全歐洲各國。

家庭手工業生產形態，是從行會手工業勞動到工銀勞動的過渡。家庭手工業形態的特點，就是行會手工業生產，普通在手工業者 and 定貨者之間沒有經紀人存在；而家庭手工業生產，手工業者要把自己的生產品，經過經紀人之手，而賣到未確定的市場上去。家庭手工業者把自己生產物的一部份，就是一定量的利潤分

給經紀人。因此家庭手工業者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勞動生產率，以求維持自己最小限度的生活，即獲得自己生活所必要的一切。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達；但是和這同時，也確立了一種勞動榨取形態。隨着手工業者數量的增加，以及必須再生產的原料的增加——爲了應付最小限度的生活的必要——，手工業者不僅把自己的生產物賣給經紀人，還要靠他供給原料。這樣就轉向到契約的支付，甚至於工銀勞動了。

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在意大利的都市中，與自由的行會手工業的消滅同時，家庭手工業就興盛起來了。這特別是在婦女所做的紡織刺繡以及其他勞動部門中，最爲發達。在弗拉曼基亞（荷蘭），就是利用了家庭手工業的方法，使呢絨和棉織物的製造發達起來。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英國呢絨手工業已掌握在經紀人、企業家手裏，手工業者是爲他們而勞動。

家庭手工業制度不僅把無家可歸的婦女引入生產之中，也給與農婦在家庭中

參加社會生產的可能，在貴族地主任意專橫的黑暗時代，家庭手工業制度大大地幫助了農民。然而，隨着經過經紀人而引入生產中的手工業者數量的增多，主人經紀人的榨取，便異常露骨，農民地位漸漸地困苦起來了。

處在最困難的境地的是婦女。主人即經紀人對於愚昧的農婦是用向地主控告的方法來加以威脅，對於孤獨的女市民，則用把她們趕到浮浪者和賣笑婦的隊伍中去（在當時這種浮浪者和賣笑婦是受着非常屈辱的重刑的）的方法來威脅她們。因此婦女手工業者——後來的手工業作坊的女工，便不得不遵守任意束縛她們的蜘蛛即經紀人的命令了。

在家庭手工業全盛時期，婦女在家庭中受着丈夫的束縛而工作，仍是無權利者，只有做行會會員生產者的時候，在都市裏却受到某種程度的尊敬，可是做家庭手工業者，就連這種最後的特權也被剝奪了。她們為企業家經紀人所做的長時間的工作，只被認為是單純的補助的家事工作。在行會手工業生產時代，婦女勞



動者所受的比較合理的行會規定，都爲家庭手工業者的勞動婦女所破壞了，直到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爲了企業家而在家庭內工作的女工，還是在最惡劣的條件下生活。家庭內的生產制度，常被稱爲「血汗制度」，這並不是偶然的。家庭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的鞭策，就是無限制的長時間的勞動和低廉的工資。爲了無組織的手工業者漸漸地增加而發生的競爭，和從主人經紀人那邊取得定貨的恐怖，就極度地增加他們的勞動時間。十四五小時的勞動時間，在她們是很普通的事情。而且勞動時間愈長，工資愈便宜。這樣家庭手工業者的生活惡化了。同家庭手工業制度並存的，婦女公然出賣肉體的事情也多起來了。在新興資本主義基礎鞏固的任何工業都市裏，在「賣笑窟」的範圍以外，還充滿了無數的賣笑婦，這種事情並不是不可思議的。

普通當作經紀人而出現的是商人，是勇敢的企業者。他們爲了要求新的市場，竟敢長途旅行，因此使人類的知識和見聞豐富並廣佈開來。爲探求新的市

場而發見了美洲（一四九三年）和到印度的航路。在資本家中勃然抬頭的企業家們，要求着科學的發達，和思想的自由。對於以前的習慣和法律的盲目服從，和對於權力的崇拜，這一切封建主義的遺物，會妨礙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新興的布爾喬亞推翻了古老的牆垣，勇敢地前進；終於得到了支配的勢力。他們推翻了天主教的僧侶神聖的主張，在宗教戰爭的旗幟之下，成爲叛徒而反抗封建領主的權力。甚至承認資本比權位和官職有更大的權力，比收入很少的領地有更高的價值。

這是經濟組織走向新的生產形態的轉換時代。這是憂鬱窮困而殘忍的中世紀行將幻滅而走向另一光明的時代，這是思想和科學異常發展的時代，是人類開始認識宇宙的運動法則，發見許多科學的真理的時代。財富非常迅速地向一個人的手裏積蓄，因而大衆的貧困化用驚人的速度進行，社會已經不是根據中世紀那樣的身份來劃分，而是分裂成兩個基本的敵對階層——財產的私有者和無產者。貴

族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更深一層的尖銳化。貨幣經濟使農民一致向地主的貢納由現物而為現金。農民在痛苦之下，用叛亂來回答地主。新興布爾喬亞，和路德派和清教徒派的「新教」擁護者形成了同一隊伍。

在全歐洲，市民戰爭的波濤，漸漸地高漲起來了。都市裏，商業資本即都市的富豪和「行會」、「家庭手工業者」這兩種手工業者之間，發生了階級的分化。而且在這兩種形態的手工業者中間，爲了競爭而進行着猛烈的鬥爭和排擠。都市的權力握在富豪商人之手，他們的權力甚至逐漸向農村伸展。這時因爲繳納現金佃租而貧窮衰落的農民，只得努力從事家庭手工業，用所得到的工資來支付可咀咒的佃租。生活只有絕望的鬥爭和嫉忌的排擠兩條路，古老的封建世界漸漸將滅亡，新興資本主義世界漸漸開始。

在這經濟轉換時期，婦女的地位怎樣呢？

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新法律中，可以看出婦女仍是被男子——父和夫

——束縛着的。同中世紀比較起來，不僅沒有改善，並且在這偉大的「復興期」裏反更惡化了。根據中世紀的法律，妻子可以做丈夫的臣僕的支配者；新的「復興期」的法律，則以資本的集中為目的，把妻子的財產劃歸丈夫所有。根據法律規定，男子不受通姦的何種制裁，妻子却須因通姦而受嚴厲的處罰。不管婦女墮落的原因為何，而把婦女的賣笑看成墮落行為，因而加以嚴罰。

她們既沒有從中世紀的暴壓下解放出來，而參加布爾喬亞支配着的新世界，她們的處境，比前更糟。婦女在這個時候，不過受了一切歷史所沒有經驗到的新的無權利、隸屬、和榨取罷了。我們站在這光明和黑暗的交錯時代，看到了站在社會生活兩種對立圈之上的婦女的姿態。一方面看見站在「慈悲」的工作授與者——經紀人乃至介紹人——之前的婦女手工業者逐漸增加，她們為着無權利而淪於貧困和為着勞動及作為家族手工業者而消瘦着。另一方面看見上層的貴族婦女沈醉於奢侈，不斷地要求享樂和安慰。這許多有產婦女們，承受世襲財產的伯爵

或侯爵夫人們，把一切家事放在雇用的婢僕身上，甚至於連孩子的教育，也要委於他人之手。這許多婦女，雖沒有市民的社會的權利。但是做着富豪、貴族、幸運者的妻子，靠着富裕地位，是否一切生活的幸福，都能得到保障呢？從金錢中打算出來的結婚，她們的生活的無味於此可見。但是教會對於貴婦人和富豪的妻子的壓迫減少了以後，她們既無僧侶來說教，又無何種嚴格的法律來制裁，由此她們就知道了所謂戀愛自由的道路。

燦爛的文藝復興期，是以愛戀的享樂自由和道德的鬆懈這兩件事作為裝璜的。而且當時的作家們，這些纖細的生活紀錄者，從普克基沃開始，即用那直率的筆調，描寫出這許多道德來。

「復興期」的有產層婦女，是沈醉在修飾和享樂之中，成為沒有靈魂的虛偽的裝飾品，男子的玩物，和社會的寄生蟲。中世紀的尼姑的極度嚴格的姿態，以及教孩子們讀書和研究科學，在各方面籌劃堡壘經濟，並當堡壘被襲擊時，勇敢

地在堡壘內做防禦工作的封建諸侯妻子們的姿態，已經完全消失了。充滿着愉快的笑容的美女們，穿着婀娜的綢衣，戴着高貴的寶石，貪污地過着享樂的生活。至於下層的家庭手工業者和農婦，則被壓抑在不能忍受的繁重勞動下，喘不過氣來。被雇在手工坊中的女工們，用暗淡的眼光，恐懼着競爭者的把她逐出街上，同時瞻望着自己的命運。這時代，一方面是愉快的宴會，另一方面是飢餓和無所賴的貧困！笑和淚！鮮明對照着的時代！這是人類階級分化急激發展着的時代，金錢權力種着極深的根的時代！自由工銀勞動者日益增加的時代！

但是如果我們一味地記述這種壞的方面，那還不能正確地觀察「復興期」的。過去文明的希臘和羅馬，不是尊重一般人類而是尊重市民的。在中世紀人類的地位是由各種尊稱和官職——商人、手工業者、貴族、僧侶來決定的。至於新興布爾喬亞層，則主張承認各個人的人格和權利。在資本主義初期，各個人的價值及其才能勇敢意志力智慧等，決定着他們——商人以及企業家的幸福。因此布

爾喬亞們的主張，認為不僅財富對於官職和尊稱是處於對立的地位，還有各個人的才能和個人的品質，也與他的出身階級毫無關係，對於人類的這種新的評價，在對於婦女態度中，在某程度內也被反映着。但這僅僅限於布爾喬亞範圍以內，窮苦勞動婦女的人格，是不被打算在內的。

在這轉換時期，對於新興布爾喬亞婦女，確給與某種人格的承認和有限度的自由；婦女也被允許接近了思想和科學的寶庫，婦女不僅能隻身參加於熱鬧的宴會中，還能夠跟着當時進步的思想家而發展自己的知識，直接間接地影響政治。我們在「復興期」中，能夠看見許多強有力的光榮的女性。有許多婦女，同當時哲學家 and 文藝家往來，在自己周圍創造團體，歡迎進步的人，保護學者美術家和詩人們。鐵血肉搏，殘忍難堪的歐洲內戰以及表現着兩種階層——貴族和布爾喬亞——鬥爭的宗教戰爭中，婦女在這兩個對立的陣營裏，常常積極地參加戰爭和活動。她們抱着堅固的意志和沈着的態度，屢次使她們的敵人感歎。從十六世紀

以來，在極旺盛的許多內戰中。法國布爾喬亞派和天主教封建諸侯的鬥爭，德國的新教派和舊教派的鬥爭，英國的清教派和天主教派的鬥爭——往往使婦女離開家族和丈夫，剝奪她們的財產和家畜，投入牢獄，把她們和男子同樣處以死刑。然而她們在內戰勝敗可決的時候，決不表示讓步。這種階級的良心，比較對於男子意志的盲目的服從，要強得多啦，這裏最大原因由於在內戰激烈的時候，就連主張婦女應該在家事上工作的丈夫和父親們，也爲了自己社會集團的利益，而把她們捲入政治和鬥爭的漩渦中。教會的說教者路德卡因爾秦戈爾等的妻子，不僅是家庭中的妻子，而且是丈夫的熱心的信徒和同志。總而言之，在顛覆封建世界的威信，爲布爾喬亞勢力開闢道路的工作中——教會的說教——婦女是盡了很大的任務的。即使貴婦人和王妃，也在那宮殿中間，藏匿清教派的說教者和布爾喬亞的代表。自己並參加宣傳，出席秘密集會，支持新興階級，教育自己的孩子。很多婦女比較男子更熱烈的同情於新教，成爲新思想的崇拜者。她們著書擁護清



教派，抱着古代基督教受難者那樣的英雄主義，勇敢地努力地鼓勵意志薄弱的躊躇者。

許多貴族婦女，大多成爲改革者的同志。假使我們稍稍考慮一下，就能理解究竟什麼東西在喚起她們。布爾喬亞的統治，限制丈夫對於婦女和父親對於子女的無限權力，布爾喬亞世界的勝利，澈底打擊着應該咒罵的父權制度。但是這雖然僅限於布爾喬亞的有產階層婦女範圍之中，然而對於作爲人類的她們，畢竟被承認有一定的權利了，因此婦女就同熱烈的改革家，人道主義者，當時進步的思想家接近起來。聰明的法蘭西公主夫愛拉的留娜達，甚至爲了站在清教派的隊伍中而拋棄了家族和財富，這樣燦爛的女性也出現了，還有爲了反抗沙王獨裁而站在阿滑可莫夫派民主主義，異教徒運動隊伍中的瑪洛沙滑那樣典型的俄羅斯貴婦人也出現了。波希米亞女王的女兒，認爲自己神聖的靈魂神化了，因而創造異教。受過極高教養的她，竟拋棄祖國而走到米蘭，在那邊有過熱烈的演說，引動

許多站在兩個時代的分岐點上，探求新的真理的人們，於是這個異教竟冠上創始者的婦女名字：華依爾海爾米斯脫，甚至許多修道士祭司和僧侶，都傾向於她。在佛羅蘭斯，由於當地一個婦女的雄辯的說教，天主教的異教——新教，非常快地普及起來。在編年史中曾經如此記載：「她的說話，使許多人參加新教。」

這一時代的政治，也被婦女的某種勢力所影響着。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法蘭西政治上，婦女會直接間接地給與影響。例如：參加陰謀的天主教女教徒聰明狡滑的加查林·梅奇基殘殺清教徒的「華福絡姆之一夜」，以及和豪俠的里西爾個別交鋒的奧司泰利的阿恩娜等等，都有過這樣的作用的。英格蘭的里沙斯和蘇格蘭的瑪麗亞斯琪阿徒兩女王會成爲兩個相鬥爭的集團——經濟上落伍的蘇格蘭的封建秩序和工業發展的英格蘭的序秩——的指導者。俄羅斯彼得大帝的姊姊沙菲治女帝，在正趨於消滅的貴族權力的擁護者——封侯們的陰謀中，曾起了中心作用。婦女們積極參加新時代的殘忍內戰的實例，在歷史上有很多。雖然在這時

代，還殘留着把婦女作爲無權利，被男子束縛得不平等；但是婦女却以偉人的資格，登上舞台，甚至負起了外交使命。在法國，從推拉克依夫人以後，更繼續派遣了倍尼治依和克配麗愛爾夫人到波蘭去。在波蘭選舉恩基依斯開王位的非常的重要的交涉中，法國會派遣了女外交家加查林·惟可樓爾瑪作代表團的主席。

在復興期和改革期的婦女，由於事物的力量，不僅在政治上，就是市民戰爭中也積極地參加，而且還參與科學、藝術、思想上的工作。當時的意大利是偉大的發見，思想和創造的搖籃。在這裏，因有適宜的地勢，且商業資本的發達，比其他各國在前，加之工業資本也急激地開始發達。所以意大利商業的中心地，在十三世紀初頭已經發見手工業作坊。因經濟發展比其他各國都早，隨着布爾喬亞勢力的發達，在知識和藝術的各部門中，早有許多成名的婦女出現。許多歷史家說「復興期」是女性學者的時代。在「復興期」夫愛拉爾拿教授的女兒安凌皮亞·莫徒，是學識非常廣博的人，她的辯論天才，竟使復興時代的每個人都爲她而精

神恍惚——這事情雖然到現在還被我們傳頌着。安凌皮亞是黑拉爾地方，熱烈擁護新教運動的推奈達的朋友，做了新學說的擁護者，科學者的妻子，和丈夫同時體驗着慘苦的市民戰爭。同時代的別一個婦女學者依沙達拿樓爾，是全意大利著名的雄辯家，甚至羅馬法王也希望親身來聽她的講學。依普爾德·斯夫耳也是擁護藝術而且立即捲入了政治漩渦之中的一人。大美術家密開朗琪的女朋友，皮可徒麗阿·可倫娜，因為她的偉大的精神，和有力而美麗的相貌，到現在還被人崇拜。在當時的西班牙，婦女理論家各爾德滑地方的依沙白和巴爾塞倫地方的莫樓爾，也是很有名的。英國比意大利稍後才達復興的全盛時期，但至十六世紀也有許多有名的女性學者出世。女王依里沙白對於拉丁語有深切的研究。古來伊在學識廣博的一點上是有名的。哲學者倍根的母親和亨利八世的教師的女兒，都是有名的有極高的科學修養的人；此外空想社會主義者穆勒的女兒琪徒納也是有名。此外娜滑爾地方的法蘭西女王瑪爾格蘭（法蘭西斯哥一世的妹妹），受意大利派

的影響而成爲有名的小說家。她的成堆的出版物中，和朋友的通訊集到現在還有相當的興味。語言學者的女兒安娜達西亞會翻譯荷馬，擁護不朽的美麗的希臘神話。並著有安琪塞依和伊麗阿達兩書。婦女有學問，成爲一時流行的風氣，瑪里安在那莫卜里愛旅館一作品中，對於婦女的努力想做「青踏」(學問廣博的婦女的象徵)，加以諷刺。在意大利「復興期」中，婦女一時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這裏一部分婦女界，確是開闢了一條新道路：藉教養和知識力來獲得獨立的生活，現在來探求一下它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吧。市民戰爭，一方面使經濟和舊的生產形態破壞，另一方面使家族漸漸地不穩固起來。屢次激發的經濟革命，不僅把無產層婦女——農婦及行會手工業者的女兒，甚至把富裕的布爾喬亞和貴族出身的婦女，也投入生活鬥爭的漩渦中。不幸的農婦和衰落的手工業者的女兒，在手工業中求得生活，中產階層的婦女，爲了保證自己生活，也急於學問和知識的獲得。這時代許多有名的婦女，都是學校教授，小說作家，理論家，醫師和學

者的女兒。有先見之明的父親，常常努力鼓勵自己的女兒，使她們成爲握有可靠的生活鬥爭的手段，努力使她們成爲任何科學部門的傑出分子。在這樣混亂的時代，婦女們覺得連婚嫁也不是可靠的安息所，覺得自己的事情，必須自己來考慮。覺得要想從不幸和物質的窮困之中脫逃出來，必須準備好自己的職業。因此她們首先熱心地要求獲得婦女教育，她們爲要獲得這種地位的被承認而熱烈地叫喊着；她們說婦女的本質並不劣於男子，並且許多方面比男子優越；所有這些並不足爲奇。薔薇的情史和婦女之街的作者可里斯基娜——她是十五世紀時代生於法蘭西的皮塞地方，是以這種精神來從事宜傳的。十七世紀英國的瑪莉奧斯頓，她是由於那本巨著擁護婦女的論文集而成名的，更以最大的熱情擁護婦女權利，要求兩性教育平等的。「復興期」小說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克莫排納爾在他的空想著作太陽的共和國中，不僅主張婦女受平等教育，並要求參與一切種類的職業，「婦女必須參加戰爭與和平及其他一切事業」。

布爾喬亞爲其自身的目的而利用婦女，這一時代的市民戰爭，自然是容納這種革命的見解的。然而這種見解，並不合於布爾喬亞生活的一般組織，並且這種幸福，與家庭生活很不利，因此市民戰爭的尖銳時代一經過去，布爾喬亞便毫不介意地把對於自己不便的主義，全部廢棄了。「復興」期的女性學者政治家們，隨着新的經濟組織的確立，工業資本的鞏固，直到十九世紀爲止，這樣一個長的時期中，她們被禁閉在狹隘的家庭的範圍中，成爲家庭事務的負擔者。

爲什麼婦女在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發揮了自己的力量以後，又毫無動靜地回到家庭中去了呢？

原來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和權利，由她們在生產中的職務決定的。「復興」期和改革期中，大多數的婦女依舊被丈夫或者父親——扶養者束縛着。只有少數婦女個別地跨進了獨立生活之路；此外，爲求自己勞動力的銷路而走到市場上的無產階層婦女的隊伍，雖然已經增加，但是比了依靠丈夫生活的農婦和手工業者

的女兒和妻子，還是少數。婦女在國民經濟生產方面，實際上沒有平等的價值，那麼社會自然不會承認婦女的平等權。爲了要考察在這光輝的轉換時代——基於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發展的時代的婦女的地位，必須更進一步講到這一時代的另一特徵，手工業作坊的發達。

手工業作坊是從家庭手工業發達起來的。它是拿材料供給分散的手工業者，爲了方便搜集他們所有的生產品起見，統合許多家庭手工業者在一間屋子裏工作。資本家認爲要提高新的勞動組織的生產率，必須在作坊上嚴密地分工。勞動分工把勞動過程極度的簡單化了。勞動者在手工業作坊中，一年到頭担任簡單的工作，例如磨針尖的。儘有在這年中，只做這一乏味的工作。行會手工業者的勞動是複雜的，這必定要有熟練的準備。手工業作坊的勞動者和女工的工作，比較單純得多，而且不須要熟練，只要明白簡單的勞動方法，雖然隨便怎樣不熟練的人類，在最短期間就能夠熟習。在手工業作坊中，舊有的那種熟練勞動已經沒有



大的意義；手工業作坊，使繼續家庭手工業者，完全從屬於自己了。

自然，手工業作坊替未熟練的女工，開放了廣大的門戶，然而這決不是爲了這時代婦女的幸福，而爲她們開放獨立的工作門戶的。在整個手工業作坊時代中，我們可以看到，婦女默然在暗淡冒烟的小屋中，沒有何等光輝，而用自己的勞力，供給消費品和奢侈品給世界市場。婦女從早到晚只是繼續着紡織、刺繡、鞣皮、和做其他工作，做得背骨酸痛。她們的勞動能夠和她們的仇敵——行會的獨占者相競爭。因此所以法國無產階層婦女才熱心努力的想達到撤廢行會的限制，而且終於成功了。於是，她們認爲一七九一年這一事件——撤廢行會——乃是自己經濟解放的第一步，因而非常歡喜的祝賀着。行會的特質是把婦女完全趕進家庭中；當時的支配者却又叫她們回到廣大的十字街頭了。

婦女工銀勞動者經過着三種壓迫的歷史路程：第一在社會和國家中無權利，第二在家庭中被束縛和隸屬化，第三被資本毫不容赦的榨取着。

自由的婦女、手工業者，以及有完全權利的行會成員的婦女，同樣為市民而受着尊敬，參加都市的各種娛樂和集會等，已經成了歷史的事跡了。現在的無產婦女，在手工業作坊主人和經紀人的經濟榨取中，已逐漸陷落在深淵之中了。

家道稍好的手工業者、商人、農民的妻子們非常輕視手工業作坊的女工，認為她們是叛教徒和社會的光棍無賴和賣笑婦同樣。極端的窮乏，將婦女趕入手工業作坊中，使她們成為女工。這許多人，不單被人看作是不幸者，甚至被人看成卑賤的東西。為什麼對於工場勞動者會有這樣的態度呢？為什麼從當時的社會見地看來，從事於家事勞動，最少價值，最缺乏生產性的婦女，反比創造國民財富的女工值得尊敬些呢？這是因為在工場上在手工業作坊中的女工，是資本的工銀奴隸，是普羅里塔里亞。布爾喬亞世界看待普羅里塔里亞，剛剛像古代希臘的自由民看待沒有自由的奴隸同樣輕藐。在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的支配之下，尊敬，並不是給與創造價值的人，相反的却給與搜刮這許多價值的能手。認為國富

不是勞動者和女工們所創造，而是勞動的「組織者」——資本家們的節約、才能、和機敏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在此地更得特別提出的是：在手工業作坊時代，僅僅只有極少數婦女從事生產。婦女的不得已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只是偶然的現象。墮入了資本桎梏中的婦女，還期待着由於結婚的援助而走入正途，走到一般人認為是婦女唯一義務的家庭和廚房。然而這種毫無把握的期待，隨着大工廠的生產手段的發達和鞏固，不但成了泡影，且在原來的家族和社會的無權利之上，再加上了主人、資本家的權力。但是，這裏却創造了一個新的條件，就是她們參加了普羅里塔里亞的隊伍，平等地負着無產階級的苦痛和無權利的一半，使她們更有獲得解放的可能。婦女站在新的領野中，她的命運和全勞動者的命運密切地結合着。她們的因為參加家事而無價值化了的勞動，現在從國民經濟的見地來看，又成爲有價值的東西了。久已失掉的婦女平等權，只有在全勤勞大眾獲得了自己的權利，獲得了

政權，才能夠把它取回來。

參考書

- (一) 卡爾·考茨基的社會主義的先驅者
- (二) 巴拉巴拿滑女士著二個命運
- (三) 薄可洛夫斯基著俄國史
- (四) 西西可夫著婦女的歷史命運（五——七章）
- (五) 倍倍爾和麗麗普萊恩女士著作關於歷史的部份

## 第六章 大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婦女勞動

手工業作坊，隨着它的特徵——廣泛的勞動分業——在生產方面開闢了採用不熟練勞動的門徑。因為假如能採用不熟練的勞動力，工場主自然努力在自己最有利的情況下，採用廉價的勞動。這樣廉價的勞動力，就是婦女和兒童。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時，隨着手工業作坊生產的發達，婦女勞動已有顯著的增加。手工業作坊生產，和行會手工業生產不同的地方，就在勞動力的量，比勞動者的質，更能保證主人最大的利潤；這種利潤是由於勞動者和女工的剩餘勞動時間積集起來的。勞動者愈多，勞動時間愈長，則擁進企業家懷裏的金錢——即剩餘勞動時間也就愈多。資本很快的蓄積，人類走入了大資本生產時代，世界變化了！以工商業為中心的都市，對於那種為保護商業定期市和行會而羣集起來的封建城

市，已加以嚴重的壓迫，相互敵對。割據各處自成領主的侯爵和伯爵，現在已開始服從惟一的專制君主；人民則結合在民族中。這裏，工商業資本就操縱了政治。這時已和中世紀時代不同，民族國家的利益，占了都市與封侯的利益的上風，農業在國民經濟中，雖然依然保持着極大的意義，然而財富的基礎源泉的指標，漸漸地移向製造工業方面去了。首先是荷蘭英吉利法蘭西，其次是德意志奧大利，最後是俄羅斯（到十九世紀末漸漸走向大資本生產的途上）的資本主義之急速的發展，受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所發明的科學技術的影響是很多的。現在我們簡直不能想像沒有鐵道大工場電氣和電話的生活；然而我們的祖父們却以不可思議和懷疑的態度，對着這許多新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由於十八世紀的許多技術發明，一時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獲得了強固的基礎，一方面由於天才瓦特發明的蒸氣機，把勞動移轉到機械上去；另一方面手工業作坊中的生產過程機械化，也使發明家可能用機械來代替人類的勞動力。紡織機、繅織機、毛刷

機及其他無數的發明，到十八世紀末年，對於相互競爭的工廠生產的發展，給與了驚人的刺激。技術的改善，是增加利潤的契機。在手工勞動之下所發展的過去的時代中，要完成大的生產力，只有憑藉台目的的勞動組織。本來主人爲了提高利潤，在手工業作坊中，只要努力於巧妙地應用勞動分業的原則；現在要增加利潤，則已經不是在作坊中勞動者的人數，而是在於技術改良，機械和動力之是否存在的問題了。技術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從未有的高度，女工站在紡錘機械的前面，由管理一錘而增加到一千二百錘。過去每天只能準備幾個乃至一百左右框子的女工，現在能做更多的工作了。一個女工，由於機械的幫助，一天能夠造六十六萬隻針，代替了過去一百卅五個男子的勞動。搖機，能夠從一天織二十隻，提高到大打之多。手工勞動的部門，漸漸地被機械所代替，勞動生產率用驚人的速度增加。爲了大量的消費者的需要而用機械製造的商品，充滿了市場。隨着商品價值急速的創造和蓄積，工廠主和企業家們的財富，像魔術一般地增加。

但是，機械和動力手段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有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反而加強了他們對資本的束縛和隸屬。假使原來一天一個女工用手工能製造二十雙襪子，現在因為搖襪機的發明，可以比從前增加六十倍之多，就是一天能夠造到一千二百雙襪子。生產機械化，能使生活改善的事情，自然非常明白的。然而，在根深蒂固的私有財產制之下，人類是不能不顧到他的繼續生存的；資本家從發明家手裏買得了機械和動力，把這個發明作為自己的企業的利器，他雇用勞動者，使他們在企業中隨着勞動裝置而工作。主人的繁榮，就在於他佔有了勞動工具，他能把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六十倍，甚至更高的階段。工廠主爲了生產率，並不是給勞動者本身支付工資，只是爲了勞動力而支付罷了。工廠主的工作，是在怎樣從購買來的勞動力中得到更多的積蓄，因此生產機械化雖則極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並不能改善工銀勞動者和女工的生活；往往更使她們的生活惡化。生產機械化，在布爾喬亞學者、經濟學者和企業家認爲價值的真真源泉和創



造者，並不是活的人類的勞動力，而是死的機械力。資本家們大概知道：只要有機械就能獲得勞動者的勞動力；因此他們就生出這樣一個固定的觀念，以為如果只有勞動者，而沒有機械，他就不能在商品市場上競爭了。因此資本家常常把勞動力看作機械的附屬物。這裏不由得會想起對於牧畜民族中的婦女勞動的評價了。時那認為家畜是民族財富的源泉；照顧家畜的婦女，不過是有用動物的附屬物而已。在工廠中，隨着機械的產生，也會引起這種同樣的狀態；勞動是無價值化了。由於機械的應用，勞動者和女工的工銀不能提高，勤勞大眾的生活程度反而低落下來。漸漸肥大的利潤，使機械和企業都成為私有者的獨佔物。

這樣由於工廠工業的發展，資本蓄積的增加，企業家之間，引起了急激的競爭。資本家各自擴大其企業，拿自己的商品充滿在市場上，他們把自己商品的價格，比技術落後的競爭者的商品價格，更加抑低；這樣企圖獲得最大的利潤。小規模的經營主，尤其是行會手工業者自然沒落了。他們自身或者他們家族中的隨

便那一個，不得不站在使他們沒落的大企業家工廠事務所的門口，找求職業。資本的集中——換一句話說，即資本聚集在急激致富的大企業家之手——勞動者們的沒落，這就是象徵着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大資本生產的發展時代的兩個基本過程。

小生產者的沒落和貧窮化的過程，替勞動市場上準備了過剩的勞動力。此外大地主榨取無力繳租的農民及農業方法的落後，也把農民從土地上驅逐出來，因此從農村流入都市的人數增加，又使在勞動市場上的失業者羣急激澎大了。由於過剩的勞動充滿市場的結果，到了十九世紀，竟有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出現，主張限制勞動者的產兒，這樣可以減少市場上勞動力過剩的情形，可以緩和勞動力出賣的競爭，以求改善勞動者的狀態，不消說，這種學說，很明顯地是不能推廣的；然而由這種學說證明了人類受經濟的限制。在自然經濟時代和手工業作坊時代，一般認為經濟的反映，是由勞動者數量而決定的，家族人口多的，是「受神

的恩惠」，勞動者愈多，財富愈多。到了認為財富的源泉是機械的機械生產的時代，却發生了這樣一個思想，認為減少活的勞動力的預備軍，就是剷除貧窮的根源，很明白的，這種布爾喬亞理論，根本是錯誤的，是受實際生活所排斥的。相反的，現在我們是站在新的危險之前了——在新的制度之下，爲了要完成未來的生產發展的偉大使命，反要感到勞動力的不足了。從十八世紀末以來，在失業者羣之中，我們看到了出賣勞動力（這在資本家和工廠主看來僱用她們完全是自己的良心）的婦女羣漸漸地多起來。假使他不僱用她們，那麼除買淫以外，婦女就沒有別的道路；所以在婦女的工銀勞動者的背後，站着一個所謂賣淫的黑影。隨着婦女勞動廣泛的發展，表示婦女買淫的發達的數字也跟着高了起來。在手工業作坊生產時代和行會手工業的崩壞時期，勞動婦女受着外界強有力的壓迫，被迫着負擔力不能勝的勞動，沒有權利也沒有歡樂地生活着。然而，從資本主義勝利了以後，在婦女所投入的地獄那樣的工廠的面前，則過去一切的悲慘，還要減

色。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寫的英國勞動階級狀態一書中，鮮明地描寫出資本主義奴隸的殘忍。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工廠女工生活的主要姿態是這樣的：超過十二小時以上的無限長的勞動時間，低廉的工資，憂鬱而不健康的污穢的住宅，沒有勞動保險和社會保險，家族離散，職業疾病的增加，早期夭亡，不斷的失業的威脅，資本家和工頭對於勞動者和女工的暴壓的權力——勤勞大眾還沒有組織，不知道藉勞動組合和不知道靠自己政黨的援助，而擁護自己的利益。這是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工場女工的生活姿態。資本家努力利用比較便宜的婦女勞動，工廠主常說婦女勞動在本質上和男子勞動不同。此外，布爾喬亞思想家們，也證明資本家的意見，以為婦女天性比男子低劣。其實不是天性，而是社會的原因；這種社會的原因，直到現在，還影響着資本主義諸國對於婦女勞動以很低的評價。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大多數的婦女，並未被送進商品市場從事價值生產；只是做着缺乏生產性的家事工作。因此發生了一切婦女勞動的生產性低劣的

謬見。

婦女勞動力便宜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決定男工工銀的場合，不僅考慮男子自己，就是他的家族——他必須扶養的妻子——也必須估計在內。如果勞動工銀，不能保證勞動者的家族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時，勞動者就不得不脫離生產部門；或者，勞動者和他的家族就要餓死；最後，勞動者的妻和子就不得不出外做工。然而資本家們，認為婦女主要的給養，是負擔在「扶養者」丈夫的雙肩上；妻子不過爲了使家計得以裏外照應，所以必須做些補助的工作；於是婦女勞動乃是補助的職業。這自然只有資本家才支持這種見解，勞動者自身却還沒有認識自己利益的能力。因此，她們也就不理解這兩種現象：即婦女勞動和大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着，和已被引入於全社會的價值生產的領域內的婦女，已經決不能再回到家事工作上。隨着工廠工業的擴大和資本主義的強化，婦女不僅要給養自己，還有孩子和年老的兩親，甚至於常常要供養失業的有病的丈夫。像

這樣獨立工作的婦女數量，雖然不斷地增加，但是經過十九世紀以後，婦女勞動比男子勞動仍舊受到較低的評價。使女工受到較低的工資的第三個原因，是熟練的婦女勞動的缺乏——特別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在要找職業的失業婦女中，不過只有極小一部份，能夠自己生活而保有職業；大多數的婦女都是從零落的困苦的家計跑到機械面前去的，她們既不熟練，也沒有勞動的預備知識。婦女被貧困和饑餓所追迫，她們向來又沒有自己養活自己的習慣，在長時期中培植了隸屬性和無權利的她們，任何勞動條件都能同意。而且資本家工場主在理論方面，還認為婦女天性和男子不同，「她的勞動和男子的勞動沒有同樣的價值」！然而在實際上，代替男子地位的便宜的婦女勞動出現以後，進一步男子就被解雇了。而且，生產的增加，並不因此稍些遲一點。在此我們可以證明，婦女勞動力並不比男子惡劣。隨着機械生產的發展，所謂熟練的勞動的作用，漸漸地減少；這特別在某幾種生產部門（織物、烟草、化學工業和其他）更是顯著。在這些生產部門裏，

未熟練的婦女勞動的急激發展，簡直使男工深深地感到，這是對他們生活的直接威脅。婦女這種低廉的勞動，不僅把男子從工廠裏驅逐出來，更使男工受到這種影響而降低工資。在那種生產部門，婦女參加的愈多，那麼男子的工資愈低；而且男工的工銀愈低，勞動婦女——大多數的勤勞大眾的妻子和女兒，就因此不得不找補助工作。這兩種事實，在此地發生了因果關係。

勞動階級，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才由於勞動組合和政治團體的援助而消滅了男女工對立的成見。隨着勤勞大眾意識的發達，他們很明白的知道，女工並不是男工的「憎惡的仇敵」，她和男工們自身，同樣成爲勤勞大眾陣線的成員，只有藉有組織的共同的力量，才能反攻資本主義的重負。但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男工們在勞動市場上，曾以非常的惡意對付自己的競爭者——婦女。有許多場合，竟把婦女關在自己陣線——擁護同伴的利益而鬥爭的陣線——之外。

女工的工銀，普通是男工的一半。在資本主義很發達的許多國家，女工和男

工的工資，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由於鞏固的勞動團體的壓迫，多少要平均一點。在俄國革命的前夜，婦女佔男工的三分之二，但是當時不過只給一半工資。而在東洋——日本安南——雖在現在，女工工資還比男工少得多啦。

一方面是低廉的工銀，另一方面是無限長的勞動時間和惡劣的勞動條件（使流產和生產而死的有害婦女身體的勞動條件），這是在大資本主義生產時代，女工生活條件的特徵。資本主義愈發展，婦女的境遇愈是困苦。然而，由於生產勞動——創造狹隘的家事以外的可以計算入國民經濟中的價值的勞動——使婦女受到不堪名狀的痛苦，婦女們也就被引導到解放的途上了。我們知道，由於婦女在國民經濟、生產上的職務，決定了她的地位。多數的婦女盡力在家事勞動中的時候，對於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努力都只會成爲空中樓閣；因爲沒有鞏固的經濟基礎啊。從大工場生產利用了幾百萬的婦女勞動力，使其參加工作以後，事態就漸漸地改變了。她們把家事工作丟在腦後，職業勞動已從「例外的」過渡的現象，變



成了正常的習慣的必然的現象。

十九世紀是婦女命運史上的分水嶺。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諸國中，婦女從事獨立工作的，已經佔婦女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在手工業作坊時代，參加工銀勞動的，只有寡婦孤兒和無所寄托的婦女。在十九世紀則大約半數的女工——已是有夫之婦了。爲什麼這樣呢？這是因爲丈夫的工銀已經不能支持工作，並且結婚也已經不是婦女的安息所了。爲了生存，爲了供養兒女，夫妻不能不共同勞動，丈夫不是唯一的扶養者，妻子漸漸地把一切勞動的重荷負擔在自己的雙肩上；在恐慌和丈夫長期的失業的時期，這種現象特別厲害。勞動者家族之中，在美國織物工業地方，有一時期，甚至竟有妻子出外做工，丈夫在家裏照料兒女，管理家事的。在企業家努力採用廉價勞動力的工業都市中，妻子到織布工廠去，丈夫常留在家裏。這許多都市，在某一時代甚至稱爲「她們的都市」。隨着勞動市場上的婦女的價值被承認以後，漸漸地使全勤勞大眾對於婦女

的評價提高，將她們看成爲自己陣線的同志，甚至於成爲同等的成員。勞動婦女的增加，到十九世紀後半期，特別顯著。英國在三十年之間（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〇一年）參加各種職業的男子的人口，只增加二三%，但是婦女却增加了二五%；而且這種職業婦女的增加，主要的是女工的增加。這因爲：在當時英國男子勞動者的數量總共只增加八%，而女工的數量則增加了二一%。在法國，一九〇一年時，從事勤勞而獨立生活的婦女總數，佔全人口的三四%，到一九〇六年更達三九%。在德國獨立生活的婦女數量，一八八一年是五百五十萬人，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五年是六百五十萬人，一九〇七年是九百五十萬人，到世界大戰的時期，更達一千萬人。一八八二年勞動婦女占總人口二四%，一九〇七年占三〇%，在世界大戰時代，竟佔三二%。

（註）戰前的德國，不過只有十七個工業部門採用婦女勞動；但在戰時，採用婦女勞動的部門已

達三十以上。

在俄國，獨立生活的婦女數量，在一八九〇年，約計有五百萬人。世界大戰中，俄國革命前夜的勞動婦女，至少佔全部婦女人口的二〇%。如果在世界大戰前歐美兩洲自食其力的婦女約有六千萬人以上計算，則現在毫不誇張地說可有七千萬婦女已從事職業了。在這七千萬人以外，更必須加上急激地向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東洋勞動婦女所增大的數目。日本二百萬勤勞大眾中，七十五萬是女工。印度，由於最近國勢的調查，勞動婦女在工廠手工業農業和棉花、茶、咖啡等栽培地方工作的，總數有一千二百萬以上。中國婦女在工廠手工業官廳和公司服務的總數，也決不是幾千人，而是幾十萬人。急激發展的東洋，已和西歐諸國的狀態相近了。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有和男工並肩着的女工登場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婦女已經不能存在了。婦女已被承認是勞動的單位。

在七千萬勞動婦女中間，大約有半數是有夫之婦。這種現象在我們看來是極重要的。這是打破了過去的見解，以為婦女結婚以後，不必要探求自己生活的道

途。英德和革命以前的俄國，有夫之婦從事於獨立勞動的，已經佔全體勞動婦女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婦女已經不再完全負擔沒有生產性的家事勞動，不再做男子的附屬物，而被引進生產勞動的領域中了。這樣，她們長時期的無權利和隸屬化的時代，已成爲過去的事實了。

但是，是什麼東西把婦女迫進工廠和製造所的呢？在機械生產之下，對於勞動者在工銀中必須養活自己的家族這件事情，已經不在考慮之中了。資本家並不擔心勞動者的子女的生活的幸福。技術不斷地發達，常常準備了失業者之羣。勞動者的工銀，僅僅保持了勉強只能養活自己一個人的水準，於是勞動者的妻在結婚以後，不能不站到機械的傍邊去。最近德國的統計，表示既婚婦女中有九〇%被飢餓和貧困所逼迫而參加工銀勞動。這在其他諸國，也反覆着同樣的統計。這裏沒有個人的意志，生活條件把幾百萬婦女送入工銀勞動之中；但是對於既婚婦女的身體危險而且有害的這種困苦的工廠勞動生活，已發生了一個人類前此所未

有過的問題——母性問題。究竟怎樣使母性和被資本雇用的工銀勞動不互相妨碍呢？這就是目前發生的一個問題。在資本主義之下，母性和職業——即參加生產勞動中的婦女——事實上是難免互相妨碍的。勞動者的家庭被破壞了，孩子們一任其流浪在命運的暴虐之中，家庭已全無所有了。加之婦女勞動普及於有害的部門，那裏沒有婦女勞動保護和母性保護，在粗惡的營養以及惡劣的住宅條件下，當然不會有健康的母性的。在工業都市裏，流產生產而死和嬰兒死亡率，普通達到三〇%——五〇%；特別有害的職業，竟超過六〇%。假使勤勞大眾再沒有準備取得權力和生產，假使資本主義繼續存在，而且今後更繼續發展，在幾十年之後，人類將有完全退化的可能！幸而勤勞大眾依了歷史法則進行，俄國革命的前例，開拓了其他諸國的社會革命之道路。並且××制度的國民經濟組織，給與人類解決母性問題的關鍵。在新的××制度中，婦女的勞動，也作為活生生的勞動單位，爲了社會的利益，而被利用到生產方面去。至於婦女在妊娠和哺育乳兒

時，則由社會給養，給與她以可能的條件，使她們履行第二種社會義務，即為社會造就新的健康的有生活能力的成員。

但是現在世界上除掉蘇聯以外，其他諸國多抑壓在資本主義之下；母性的十字架依然全部重壓在負擔着工銀勞動和管理家務的兩重義務的婦女肩膀上。

這裏我們來觀察一下，究竟那一種勞動部門採用婦女的勞動最多。

現在，尤其是世界大戰以後，大約不採用婦女勞動的經濟部門已沒有了。婦女勞動不僅侵入工業和農業的各方面，還侵入官廳和地方衙署。在商業方面特別在小商買賣的領域內，婦女工銀勞動從十九世紀起已經存在。但是，一般看來，婦女勞動最普及的部門，第一是要求低度的熟練勞動的工業，第二是到最近還認為是廣泛的家事的一部份的工業部門。我們可以舉出婦女佔最多成分的職業，如織物、烟草、化學品生產和商業（女販子和小商人）等，這些都是需要比較低度的熟練勞動的部門。許多國家像俄國英國德國日本和其他各國，在這許多部門中

婦女勞動的數量凌駕在男子之上。接着還有比較的是最近從家事部門分離出來的部門——成衣業、食糧品製造業、家事勞動、洗衣舖、菜館、咖啡店等，在這裏都有婦女勞動。婦女不能做針綫、洗濯內衣、運用熨斗、收拾餐堂的是很少的。在這些部門裏，把職業訓練所缺乏的事件由生活的實習來加以補足。然而，隨着這些生產部門中的許多換了機械勞動（蒸氣和電氣洗濯、裁縫工場、裝置特殊電氣的共同食堂），向來為男性的勞動者所輕視的這許多部門中的婦女勞動力，也被減縮了。

主要的作為婦女勞動部門的工作中，也有男子勞動者的加入；一向認為典型的男子工作中，由於生產機械化的影響（例如印刷事業、金屬製造業），也有女工參加。男子把裁縫機械和電氣熨斗拿到自己手裏；婦女也可以站在旋盤機械和自動排字機、活字機之前。這樣，我們看到，由於機械的作用，勞動的性別關係被取消了。而且，這種由於勞動機械化的幫助而使性別關係的取消，促成了男女

勞動力量的平等化；這平等化，促成了全社會男女平等權的承認。

最近二十年之間，在交通機關中的婦女勞動的數量已非常地增加。在這部門，和事務所的工作同樣，所要求的一定的熟練程度，婦女已經完全做到了。但是，正因婦女的侵入了專門訓練和熟練的勞動領域，證明了婦女勞動正成爲生產的必然的構成部份。

婦女把工作不看成一時的偶然的現象，已經看成一般的通例了。她不把自己一生的命運放在結婚之中；而把保持職業，看作生活的基礎。而且，像英、美、德、資本主義發達的許多國家，雙親們不僅對於兒子，就是對於女兒，爲了要保證獲得麵包的工作能力，也努力使她們熟習各種職業。

婦女勞動，在十九世紀已經不是偶然例外的事情，而是普通的現象了。世界大戰僅僅促進了這一過程，打破了婦女可能回到家庭的最後的希望。這樣，在二十世紀之中，婦女歷史的命運的發展，就全面地展開了。在幾千年以前，婦女和



男子同是部落及民族的繁榮和價值的生產者；而且男女都有着平等權。在那時代，男子只要履行唯一的義務——即所謂生產勞動；婦女却不僅是勞動，並且要養育氏族的新成員。爲了這樣，她們會受到了特別的尊敬和崇拜。在原始社會看來，就爲了這一點，她們的意義是比較高超的。勞動分業和私有權的發生，把婦女束縛在家庭裏，作爲男子的隸屬物，使她們的地位降低。但是，在要求兩性分業和要求私有財產制發生的一定的階段上的婦女生產力量，現在還給她們以拯救，還在婦女面前，開闢了全面的解放的門戶。婦女被壓迫的時代已經老早過去了。隨着婦女參加生產，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創造了婦女解放的鞏固的基礎。但是，能夠實現這解放，却只有新的經濟制度——××主義。

### 參考書

- (一) 恩格斯的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
- (二) 柯命泰的婦女問題的社會基礎

- (三) 柯命泰的社會和母性
- (四) 蔡特金女士的婦女及其經濟地位
- (五) 蔡特金女士的知識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婦女問題及社會主義
- (六) 麗麗娜女士的後方的兵卒

## 第七章 婦女問題的成因

婦女參加生產的人數既漸增大，經濟的獨立程度既漸提高，便更加痛切地感覺到在家族中她們是個孤立者，而在社會是不平等，在國家是無權利者。婦女因為參加勞動，在社會上已被認為是有用者之後，一切布爾喬亞國家的法律，却依舊視婦女為無權利者，這是一般公平觀察者所目擊的事實。婦女既已參加各種生產部門，但在社會上、政治上、仍舊是「無權利」，而且仍隸屬於男子——已經不是她們的給養者的男子——所謂婦女問題，便由這種矛盾而發生了。這問題雖然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才尖銳化起來，但遠在那時期以前，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婦女問題的萌芽。因為工場手工業及工廠的興起而衰落了無力的夥友與手工業者，不但需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大經營者，即妻子兒女的勞動力，也不得不

出賣的時候，「婦女問題」就已經發生了。

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期的婦女問題與婦女運動，主要的是關於工資和使婦女從事「真正的勞動」的問題。因為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三世間，行會（*Gilds*）的獨占與其嚴格的規定，將婦女的職業領域，束縛得非常狹小，使她們再從職業領域回到家庭去，生產勞動的領域，幾乎完全為男子所占有，因此婦女的地位，更加一落千丈了。婦女在職工組合中，被剝奪了勞動的可能性，由此她們便更加陷身於工廠主的殘酷的榨取中。就法國來說，當時法國的工業，完全為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所支配，擁有百人以上勞動者的企業，以及有煙囪的工廠，還是很少。反之工場手工業與手工業者，却張着稠密的網，繁榮於全法國。在手工業勞動者所密聚着的許多地方，都充滿了為包貨商而勞動的「工場手工業」的生產組織。僅用十數個勞動者或女工的小手工業作坊，在巴黎及其他法國的各都市，有如雨後春筍一樣地發達。高貴的絲織品、纖巧的花邊、金屬製品、

各種緞帶、和日用品等，都出自女工的手中，尤其是紡織工業用女工最多，佔百分之九十。不過當時的絹絲製造工業，已具有大工業的性質，那時很明顯地，工廠和手工業者或手工業作坊對抗着，且漸有將它們消滅之勢。所以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的無產婦女，已經遍地皆是。巴黎市內充滿了乞食女與賣淫婦；巴黎郊外，佈滿了飢餓失業的婦女羣。所以，當一七八九年七月，反抗富豪和官僚權力的勞動大眾的暴動爆發起來時，婦女大眾——女職工、女商人、女手工業者，——都踴躍地參加，是很自然的事。要求麵包和職業，是婦女大眾參加那次革命的目標。當時巴黎勤勞婦女大眾的請求書中，有這樣的要求：「在勞動上婦女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男子勞動的特殊部門，女子既不能參加，則婦女勞動的特殊部門，亦得禁止男子加入。」

在某一個要求工作的請願書中，寫着：「我們要求婦女有職業，這並不是爲了要顛覆男子的威信，我們是爲了要獲得生存的保障，即使那是極樸素的生

存。」

「參加一切的職業部門，換句話說：勞動的絕對自由」，這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無產婦女的要求。這種要求，是救濟成千成萬的飢餓襤褸的女乞丐、流浪者和賣淫婦的保障。這種要求，不單是婦女的，同時也與正在發生的工業無產者的要求合流了。巴黎郊外的住民，都異口同聲地叫喊着「勞動的自由」。但勞動自由，首先必須廢棄封建制度，確立布爾喬亞的支配，破壞殘餘的行會組織的特權。——階級的本能，使巴黎郊外的婦女們知道：如果要獲得「真正的勞動」，應該走怎樣的途徑。法國的無產婦女，毅然成了革命團體的同志，她們都爲了獲得賺「一片麵包」的權利而爭鬥。

要把法國大革命時代，婦女參加革命運動的英勇姿態，精確地記述出來，恐怕要花去這整本書的篇幅吧。獨非納與蒲爾塔尼亞兩縣的婦女大衆，最初向王府挑戰。繼起的爲阿格爾柴、雪萊索的女市民，她們都很積極地參加三級會的代表

選舉。連布爾喬亞社會也拋棄了婦女是無價值的東西的觀念，反要求婦女的支援，將她們引入活躍的戰士隊伍中，這種事情，是當市民戰爭激化的時代和民族戰爭的時代，在歷史上所累見的。阿其埃地方的婦女，對君主政體的專制，投擲了革命的宣言，巴黎的無產婦女，曾手執武器，進攻要塞，參加占領巴士的獄。無產婦女並以羅莎·拉康布為首領，以女職工夏布利，奧周者為先鋒，進攻凡爾塞，由女衛兵解送法王到巴黎。路易到巴黎時，巴黎郊外的婦女與男子爭奪守護巴黎城門的榮譽。一七八九年，女魚商們，派遣代表於三級會議，鼓勵議員傳達她們的要求。巴黎郊外的婦女們叫喊着「諸君！請勿忘了人民的事情！」以警告法國國民議會三級會的議員。她們參加馬斯原野的請願，而成了法王殘殺的犧牲者。

逐漸成長的法國無產婦女，隨處意識到全無產者共通的階級任務。她們知道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婦女羣衆——法國的女工與貧苦的農婦——從飢餓、高昂的物價、無權利、貧苦與失業之中解救出來。當時法國的無產婦女始終是革命的，

非妥協的，她們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常常鼓舞了一般逡巡不前的男子而造成了果敢的不妥協的氛圍。

以兇猛、殘忍、好鬥著名的編織業女工的史跡，在共和制倒毀後，還長久地威脅着布爾喬亞的平和的安眠。然而，被全世界的反革命者呼爲「悍婦」的編織女工，究竟有些怎樣的人們呢？那就是當時困於飢寒的女職工、農婦、勞動者的妻，女手工業者或作坊的女工，她們痛恨貴族與舊制度，由於健全的本能，她們都爲了保護新的法蘭西——人各有業，既無不勞而食的奢侈的貴族，也無饑餓而死的幼兒——而爭鬥。被呼爲「悍婦」的編織女工，就是這些成了最勇敢的戰士底夥伴的婦女們。她們爲了不願空費時間，不論參加任何集會，或示威行列時，常手裏織着東西，她們編織這些東西，不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參加國民軍的兵士，及革命的擁護者。

「婦女運動」的萌芽，肇端自法國革命及美國爲了脫離英國統治的革命戰爭



時代（一七七四年至一七八三年），這個運動，是和一些活動的女權擁護者和初期的平權論者的名字相聯結的。在法國革命中，不消說，有着許多光輝的女性。她們的名字，不僅是在婦女運動的範圍，即和其他各種發展階段的革命事業，也密切地連結着。與有着穩健主張的聰明的政治家吉耶特黨的羅蘭夫人相並，又有偉大的新聞記者兼作家的民主主義者羅倍爾·考拉莉奧，她們都是火一樣的革命的擁護者。她們兩人雖然對於婦女運動沒有特別的關心，不會特別主張婦女的要求，但在使人們承認婦女價值的平等性和婦女在歷史上的功績這一工作上，她們的勞績，是決不劣於初期的女權論者的。由她們的對於革命事業的行動與忠實，使人們忘記了女子是弱者。而顯示了她們是一定的政治潮流的表現者。和女權論者奧林比·德夫秀相並，在她們當中，又產生了二個爲革命的烈焰所鍛鍊，具有熱烈的戰鬥性格的特殊的女性姿態。在革命的初期，我們可以看到跟德莫林一起對人民鼓動武裝的代洛妮·娜莉克。她會參加佔領巴士的獄，爲此國民會議特贈

給她一把有名譽的劍刀，以表彰她的功績。當十月五日進攻凡爾賽那一天，她爲了要鼓勵革命的婦女們的精神，特地着了紅色的衣服，直向凡爾賽馳騁。她和哲學家萊門創立了「法之友」會。她向全國婦女呼籲支持國民軍，積極地擁護新的祖國——法蘭西共和國。六月二十日，她幫助民衆搬大砲向王宮進攻。八月十日，她曾在廣場上，澈夜用她像火一樣的辯舌宣講革命，要求確立「人民的真正最高權利」，牠會參與馬賽的軍隊，侵入王宮，因此共和國成立，贈她「市民的冠」，以示褒獎。然而終因當時山嶽派與吉耶特派的相互傾軋，娜莉克漸傾向於後者而死。

羅莎·拉康布，是鼓勵進軍凡爾賽的一人，她是巴黎四郊的婦女的真正的領導者。她是常在下層階級裏活動的勇敢女性，她有卓絕的組織才能，清脆的喉音和美豔的容貌。在立法會議的旁聽席上，她演說道：爲保護革命，應防止聯合軍的侵入！這演說和她的對於政權民衆化的要求，後來都作爲革命的文獻而記載在

歷史上。她是君主制的堅強的敵人。在八月十日圍攻王宮的時候，傷了手臂。後來國民會議亦贈與「市民冠」以示尊敬。一七九三年，她加入了山嶽黨，成爲馬拉派的一員，而戴了「紅帽」。她要求逮捕一切的貴族和他們的家族。她並向婦女羣衆，作反吉耶特派的煽動，爲了要覆滅吉耶特黨，她竭力援助山嶽黨。慫恿山嶽黨黨員不停止對於反革命者的鬥爭，要求逮捕投機者及包貨商，甚至反對並無錯誤的國民會議。因此使羅伯斯比爾不免嫌忌這位太會雄辯的女山嶽黨員。她要求「革命婦女俱樂部」的會員，在國民會議有說話之權，並爲會員的犯罪者作辯護，引起國民會議的不滿。這個「革命婦女俱樂部」，是拉康布和洗濯婦波莉娜所領導的團體，創設在巴黎。拉康布在這俱樂部中對婦女大衆，努力灌輸革命的精神。例如她在「婦女俱樂部」中曾提出這樣的論題：「婦女在共和制之下能得到什麼利益呢？」拉康布是勞動婦女大衆的耀輝的代表者。她與波莉娜互相合作，不僅爲婦女的權利，而且爲勞動婦女的利益而努力。她會和巴黎的瀕於飢餓

的失業婦女羣一同站在國民會議的旁聽席上，向議會質問：「共和國政府究竟想不想設法解除勞動婦女的痛苦？」勞動婦女們的貧窮與苦惱，在她的有力而大胆的雄辯中，完全傳達出來了。

當法國婦女的集會和俱樂部等，被國民會議指令解散時，拉康布竭力保護她的孩子——「革命婦女俱樂部」。但終於也不能不遭到和其他俱樂部同樣的命運。及山嶽黨敗落，反動勢力占勝利後，婦女的行動，益發受到嚴格的監視，但拉康布始終不肯緘默，繼續她的演說，終於一七九四年春被捕，從此她失去了政治舞台。拉康布兼有革命的天性和對於革命事業的忠心。她最初即意識到無產婦女的貧窮，要求和苦痛，是整個勞動階級運動和鬥爭的一部份。她並沒有爲婦女要求特權，但她會努力使婦女自己醒覺，引導她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作爲勞動階級的一員，爲擁護自己的利益而奮起。拉康布的最大的功績就在這裏。因此，她是比另一些在大革命時代的穩健的女流運動者，更和我們相接近的。

布爾喬亞的婦女運動，發動自新興的北美合眾國的首任大總統夫人安皮華·斯密斯·阿達姆，及她的戰友梅爾茜·烏奧萊，法國的烏林比·菲茜，英國的伏爾斯頓克拉等。布爾喬亞的女權論者以為婦女的平等權問題，一開始就作為正面的要求，在一切領域都要求承認婦女的平等權利（像十八世紀的若干聰明的教授，思想家文士們和一些勇敢的婦女們一同，為了「優美的性格」而起，提倡婦女應當與男子受同等教育一樣）。並以為她們的呼聲，叫醒了在睡夢中的女性，她們成羣地為自己的利益而奮起，通過全十九世紀，逐漸爭得了還不曾為任何女性所有過的權利。

但這個見解，是非常錯誤的，事實上，婦女解放的歷史却在另一種不同的形式上發展着。勇敢的女權論者中，如法國的菲茜、美國的斯密斯·阿達姆，以及英國的伏爾斯頓克拉等，那是在十八世紀末葉，婦女已進入生產部門，或者社會已經開始承認婦女的勞動力是有價值的之後，才把婦女平等權作為中心問題而提

倡的。向最有威嚴的國民會議提出了「婦女既有上斷頭台的資格，則同時也不能不把做官吏的權利給與婦女」的菲茜，是婦女參政權的熱烈的擁護者。一七八三年，斯密斯·阿達姆，曾說這樣的話：「假使憲法，不承認婦女的選舉權，則婦女沒有服從共和國法律之必要。」以威嚇新建設的北美合衆國的革命政權。斯密斯·阿達姆是最初對於婦女政治平等權的要求，給與明確的公式的女性。十八世紀末葉，英國伏爾斯頓克拉女士是一個思想深邃才能卓絕的女作家（她的名著女權擁護論於一七九六年出版），她要求女子教育的根本改革和承認婦女在教育上的平等權利。婦女們從種種的觀點上，接觸到上述的「婦女問題」即解決婦女在生產領域內的職分和在國家社會上的權利之間的矛盾的問題。然而，在本質上，她們的整個要求，都可以歸結到一個根本的口號——「勞動權利」。在當時，「勞動權利」，首先是和革命的勝利相關聯的。這要之就是推翻封建制度，把生活安置在另一種新的土臺之上。但爲了建設新生活，婦女勞動的生路是必要

的。爲了勞動的出路，就有爭取政權的必要。而布爾喬亞婦女的女權論者，以爲婦女對於平等權的要求，和對於自己的權利的自覺使婦女走入了獨立勞動之途。這實在是很錯誤的。歷史告訴我們的却與這個相反。烏林比·菲茜的有名的宣言中，有一段話說：

「立法機關的目的，爲保護兩性的權利、自由、進步、安全，和對於壓迫的抗爭。一切的女市民，與男市民同樣，個人或代表者，均得參加立法，——一切女市民，均得與男市民享同等的公職、特權與職業。」

但這一切要求，——主要地是可以歸結於「婦女均有參加一切公職與職業的自由」的——都只是在生產勞動的道路已向婦女大衆展開了之後，這才發生的。所以婦女參政權的承認，在法國革命時，並未爲一般婦女大衆所認爲不可缺的問題，只爲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婦女們所要求着罷了。當時巴黎的婦女大衆，對於以帕里·愛德斯型的女權論者爲領袖的婦女俱樂部，是非常冷淡的。反

之，她們却跟整個普羅列塔利亞一起，對於行會的撤廢，及勞動權利的要求，作過勇敢的鬥爭。階級的本能，正確地告訴她們；行會的撤廢和勞動權利的要求，是比婦女參政權更爲現實的口號。在要求參政的菲茜看來，以爲只要能參政，一切婦女的權利，即可得到保障，但事實上，十八世紀的一切史實，告訴我們：法、英等國承認女子參政，只確立了資產階級婦女的權利，至於一般的勞苦婦女，則依舊在十八層地獄中生活。

在十八世紀末才開始顯明地樹起了目標的女權運動，是從當時的生產情形，國民經濟的狀態，以及婦女勞動在那生產上的職務中，必然成爲迫切的要求而產生出來的。

由法、英、美的例子，可以愈加證明我們的定義的正確：即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完全是由她們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職分來決定的。

在上面各章，我們已經探討過在工廠手工業時代，和像英、法資本主義諸國



那樣，已有很發達的工業生產的十八世紀時代的婦女運動的發展。在那裏，事實說明了一切。但把我們的定義應用在美國，豈不是不適當嗎？在十八世紀時，美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工業幼稚，全國僅有小規模的自耕農場，人口的大多數，都是農民。爲什麼美國反而能成爲婦女運動的搖籃呢？爲什麼在美國，婦女平等權和參政權的要求反比高度發達的歐洲工業諸國更先提出呢？這事實不是與我們的定義——爭取平等權的爭鬥是婦女參加了生產勞動的結果——相矛盾嗎？其實，這裏決沒有什麼矛盾。美國正是我們的根本定義的一個確證。美國婦女之要求參政權，是與美國婦女在當時（十七八世紀，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的時代）的產業生活上所担任的工作有直接關係的。在這個殖民地上，充滿了來自「舊世界」的移民——特別是從封建制度的壓迫，或宗教的迫害中脫逃出來的歐洲移民。他們大多數都是沒有金錢，也沒有產業的人們。他們只帶着唯一的自己的財產。能勞動的臂膀與耐勞耐苦的精力，來到美洲。從歐洲來的逃亡

者，大抵都是帶了全家族，奔向那「新世界」去的。他們在那裏安住下來，成了農民。因為人力的不足，不得不由全家族合力經營。農民的妻女姊妹，對於創造農業的財富，絕不劣於她們的父親丈夫或兄弟。婦女也和男子一樣負起了一切經營的重担，與尙未爲人力所征服的，未開化的大自然爭鬥。她們和男子同樣地手持利器，迎擊追趕他們的印第安人，與男子共力，衛護由共同的勞動所經營的農場。所以北美婦女是有物質價值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流進一般的農業生產的河床，助長了全殖民地的財富的成長。美國人對於婦女的恭順尊敬，是從這裏發生的。不過，到了最近，因資本主義爛熟的影響，婦女已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女奴隸，或成了男子享樂的工具了。

當美國還是英國的屬地時，它的法律，是根據「付租稅者卽有代表權」的原則的。所以一切的納稅者，都享有參與本洲的政治的權利。婦女當然也不能除外。當美國的解放戰爭爆發時，美國婦女的踴躍參加正是當然的事。她們實際

上，對於國家的獨立與繁榮，有着直接的利害關係。美國獨立的理想，使她們非常興奮，她們勇敢地戰鬥到最後，往往甚至凌駕於革命的政治家。梅爾西·烏奧林女士，在那個運動的領導者——華盛頓尚未取急進的態度時，就已經固守着「美國完全獨立」的理想了。婦女們相信着：新共和國的憲法，一定會承認她們的政治權利的。但最後，這信仰是失敗了。建國會議雖然沒有表明反對婦女的選舉權，但將這問題的決定權交給各洲，結果，所謂婦女選舉權終沒有列入憲法中。這決議，有其明顯的理由。就因為到了十八世紀的末葉，北美合衆國，已不是小自耕農的國家，它已走上大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的道路了。婦女已不是有用的生產者，在一般國民經濟上，她們已失去了她們的地位。北美合衆國，因為布爾喬亞鞏固了它的支配的結果，婦女就降低到隸屬者的地位了。無產階級的婦女成爲工廠的女工，淪入了卑賤的資本奴隸的隊伍中。因此像北美的工業諸州——所謂舊英吉利諸州，法律上完全否認婦女有參政權，反之尙在農業狀態的凡

及尼亞及紐其亞兩州的婦女，倒還有她們的地方自治的政治權利。

美國獨立戰爭時，給予婦女「平等權」的主張，從美國社會的特別具有革命意識的階層——方面，得到了非常同情的呼應。每一樁事情，都有婦女參加，市民戰爭中婦女也被吸入。他們要求婦女要有「市民的勇氣」，和對於自己的集團的忠心。可是隨着對戰勝舊制度的喜悅，漸次淡薄，以及隨着英國對美國布爾喬亞的威脅的消除，所謂「婦女平等權」的要求，即是連熱心的民主主義者，也毫不感動了。

由上述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活的實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確證：即婦女要求平等權，是當婦女事實上已成了勞動的一單位，而參與了一般國民經濟的時候，這才發生的。並不是對於平等權的要求，使婦女加入了生產勞動，反之，却是在婦女已加入了國民經濟圈裏以後，才產生「婦女在一切領域都應和男子平等」的思想。

但在一般布爾喬亞的國家裏，婦女中的地位，事實上，爲什麼向來都是不平等的呢？就是婦女占了勞動者的大部分的地方，社會或國家，也依然不承認她們有公民權，這原因究竟在那裏呢？

這原因，就在於建立在階級的矛盾和勞動力商品化上面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組織本身中。過去是大地主對於爲自己創造財富的農奴，任意蹂躪，同樣，現在資本家對於創造商品價值，爲資本主義社會創造財富的幾百萬勞動者的權利，是不肯承認，也不肯承認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女工和男工同樣是價值的創造者，但她們的勞動，已不是直接的產品賣給消費者的勞動，而是爲工錢的勞動。在自然經濟支配下的時候，職工或手工業勞動者，並不是對消費者出賣勞動力，而是出賣由自己的勞動所生產的物品。在工資勞動制度下，勞動者——女工亦在內——完全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但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不承認勞動者的勞動力就是國富的根本源泉。他們——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們，都拚命地想說

明：資本家是怎樣從幾何學的力——機械——和勞動者的勞動力之結合中，找到了他們的利益的。布爾喬亞認為沒有魂靈的機械，才是創造新價值的源泉。他們決不承認這是勞動者的力所造成的。所以他們眼睛裏的工資勞動者（女工在內），只是機械的附屬品。

在資本主義經濟支配之下，要想變更關於勞動，或關於勞動階級（包含勞動婦女）的職分的見解，是不可能的。工資勞動，將婦女從狹隘的家事中趕出來，把她們引進了生產勞動的領域。但同時工資勞動制，又使男女勞動者被困於布爾喬亞的物質束縛之下，使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均處於隸屬的地位。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勞動，都被看做是沒有價值的。

勞動階級的一切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國家民主化——即勞動者參與國政——的鬥爭，都遭到了布爾喬亞殘酷的有組織的反擊。照布爾喬亞的理論說來，能夠治理國家，指導社會生活的人，並不是勞動的人們，而是剝奪勞動利潤的人們。

勞動婦女的無權利，正與全勞動者的無權利相一致，勞動婦女的命運是與整個勞動者的命運相聯繫的。從幾百萬婦女之加入工銀勞動的瞬間起，她們的地位就不但沒有提高，而且反而惡化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使婦女除了在家庭中的無權利、不平等、和成了家事的奴隸之外，更加了一種新的重負。那便是她們不能不為大工廠或製作坊的主人去作工資勞動。

勞動婦女的生活，日漸成了苦役。她們睡眠不足，更談不到休息的時間。比誰也早起，比誰也遲睡。雖然這樣，她們的家族，依然不能不崩潰，家庭成了空虛的，小孩子也沒有人照料。婦女們用盡力量，想把家庭從破滅中救出來，想使爐灶不至於斷煙。然而，無情的生產力，却毫不顧及她們的願望。跟着大工業的確立，家事經濟，日益縮小，我們的母親們年青時，我們的祖母們的生活還比較寬裕的時候，認為不可分的家庭事務，現在已漸漸地消失了。當大量的日用品充

滿了一切市場的時代，勞動者的妻子，還花得來親自去替家族編製鞋襪服飾嗎？只要有錢，便什麼都有。但要有錢，就不能不出賣自己的勞力與時間，也就是不能不去替別人做工作。當有許多罐頭工廠，製造家庭食品，麵包工廠，製造麵包，勞動者的家族已可在合作社或簡易食堂就餐的時代，自然不必再有親調羹湯或自製麵包的主婦了。家政既經失去了生命。婦女的爲了家族的工作，已成了多餘。那種工作，無論是對於國民經濟，對於家族的成員，對於婦女自身，都是不必要的了。我們看見：隨着工場生產的繁榮與資本主義商品的發達，家庭——特別是都會人的家庭，就在開始崩潰、破滅着。在自然經濟的支配下，所認爲必要的家庭，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見地上則變成重担，束縛，並使婦女的勞動力成爲無價值的非生產的東西了。家庭已不是經濟的單位，而成了廢物。於是婦女的勞動，由狹小的家事領域，逐漸移向國民經濟方面。從事生產的婦女數目，日益增加。世界大戰，更加決定地證明了：婦女的勞動力，對於以後的生產力的發展，



是不可缺少的。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勞動部門，沒有婦女插足。所以在大戰時期，歐美各國的勞動婦女，增加了約一千萬人。婦女的勞動，成了不可缺少的。據統計，十九世紀初期，在世界市場上價值的三分之一，是為婦女所生產的。到現在，婦女參加商品生產的人數自然益發增多了。

婦女的勞動已成為重大的經濟要素，但「婦女問題」的解決，却是前途遼遠。除了蘇聯，全世界的婦女，都還沒有得到平等的權利。我們知道：婦女無權利的的原因，是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中，是在於建立在私有財產與個人經濟之上的布爾喬亞社會的階級分裂中。我們既明白了這原因，就可以明白剷除這原因所應走的途徑。婦女的不平等和隸屬性，是只有在生產改為新組織時，在社會的生產與集團的消費代替了私有財產制的時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的時代，才能夠徹底排除的。

- (一) 拉塞爾著法國革命中婦女的集團參加
- (二) 希全普基娜女士著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
- (三) 柯爾泰著婦女問題的社會基礎
- (四) 亞德拉著法國革命中的有名婦人

## 第八章 女權運動和女工的參加社會鬥爭

由于資本主義造成的矛盾——一方面婦女的參加國民經濟，從事生產勞動的，日漸增加；另一方面，婦女在社會，在國家及結婚生活等，依舊不能獲得平等權利所產生的矛盾——所釀成的婦女問題，已在前章明白地說過了。

婦女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一樣，不會單獨地存在的，在布爾喬亞制度下的婦女問題可以說是勞資鬥爭社會問題的一部。婦女既如上述的無權利，同時因參加國民經濟的生產勞動，漸由實際生活中，體驗了這矛盾事實，發現了人類從未發見的現象。於是婦女運動就產生了。

婦女運動發生——十八世紀末葉——不久，就分成了兩大流派，一支走進了布爾喬亞的婦女運動的旗幟下，另一支成了勞動運動的一翼。

布爾喬亞的婦女運動，自十八世紀末葉起到十九世紀終，已發展到各地，不管西歐以及東洋，都有婦女團體在活躍着。不過自始至終和男子布爾喬亞的政治運動沒有什麼聯繫。布爾喬亞婦女運動的主要任務，只不過想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泥溝中，獲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而已。至於婦女運動的終極大道：——婦女要得到真正解放，在於有一新的社會制度——開拓新的社會制度，那是她們夢裏也沒有想到過的。其他像社會主義，更與她們沒有半點緣分。可是十九世紀末葉的女權論者，也提出了和社會主義者同樣的要求。這個她們只是要依靠勤勞婦女大眾的支持，要獲得勤勞婦女羣衆的同情，來鞏固自己的勢力吧了。以上是女權論者的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是：她們自己認爲已負了全體女性的代表者的責任，已要求了全體女性所要求的一切權利；所以她們認爲她們是超越了階級矛盾而存在。可是實際上，她們又很鮮明地常僅爲自己的利益而活動。此外她們的最大錯誤點是：她們已忘了婦女對社會，負着雙重的義務；譬如她們不離口地叫着的

「自然的權利」，要要求這「自然的權利」；女子對社會，不僅應參加生產勞動，且得對社會生育康健的子女。可是擁護母性，擁護做母親的婦女的一切利益，完全沒有排入女權運動的秩序單中。譬如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頭，關於母性保護問題，雖然也曾引起了布爾喬亞婦女的注意，可是注意這問題的，並不是那些熱中於女權論者的活動份子，而是一些醫生和女工們。將母性保護，婦女勞動保障等的要求，能加入女權論者的秩序單中，那是躊躇再三，等到二十世紀初，已是假使不容納那些要求，就會有失去廣大的勤勞婦女羣衆的危險，於是才同意了提出那兩個要求。女權論者一面竟毫不客氣的將要求平權的爭鬪，輕輕的將日趨深刻化的階級關係，歸諸於兩性爭鬥的問題，不過，這是迂曲滑稽的事情。這個最大的原因，由於女權論者，缺乏政治的認識，失去了正當的鬥爭道路。她們排斥了同一階層中可為她們作支柱的男子的力量，反願使自己的任務，縮小範圍，因此對保障婦女權利的要求，不能成爲全階級的一致的共鳴。而

僅成爲宣揚男女平權的簡單的標語。

直到二十世紀，才有對於政治有十分認識的婦女團體，將自己的鬥爭，和政黨結合，但也只是附屬於黨的一部分而活動着。革命前的蘇聯，立憲民主黨中有女黨員的「婦女同權同盟」——後改「婦女平等權聯盟」——的活動。同時英德的婦女團體，也採取過同樣的政策。

女權論者只要求「確立男女平權」，所以她們的唯一願望，是和男子有同等的權利，至於婦女因自然的特性——母性——而社會應給與特殊的權利，她們完全置諸不顧。在原始共營共享時代，女子是經濟上的基本生產者，同時他們非常崇拜女子的分娩，因爲她們是新生命的生產者，可使民族的數目，日漸增加。雖然不能說婦女因僅有生育的特殊任務，所以社會應給與撫養，她的功績應和負有一切生產義務的男子同樣。但是一旦婦女和男子同樣地做了有益於社會的事業，而又負起了社會的特殊任務——生育與教養子女——那末社會確應給與婦女以特

殊的保障與愛護。可是女權論者，單純地集中於平權，完全沒有顧及這一點，她們以爲所謂承認婦女有權利，僅是與男子有同樣的權利，而忽略了婦女所有的特殊權利。那些勇敢的女權論者，爲實行她們的主義，一味的仿效男子，例如男裝、斷髮、做男子的闊步街頭。她們見了那些爲飢寒所迫而走進碼頭做女搬運夫的肩着重擔不勝其沉重的苦況，她們反很輕鬆地在她們的機關雜誌上，或機關新聞上，大吹其「婦女平權的又一勝利」，而且竟大書特書其：「你們看！婦女——女搬運夫——不是可以和男子同樣負荷沉重的貨物嗎？」反之：對資本主義的無厭的榨取，妨害了一般勤勞大眾的健康，尤其婦女勞動者，因參加不適婦女身心的勞動，而損毀了國民幸福等的論文，却沒有看見一篇。這些，才是爲社會爲婦女自身利益應寫的文章，可是這些在她們的腦海裏，根本連夢也沒有做過。女權論者根本沒有了解：婦女因生理的關係，社會應承認她們的特殊權利，這種權利的承認，並沒有損害婦女在社會集團中的價值。婦女的爲社會謀利益，

不必一定和男子作同樣的工作，只要她的工作，在集團的意義上看起來，是有同等價值。這樣集團就得承認婦女和男子的同等權利。女權論者，根本沒有了解這一點，所以她們的運動，亦偏入狹小途徑了。

女權運動，也經過了好幾個階段。當十八世紀末葉，市民戰爭非常尖銳的時候，在美法兩國，曾起過非常大的反響，可是這轟烈一時的男女政治平權的要求，待布爾喬亞政權的確立就告沒落。代之而起的，有「爲婦女開放一切教育機關」的要求。到了十九世紀的前半世紀，婦女運動的標語是：「勞動的權利」。婦女運動者奧林匹·菲茜在她那歷史上有名的宣言中，曾這樣說過：「僅僅承認婦女有政治的權利，仍舊不夠，應該承認比這更重要的：應該要開放各職業部門。」菲茜發表這個宣言的時代，只是表示了爲布爾喬亞婦女，有保障智能勞動的門戶開放的必要而已；一到十九世紀，這要求才漸漸地尖銳化起來。這時，因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家庭手工業完全沒落，不僅將家庭手工業者，轉化而爲工場



勞動者。即人口中占中堅層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的幸福的安定生活也破壞了。小商人、地小主、小官吏等，早已不能由家長一人的經營而養活全家族了。所以不甚富裕的布爾喬亞家庭——不僅是男孩們，即女孩子們，亦不得不自食其力了。中層布爾喬亞的女孩子們，大都為生活想從事教書工作，此外也有想從事文藝創作，或作翻譯，甚或做機關及商店的女職員。可是智能勞動的門戶，還是在婦女面前，鐵面無私地緊閉着，她們很少能被任用，她們的力量與才能，也很少能被信仰。婦女的能被重視的，僅是她們的勞動力可比男子低廉！通常一個男子從事職業，養活他自己以外，尙得扶養他的家族，而女子的從事勞動的，只不過「貼補」父母或親戚而已。一般的女子獲得的工資，只是支配於她自己的用度。這已成為通則了，雖然不但需要完全靠自己，同時還補助家族費用的女子勞動者，已日漸增多，可是在智能的職業部門裏，給予婦女的賃銀，依舊只夠「貼補」之用。這種情形，當然這裏面還有它本質上的關係：就是缺乏職業的訓練和熟練。

國家以及企業家，他們的學校、機關、公司、事務所等的所以不採用女子，不僅是爲了她們是「劣等性」，又知道她們是缺乏訓練，及她們的工作效能的低下。企業家呢，知道了婦女的勞動能力，非常低下，他們才更進一步根據這一點弱點而利用她們的勞動力！

婦女既有部分的參加各職業部門，被她們從各種事務所官廳驅逐出來的男性勞動者，常因此而仇視女性，這是無話可講的，而女權論者，也認爲各職業部門拒絕女子的進出，完全是男子的自私自利主義，由他們的偏狹的利己與對婦女競爭者的恐怖所致。其實這種觀點，是很錯誤的。當十八世紀前半世紀，各職業部門，不爲布爾喬亞婦女開方便之門的最大原因，不得不歸根於婦女對於職業，太沒有準備，以及缺乏職業的訓練。那時拯救婦女的唯一的出路，只有教育機關的開放。到十九世紀初葉，德俄的布爾喬亞婦女運動者，也只要求教育的門戶開放。提議改革女子教育的，在十八世紀時，已有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哲學家兼評論

家康多塞，著作家的菲納羅等人，他們都是女子教育的熱心擁護者。在英國，雖在十七世紀時已有達尼哀兒·但福及瑪利·愛斯達等的提創，但因陷於孤立無援，沒有半點反響。到了十九世紀，這事態完全不同了。由於法國大革命的伟大曙光，培養出不少勇敢的思想來。瑪利·威爾斯克拉福的有名女權擁護論中，就提出了女子教育的問題。她的女權擁護論，有一種特殊的見解，她站在提創「女子教育」與「理想的母性」的立場，要求承認女權。她認為女子的教育自己的子女盡市民的義務，以及教育子女們的愛「自由」等，首先應是母性自己對於「自由」有高尙的教養！在十八世紀的當時，站在廣義的「母性的義務」這一種概念上，要求女權的，除盧梭以外，要算她了。盧梭因創言「天賦人權」，所以主張男女平權。但是從十八世紀起到十九世紀中葉，雖有不少思想家，擁護女子應與男子同享平等的教育，但許多的高等學府以及中等學校，都緊閉校門，使婦女不得其門而入！婦女經過了多方的艱難困苦的奮鬥，冷嘲熱罵的諷刺，衝破了重

重的障礙與無權利的門戶，獲得了相當的技能與科學知識。開拓了獨立的從事智能工作的門戶！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時，有布爾喬亞婦女運動者愛里塞維斯、布拉凡爾等的走進美國大學學府。哀萊莉女士，最初獲得了女醫的學位，女記者麥加莉·佛蘭爾，更是早已聞名了的。這些可算作近代新婦女的前趨。此後美國的瑪利·米吉爾，最初獲得了天文學博士的學位。英國的蓋爾西爾因從事天文的研究，而被推舉做天文學協會會員。可是當時英國的各大學，依舊不為婦女開放門戶，女醫士哈蘭，還是在瑞士成就她的學業的，到十九世紀末葉，婦女才有受高等教育機會。

至於俄國，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才有婦女運動，最初的口號，仍舊不外「教育的自由」，因實際生活的要求，知道沒有教育，沒有訓練，決計不能從事智能的工作的。同時因當時——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正是解放農奴以後，資本主義抬頭，政治上呈現了絕大轉機，最明顯的是：貴族社會崩潰。貴族地主既

經崩潰，他們的子女不僅是男孩非出外謀生不可，即女孩子們，亦不得不出外求工作了，因此女孩子們遂和男子同樣，依照自己的志願，去求智能的職業了。另一方面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機構，也漸次複雜，需要着多方的勞動者（特別是學校及醫院），因此對於婦女也使她們廣受高等教育，各種職業的門戶，對於收受女子，也漸次寬大了。一方是人才不夠，加上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俄國當時的需要婦女加入智能勞動，日漸增大。因婦女比較容易走入智能勞動的部門，連帶的不得不給她以入高等教育的機會。不過這裏沒有鬥爭也是不會成功的，換句話說，她們曾經不少的鬥爭而才獲得。例如有名的俄國數學家蘇菲亞·珂華蘭美斯力亞，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左右在外國受了教育的，她僅做到了瑞典的教授，仍不能在俄國工作，我（原著者自稱）到現在還記得在國外受學位回國的名女醫斯司羅華與羅特納華當時被處的地位，何等慘黯！到世界大戰以及驚人的俄國革命以後，婦女的走進高等教育機關，已是不成問題了，現在成爲問題

的，只有東洋諸國，像日本、中國、印度等。歐美諸國婦女的能夠得到如此的解放，不能不歸功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致，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學校、電報局、電話局、事務所、官廳等機關，都漸次複雜化，到處需要人材。由於歐美婦女活動的過程來看；婦女比較勝任的是教育及各種智能勞動。

十九世紀中葉，婦女運動的口號，已由「男女教育平等」一變而為「要求勞動權利」了。這種現象，完全由於廣泛的婦女大眾，已走進生產領域的結果。也可以說這種口號，由於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資本主義的強化的影響而自然地發生的。

被地主殘酷地剝削的農民，困於飢寒的窮苦婦女，她們（或他們）不絕地要求有工銀的工作。十七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末，布爾喬亞婦女運動者提出戰鬥的口號——「要求勞動權利」時，實際上，一般布爾喬亞婦女們還在家事的雞蛋殼裏，或在愛人或丈夫的懷抱裏，過着安逸的生活呢。當布爾喬亞婦女們看勞動是

一樁可恥的事情的時候，窮苦婦女們已爲勞動權而鬥爭着了。

勤勞婦女大衆的婦女運動，不必說它與一般的勞動運動，有着密切的聯繫。所以婦女運動，可說是勞動運動的構成的一部分。可是我們假使將勞動者和勞動婦女，因爲她們和他們之間，階級的任務，和階級的利益，彼此都有着共通點，所以認爲勤勞大衆層的男女間，根本沒有什麼差異存在，那又陷入女權論者同樣的錯誤了。婦女在各方面和男子獲得平權以外，依舊尙有她的特殊的問題：婦女有生理的特殊性，以及對社會特殊任務——生育。婦女不單是一個市民或勞動者的單位，而是擔負着產生新生命的人。所以她不得不有其他與男子不同的條件。這些，在女權論者以爲可以不必要的。但是站在近代的生活形態的勤勞婦女大衆的立場，認爲是必要的。

現在再重新回復到資本主義國家婦女地位的問題。將女權運動以後的時代，作一簡單的觀察。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制度，有着不少難於解決的矛盾，近代婦女的位置，就是矛盾之一——不僅是勤勞婦女，就是布爾喬亞婦女，也是如此。布爾喬亞婦女們，本來是生活在丈夫的懷抱中，有丈夫的法律在保護她，然而隨着時世的不同，尤其是世界大戰以後，她們中間的參加智能勞動的，日漸加多。同時隨着資本主義的日漸發展，巨大的生產化的緣故，一切的組織，漸次複雜，無數的事務所、官廳、牠們都需要大批的打字員、司賬員、事務員、翻譯、電報電話的管理員等，雖然工錢便宜，智能婦女的需要却愈大了。

各大工場生產的漸趨於近代的組織，亦是非有婦女去勞動不可，可是另一方面，以私有財產為根基的資本主義制度，對於家庭制度，仍是極必要的。

婦女參加各種勞動部門，既日漸增加和普及，而且她們的經濟已可脫離丈夫而獨立，這樣家庭已漸失去了穩固性，開始走上了崩潰與沒落的途徑。

雖然作為資本家的布爾喬亞們，用了好計，將婦女從家庭中奪去，驅她們從



事生產勞動。但是他們的立法者們，依舊否認了既成的事實，依然說：「婦女是被束縛的東西，她的一切利益，由扶養她的丈夫所支配，婦女在國家不能當她是一個獨立的單位。所以婦女不過是附屬於丈夫的「附屬品」。因此幾百萬獨立的勞動婦女，國家應擁護她們的利益的權利，被殘酷地剝奪了。因此她們依舊不能被承認與男市民有同等的權利。所以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婦女要求參政權以及行政各方面的權利（結婚的夫婦平權，財產繼承權等），成了布爾喬亞婦女運動的唯一焦點。積極地參加北美洲市民戰爭的美國婦女，可說是這一運動的前衛者。美國的南北市民戰爭，雖名為解放黑奴而戰爭，但實際上却是：資本主義的北美諸洲和尙在封建形式中的南部諸洲的戰爭。結果是北部勝利了，法律上雖然廢除了黑奴制而實際上是變成了賃銀勞動制的大資本主義國家了。

新憲法中，確立了民主主義的政體，這裏美國婦女，可以認識她的所能得到的權利，這是很自然的。

「假使黑奴已被承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人，那末出力參加廢止這奴隸制的婦女，依舊是被束縛無權利，天下那有此理？」

可是事實的證明，美國的布爾喬亞會議在華盛頓開會的結果，直到那個戰爭後六二至六四年以後，除出一州曾給婦女以選舉權以外，全美國婦女，還是沒有選舉權。

其次再來說說英國罷。同樣地也以婦女參政為中心的婦女運動，因婦女已獲得了參加各種智能職業的權利，她們均以此特殊的目的來組織各種的婦女團體，更聯合各民族的女權論者，召開國際婦女大會——十九世紀末葉。包圍議會、請願、或散發關於婦女參政的宣言、小冊子等。她們認為和平鬥爭術的無效，一轉而為採取世界大戰前「婦女參政權論者」的戰鬥方式。各民族與各社會羣的女權論者，大家叫出了「承認一般婦女的參政權」，至少得同意有限制的選舉權，這口號，雖說為一般而要求，實則等於擯棄勞動婦女於局外。

世界大戰，將女權運動葬送了，尤其在世界大戰以及俄國的大革命以後，歐洲布爾喬亞諸國，隨着捲起了革命的暴風雨，布爾喬亞婦女運動不免因此而消煞了。

(註) 除蘇聯，其他英，德，奧，瑞典，挪威，捷克斯拉夫，芬蘭，丹麥等均如此。

英、德、瑞典等國，本早已承認了婦女的參政權，婚姻法的改正，承繼權的承認等，布爾喬亞婦女們，在家庭在社會，都有了充分的保障。可是布爾喬亞世界，就此再也不能向前進行了。女權論者雖然費盡心力，可是婦女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在此作了個回答：僅僅形式上的平權是不夠的，這裏還有更深刻更複雜的事情。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到處都在爭取參政權與勞動權。有許多國家都已允許了婦女與男子可受同等的教育。夫婦子女間關係，雖因承認婦女有權利，而多少可以和緩了，可是婦女問題，依舊不能解決。總之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

中，布爾喬亞制度的支配下，雖然形式承認了婦女的權利；實際上，婦女在家庭依舊是無權利，在社會上依舊也是無權利，加上道德的偏見，夫權的束縛，婦女依舊無所謂解放，尤其由於資本主義的榨取，婦女決不得解放！

布爾喬亞婦女運動，到此已經是窮途末路了。在此窮途末路之際，指示給勤勞婦女大眾的血路是：勤勞婦女大眾的革命運動。

但是女工以及勤勞大眾們，最初她們（或他們）也不會理解到：婦女問題要得到解決，與勞動運動有密切的關係。經過了長期的苦鬥，數十年的經驗，才知道跟着近代勞動技術的發達，橫梗在男女勞動者之間的界限，打消了，彼此間的利益與要求，都沒有什麼矛盾的存在。而且勞動運動的根本目的，附帶地包含着婦女解放。所以布爾喬亞婦女運動以「平權」為出發點，勞動婦女的中心要求，則是「勞動權」。到十九世紀中葉，勞動婦女中已提出如下的要求：

一、與男子勞動同樣有加入工會之權；

二、同工同酬；

三、保護勞動婦女；

四、保障母性（十九世紀末葉的要求）。

以上的種種要求，在相互間（男女勞動者間）不單絕沒有利害的矛盾存在，而且這是整個階級要求的一部分。關於工資的鬥爭（即勞動權的獲得）是十八世紀末，基爾特鬥爭之一，參加這鬥爭的，不僅是勞動婦女，其他技術未經練熟的男子勞動者也是熱烈的參加者。總之婦女們要求勞動權，是勞動運動的任務之一，婦女的要求同工同酬，也是勞動運動的基本政策。可是這一運動才發生的當時，對自己這一階層間的利益，尙不能明瞭地認識，不免陷於謬誤，無經驗，和近視的弊病！只有在鬥爭的過程中，對自己這一階層的社會的政治的見解，才漸趨鞏固與擴大。

這是必經的階段，在十九世紀初以至中葉，英、法、德以及其他資本主義發

展較遲的國家，沒有不走過那樣的歷史途徑。實例是：智能勞動的門戶開放了以後，布爾喬亞婦女，並不就此能很容易地進去。同樣，婦女勞動者，雖可走進各種新的勞動部門，但她們受到同階級男同事的敵意，更加害厲。許多生產部門，例如機械工業、印刷業、以及其他熟練勞動的各方面，男性勞動者，非常嚴厲地反對婦女勞動者的加入。甚至有許多工會中，規定「不容許工資低廉，技術幼稚的婦工參加勞動」。有些甚至直接要求企業家，「不要採用婦女」。這種同類相殘的矛盾與可悲的現象，不是絕對沒有根據的。這與布爾喬亞婦女參加智能勞動中所受到的非難，完全相同，最大的原因，還是技術不熟練，以及缺乏對工作上的職業訓練。這現象，即使到現在（著者著書的當時——譯者）勞動婦女依舊缺少訓練，所以雖然在各方面都應用着她們的勞動力，但依舊被當作低廉的勞動力而已。因此我們知道：職業訓練的必要是勞動婦女的職業教育的一大問題。也是現在全世界的婦女勞動羣的最大問題。

男子勞動者，想利用法律來抵抗廉價的婦女勞動者。創婦女勞動法律限制的，首先有英國（在四十年代），繼之者是法國，此外也先後製定了這種勞動保護法。這法制的主要點是規定婦女與兒童的勞動標準。並規定每日工作十小時，不准用童工。這種規定，實際上就勞動大眾整個利益看，是很好的現象。它確是對婦女、兒童的階級利益的要求。可是這樣意識的，還僅是一部分。

而在一般要求者，以為這樣可以排除那些未熟練的婦女勞動與童工。

尤其各國的勞動者，曾經不知多少次地，想限制有夫之婦的加入生產勞動。

婦女的參加勞動，不斷開展，到十九世紀末葉，男子勞動者，已漸次轉移了他們的鬥爭對象；他們已由仇視僅取低廉工資的婦女勞動者，而移向真正榨取地們的資本家了。不但如此，且認她們是同一戰線上的同志，因此一變從前的拒絕她們的加入全業工會，反而集注全力吸引她們加入工會了。現在全歐洲、美洲、澳洲以及亞洲的一部，每個工會中，總包含着幾千萬的婦女羣衆。對女勞動者取

着仇視態度的，只有中國和印度的一部分工會才如此。在日本男女工人早已打成一片了。當工會尙未容許女性勞動加入的時候，婦女勞動者自己，早已組織了工會，這種工會，最發達的，要算英國，其次法國、美國，也同樣有這種組織，等到勞動運動漸次展開，明確地認識了自己這一階層的意義與革命的性質以後，男工與女工之間，銷除了一切隔膜，婦女勞動者的工會，也就是一般的工會的同流分支了。

勤勞大眾，既理解了婦女勞動者，是賃銀勞動者的代表者，男女同有勞動權，是整個階層應取的性質，而且女工是未來的母親，勤勞大眾爲了未來的勞動人們的利益，應盡擁護女工的利益與保護婦女勞動特別法益的義務。因此十九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以後，勤勞大眾間要結成政黨時，認爲婦女勞動者已沒有單獨樹立一幟的必要。同工同酬的要求，既漸次實際化，法律的保障婦女勞動，保障母性，保障幼年勞動者，被一般溫和的社會主義勞動黨，認爲必要的事件了。不過一切的



要求，不妨很遠地要求着、進展着，但誰也知道在資本主義的懷抱中，什麼男女平權，婦女解放，是不可能的事情。婦女問題的解決，是要使婦女不單是爲了家庭，而是要使她們變成全勞動社會的一個單位，生產組織中的一個細胞才能實現。

真正的婦女解放，只有社會主義的社會，才能實現。不僅是蘇聯，全世界的意識清楚的勞動婦女，都傾心着社會主義，就是這一理由。

現在我們有更進一步，說到本質的必要：即勤勞大眾漸次明瞭了自己的階級意識以後，知道了爲婦女解放而鬥爭，是他們的階級的任務。在十九世紀初頭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以及他的信徒們，也注意過婦女問題，不過他們對於婦女的無權利，沒有真正的認識，他們不知道婦女的所以奴隸化，原因是停止了分擔社會的生產勞動的緣故。所以他們沒有把婦女問題的解決歸諸於婦女們的加入社會的生產勞動。在他們的眼光中，婦女仍不過是丈夫的妻子，情人的自由的愛人，總之她不是一个獨立的生產單位，而仍是男子的朋友或助手。不

過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也曾不單在勞動、立法上提出了男女平權，即在結婚問題方面，也提男女平等的問題。尤其是聖西門對於「兩重道德」「善惡二神主義」等粉飾布爾喬亞制度的東西，加以勇敢的排擊，是值得注意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戀愛與結婚的兩性平等觀，提出過「感情的自由」的口號，雖然沒有被布爾喬亞婦女運動者注意，但在十九世紀上層的知識婦女間，認為比教育平權與參政問題，更有深大的意義與多樣。擁護「感情自由」的女權論者間，最有名的是：法國革命作家兼參加革命行動的實際女戰士約翰·桑特，與美國的第一個女記者麥加蘭·弗莉。

尤其麥加蘭·弗莉，應用她深謀遠慮的文筆，對於婦女解放問題，確有她不可磨滅的功績。

美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代表羅拔脫·奧哀，主張在同業工會中，邀婦女參加。這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於婦女勞動者的特徵。

馬克思和昂格斯的××黨宣言，開始由科學的見地，來說明家族與結婚，這樣對婦女問題又添了另一層更深的見解。昂格斯根據他的名著家族的源起，在宣言中，對於婦女問題的說明，有更深的闡明與發展。馬克斯的資本論更說明了婦女勞動者數目的日漸增大，以用資本來榨取婦女勞動，是資本生產組織的端緒。從此以後，婦女問題，不僅是個實踐的而是理論地和一般勞動運動相溶合，走上了勞動階級解放鬥爭的路程。第一國際，在它的實踐要求的日程中，提出了婦女勞動問題。馬克思更竭力排擊那些小布爾喬亞的右翼份子，他們是主張：爲了維護「家族」的利益，與減少勞動市場的競爭而限制婦女勞動的。第一國際認清了婦女勞動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立意在愛護母性的立場來擁護的婦女勞動者，要求法律廣泛地保障婦女的勞動與健康。第一國際，由這一決議，認定要解放婦女。那麼站在正確而鞏固的基礎上的婦女勞動，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與歷史的必然性，同時也認定婦女有她的第二社會義務——母性。由這一問題的提出，

明顯地看出了：勞動婦女運動與布爾喬亞女權運動對婦女問題見解的各異，單純的男女平權，婦女的地位，仍不能完全改善，要婦女的地位，真正能得到改善，我以為只有在全勞動人類中才能反映。男女平權！國家特別保護女性！！這是勤勞大眾革命的前衛社會主義者的見解。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出而問世了。這本書已翻成各國語言，連日本與中國，也有了譯本，僅德國一國，竟重印到五十版之多。確是一部勞動婦女的聖書。他不但將馬克思、昂格斯要說的都說了，即使第三國際對勞動婦女的政策，亦更精密而通俗將它活現於紙上，尤其將他們的立場，用豐富的歷史材料來加以說明，將婦女問題，更放在光天化日中了。倍倍爾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勤勞大眾的任務和婦女解放的任務，有它的不可分離性。他更明白地說明了：婦女所以隸屬於男子的根源、理由，婦女所以無權利的成因等。他認為婦女解放的道路與××主義的實現相共通。她的談婦女問題，真是廣及各方面，譬

如對於近代布爾喬亞社會的性道德與結婚問題上的一切虛偽粉飾，真可說盡了嘲笑的笑的能事。從他這本書出版以來，將賣淫問題，認為這是社會的階級與榨取勞動所發生的現象，這樣將黑暗的賣淫問題，將它擺在光明的顯微鏡上了。但是倍倍爾最大的功績，還是承認勞動者的對於婦女問題，有二重的任務：即鬥爭的總目標，儘管只有一個，但對婦女勞動者，應特別注意她為母性的特殊任務。女工運動雖然和全勤勞大眾的鬥爭同其立場，但是也不可承認這種運動的特殊性和有擴展之必要。

在倍倍爾這本書裏，隨處可以看到他指示出第二國際時代女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全世界的女工運動，漸漸和勞動運動同流合匯而展開着。女工已成了社會黨及工會的成員，不但參加罷工與大眾運動，即世界大會、遊行示威等，也是有組織地參加了。到了歐戰的時候，勤勞大眾的隊伍中，已有達百萬的女工羣衆了。而且這些女工羣衆常是社會黨的有力左翼份子。由於

思想的普及與確立，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者的鬥爭，因婦女的參加，更形鞏固而發展；婦女界，也出現了不少有力的社會運動家、理論家、與實踐家。巴黎的社會運動者魯茜·米茜剛，為勞動大眾奔走呼號的羅沙·羅森堡，在勞動婦女運動史上，留着絕大的功績的克洛拉·蔡特金，都是世界有名的人物。她們的行動，在第三國際的建設史上，留着不可磨滅的痕跡，她們的思想，是將馬克思的理論，更豐富燦爛。

特別是俄國，最富有勇敢的女性，她們都是能解脫傳統，有堅決地從事革命鬥爭的意志的人。

俄國的社會黨黨史上，描寫着不少美麗的女革命者的姿態，她們的「內在力量」，自發心、革命的意志，實足誇耀後人的。為了拯救那陷於永遠無權利與愚昧的婦女，而播散新的真理——社會主義的種子的巴吉娜，她是婦女社會主義者的第一人，有魅力的民粹派的典型婦女，從她以後，勇敢的斯撲吉娜，意志堅強

的蘭茜爾、瀏巴凡齊等，不時在牢獄、放逐、死刑的殘酷綫上鬥爭着，對如火如荼的勞動者解放思想上，盡了最後的忠節！

繼以上諸人以後（八十年代初頭），有不少勇敢的女虛無黨員的出現，著名的像蘇菲亞·潑羅弗斯加雅，她有男性的理智，烈火似的熱情獻身於革命事業。被專制的統治者慘殺的女工蓋茜·蓋爾邁，凡拉菲·蓋爾……，這些都是革命的女主人翁，為革命史點綴着異彩。此外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為基礎，與蒲列哈諾夫、阿克塞羅德建設「勞動解放團」的凡拉·查蘇利區，她的學問與著作，到現在還被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寶庫。此後隨着第三國際的產生，女工運動，變成了勤勞大眾組織的革命鬥爭所不可分的成員了。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第一次大會中，特別決定了這一點。

革命勞動運動，既漸次鞏固，這一運動的目的，也日漸擴大，女工運動也日漸長成，布爾喬亞制度不得解決的婦女問題，已不致複雜混亂，勞動大眾的負

擔，也漸次減輕。勝利的凱歌已日漸迫近，現在促進完全婦女解放的能否成功，全在於婦女自身的覺悟與革命的可能性了。

最後，關於婦女能否再回到家庭與家族去的問題來加以解答吧！要解答這個問題，不是僅僅乎在「家事」的是否會消滅，以及它是否是有用或「無用」的關係，它的關鍵，還是在婦女的是否可以排除在生產關係以外的問題。由於生產力的日漸增大，需要勞動力也日廣；而且雖然生產技術不斷地有新發明，可以節省勞動力，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別的生產機關在需要着勞動。例如有一個發明，必需要勞動力。在經濟的發展中，至少要在一個長的時期中，生產的勞動力，不至會過剩，同時更隨着技術的發達，需要亦不斷地在增加。人類社會到達完成的境地，尚是很遼遠的事情，在本質上講，還是很貧乏的，文化的成果，只可說正在起頭，這裏隨處需要廣大的勞動力來完成。新的勞動力的需要既這樣廣大，同樣有能勞動的手的婦女，當然需要的也日漸在增大。現在，婦女的勞動，可以說



在國民經濟上，是不可缺的要素了。假使有人能用人爲的方法，將加入在歐美國民經濟圈內的七千萬婦女，驅逐出外，它將起怎樣巨大的經濟變動？無疑地，將在全世界的生產上，釀成大混亂，許多產業部門，必瀕於沒落與破滅吧？總之：在二十世紀，婦女勞動已成爲在生產上，特別鞏固的礎石了，已沒有再可使婦女退出的可能，尤其由於勤勞大衆的握有政權，隨着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婦女勞動在國民經濟上，更有了堅固的保障。因爲我們的主義是：建設在「不勞動就沒有麵包」的口號上的。勞動是我們勞動共和國的市民各自應盡的義務。因此什麼「婦女回家」「婦女會歸回到過去的無權利」，那很明顯地是不可能的事情。

婦女的無權利、被壓迫、被束縛的時代，已經死去了，永遠地死去了。現在我們是根據了共同勞動的原則上組織着生產，同時婦女問題已有着解決的曙光！

此外已沒有別的路，有的話，也是走不通的路！

參考書：

- (一) 馬克斯與昂格斯XX黨宣言
- (二) A·弗綠尼娜女士第三國際與女工
- (三) 利黎·蒲拉烏女士婦女問題
- (四) A·柯密泰女工如何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 (五) A·柯密泰國際女工大會

## 第九章 世界大戰與婦女勞動

在沒有說到蘇聯婦女的地位以前，我們先有簡單地檢視一下前一個時代——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代的必要。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是人類曾經經驗到的最大的流血戰爭！歐美各強國，都加入戰團，使布爾喬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發生了激烈的搖動。資本主義的生產，失去了均衡，將幾百萬的勞動者，從機器的旁邊，趕上戰場！平常生產日用品的工場，現在一變而為製造破壞與殺人工具的場所了。差不多可以說：保證各國以及交戰團體的勝利，就是軍需工業——子彈、軍需品、大砲的不斷發展，也可以說：決定戰爭的，不在戰場上的過程，而在軍需工業的競爭。這種軍需工業的生產部門，都是大資本的代表，它可以吸收技術不熟

練的勞動者，一方面男子既經上了戰場，他們的妻女，姊妹以及母親等，洪水似的被灌進了工場，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已經失去了「扶養者」的婦女羣衆，不得不靠自己勞動來養活自己，企業家於此，發見了可利用這些工資低廉的勞動力，應用到各方面，因此不久就有婦女們很稱才地在從事挖壕等工作了，在這些上面，使企業家得到了不少的利益，同時對需要婦女勞動的也急速地增高。自大戰起初，以至於平和恢復為止，不僅是交戰國，即中立國——靠戰爭而發了財的中立國，婦女的勞動，亦急激地增加。交戰國的需要婦女勞動力，乃是代替出征男子，而中立國的所以如此，由於生產力的急激發展——生產力的急激發展，吸收的勞動單位，因此加大，由是不管男和女，將她們（或他們）的自由勞動力都很快地被吸引到了生產部門；

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婦女勞動，有了顯著的變化：戰前婦女的天地是廚房，大戰開始以後，一變而為負有國民經濟，和為國服役的「後方士卒」了。她們在

愛國主義的讚美中負着這雙重的重担而勞動着！

從事生產的婦女數，不斷地在增加，沒有一個產業部門，看不到婦女在活動！

戰時婦女勞動，最廣泛地普及於金屬工業，軍需品化學的製造部門（火藥工場）、軍用被服工場、罐頭製造工場等，這些都是直接効勞於產業部門的；不單如此，即使對婦女取閉門政策的後方各產業部門，亦到處在需要着他們。此外電車火車的車長、開車、守衛、買票、力伕等，都有婦女在活動，甚至於最困難且有害於婦女身體的鑛山及建築事業中，也有婦女在從事勞動。至於從事交通事業——電話、電報、郵政等——的婦女，則顯現未曾有的急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婦女勞動力的增加率，各國雖然不同，大約在七〇%至四〇〇%之間。例如德國的金屬工業，增加了四〇八%，法國的金屬工業增加到了二倍，俄國女工的人數，凌駕了男子勞動者之上。例如鐵路事業，在戰前婦女僅從事於事

務、清淨、信號等部門，到了戰時，從事於國民經濟部門的婦女人數，竟占全體從業員的三五%。法國婦女在生產部門的人數占百萬人，英國有百五十萬人，德國則增加到二百萬之多。總計戰時歐美各國的勞動婦女的增加數，約一千萬人。

這樣急激增加的原因，很明顯地不外男子勞動者的不足，與婦女勞動的低廉！婦女勞動者缺少組織，意識力不甚發達，不慣於主張自身階級的利益，沒有反抗營業主的力量，所以她們絕對不以爲她們的拚命勞動，完全是被企業家利用，肥滿了他們的腰包，而以爲這是爲祖國的幸福！有人說婦女勞動，確是能力低下，所以工場主據此而給較低的賃銀。這些可以說完全是荒謬的見解。戰爭中，企業家自己以及他們的理論代表者曾證明：女工可以完全代替男子勞動者，所以勞動生產率，至少不至低下。而且根據統計，果然有許多地方顯示着婦女生產能率的低下，而在別的地方，相反地凌駕於男子的却很多。

婦女的被引入國民經濟的領域，與婦女自身，並沒有什麼妨害，而是爲將來

的婦女解放奠築了很好的基礎，只是值得痛心的是：資本家的榨取方法。企業家們不僅將低廉的婦女勞動，和已有組織的男子勞動相對立，他們從中得利，且將婦女勞動能力，增至最高限度，以謀增加自己的利潤。在戰爭時期中，保護婦女勞動的一切法律，差不多「臨時的」暫行廢止，婦女的作夜工，以及規定時間外再添加工作，是很普遍的事；而且有許多工作，簡直有害於婦女，他們也會毫無顧慮地要婦女担任。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連原是畫餅充飢的「人道主義」的假面具，亦將棄之如敝屣，赤裸地暴露了貪淫的醜相！像英國，婦女勞動的時間，由十二小時延長到十四小時，至於例外的勞動，被認為應盡的義務。當婦女夜間工作全盛時代，在布爾喬亞世界裏，連「有傷家庭道德」這樣的欺騙嘆息聲，也絕無所聞了。

其次我們來看看帝制的俄國吧，俄國的企業家們，將俄國起碼限制企業家的貪慾的法律，亦廢盡全力，將它廢除。一九一五年的軍事工業大會中，不僅因男

子勞動力的不夠應用，且因工業家的不斷要求低廉的婦女勞動，決定了廣泛地採用婦女勞動。庫欺可夫，可諾華洛夫，獵布西斯基等，要求在戰爭期中廢止「限制童工及婦女勞動」。從此俄國許多工場與製作所，採用着十二三歲的少女，從事工作。有不少的國家都和俄國的工業家們同出一轍，所不同的俄國的工業家們，對於利用婦女勞動，並不像其他國家，要用「男子勞動力不足才用女工」等騙人鬼話，用來掩飾自己的貪用低廉的婦女勞動，而公然地說他們要用女工，爲了比用「牲口低廉」的緣故。

各國的工業家們，爲了要飽自己的私囊，不妨造出許多愛國主義的甜言蜜語來欺騙婦女；什麼婦女不得不任後方的兵士卒呀，婦女不能效貞德縱馬疆場，至少應站在機旁，幫助業主，營救祖國呀等。

雖然如此，由於戰爭時期，婦女的參加了生產勞動，地位因此而堅固；而且婦女勞動被社會認爲不可缺的要素。



那麼，女工們自身，到底得了些什麼？她們的地位，是否起了變化？她們的命運，是否已經轉好了？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體味一下：「婦女中的地位，全看她在國民經濟中盡職務而定」的話。在資本主義支配下，婦女雖得了賃銀勞動的榮譽，但實質上，僅是爲主人而勞動，因此婦女賃銀勞動，雖然人數急激地增加，但她在布爾喬亞，會不會改善她的地位，那是誰也會明白的。不僅如此，在戰爭期中，勞動婦女的生活條件，反陷入極難堪的境地。例如因從事於非法的過度勞動，罹病，病死的日益增加等，在統計數字中，不難找到。婦女的患病，死亡，結核菌的傳播，以及因過勞而引起的疾病，雖使布爾喬亞社會，覺得可怖，然而由於他們的醉心於戰爭，對於這些不愉快事，也可視若無睹！是的，這是「不可避免的戰爭犧牲」。因此女工們的生活條件，益趨惡劣：極端延長勞動時間，包工制的普遍施行，一面是勞動的緊張，一面是物價不斷地騰貴。全體勞動者的生活，都陷入極度不堪度日的境地；可是布爾喬亞社會的私生活，却依舊

安然沒有什麼變化。有不少因疲於長久的勞動而回家的婦女——女工、女店員、女司機、女管車等——爲了買取食物燃料，又不得不參加待買的「行列」（譯者註：戰時因商品的缺乏，購買什物的人，大都需要順排等待，按先後購東西）。當時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等沒有一處沒有這種飢餓「行列」排列着。已經疲乏了的婦女，再站在這種行列的尾巴上悠長地等待着，這種苦況是不難想像出來的。她們的康健失調，精神失常，真是比比皆是。爲了母體的不健全，生產的小孩，不是患軟脚病，就是患盲目症。她們外受物質不足的苦痛，內心不時系念着在戰場上的夫、父、兄弟。所以在戰時，前方是碧血與呻吟，後方是窮乏與淚滴！可是多年的混戰，婦女勞動的有助於這種血戰，但當時的布爾喬亞社會，給與婦女的是：除出新聞上鼓吹鼓吹「婦女愛國」而外，對於減輕婦女生活的負擔，他們在夢裏也不會轉念到的。在戰爭期中，既沒有一個爲婦女解除經濟重擔的機關，育兒的事業，只有一二慈善家聊任其勞，一切的一切他們有一句好聽的

話解釋：「一切都爲了戰爭，一切都等戰爭完了以後再商量吧！」

當時布爾喬亞政府減輕婦女的負擔的唯一辦法，是保障兵士們妻子的生活。製定了撫恤兵士的妻、寡婦、與孤兒（例如住宅免費等）。實際上這種辦法，不是爲了體恤婦女，而是爲了要安兵士們的心，與壯壯士氣吧了。可是像俄國等，就連這些賜與，也是極可憐的。當克倫斯基政府時代，中等生活，至少需達百盧布，而當時給予兵士妻子的「補助費」，每月不過七八盧布罷了！

布爾喬亞國家（英、德、法）因嬰兒死亡率的漸次增加，不得不承認了獨身母親的扶助法，可是這法律，仍是極不徹底而且帶着曖昧性的。他們對嬰孩，絕沒有實質上的援助，例如設立保育機關等，所以戰時的母親們，比戰前辛苦萬倍。

由於這種情況下，在戰爭期中，所謂「不穩健分子」常是婦女，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九一五年春，柏林女工的歡迎李布克納脫，攻擊西德麥而作反政府的行動。對物價騰貴與反戰爭的反抗瀰漫了全世界，一九一六年，巴黎婦女曾幾次

破壞市場，掠奪煤塊；一九一六年六月奧國婦女因憤於戰爭與物價騰貴，曾暴動三日。意大利當宣戰動員時，婦女們曾臥身鐵道，阻止兵士出發前線，一九一五年四月俄國的暴動，主動者都是兵士們的妻子，這波濤由彼得格拉經莫斯科以至於窮仰僻壤。女工們不斷參加同盟罷工。當富裕的工業家們，爲了要充實自己的私囊，不妨用「愛國心」讚揚婦女，欺騙婦女的時候，却被受了戰爭痛苦過來的婦女們，一致要求「且把麵包給我們的孩子們吧」。

戰爭給予婦女的是：雙肩不堪其重的担負，因此在下層階級中，發生了不平之鳴，婦女暴動就此產生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廿三日（三月八日）俄國婦女大眾的蹶起，造成了俄國大革命的端緒。

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者，在一九一五年初，爲了反對社會愛國主義，促進婦女的反戰運動，以及決定將來世界大戰時指導勞動婦女的方針，便在不魯捨爾舉行了國際會議。這是宣戰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會議中分成了兩種的政治傾向：

大多數仍主張和社會愛國主義同樣贊助戰爭，而另一派——少數派——俄國的布爾雪維克則主張有以階級鬥爭來報答帝國主義戰爭的必要。

最初的國際會議，由社會主義者來召集，並不是偶然的；這是由於戰爭一天天惡化，婦女勞動者不能忍受生活的困難而自然地發生的。

帝國主義戰爭，雖對於婦女勞動的發展，是一個絕大的刺激，但因世界大戰，勞動婦女的狀態，不單不會改善，反更加惡化；得利的，只是那些投機業者、軍貨商及有產的妻子們。她們是社會的寄生者，國民經濟的重累。她們不單不生產，而且是浪費國民財寶的國民層。

戰爭雖然給全勤勞民衆以絕大的重負與苦惱，另一方面，因戰爭而各工業部門急激地從事再組織與生產的機械化，使未熟練的勞動者也能具備高級技術，而企業益增強大。這些都是很自然地對婦女勞動予以新發展。婦女勞動在戰爭中，一般地已承認了她們是有堅固地位和國家生產資源中的一支柱了。婦女只有做妻

做母做主婦的格言，已成了廢話了。

然而到了戰爭停止，男子成批地從戰場歸來，工業又走上了平和的軌道時，資本主義國家內，很快地有了解雇婦女的傾向。戰爭時期將婦女洪水似地灌進生產部門，現在又從新將她們流回來了。這種事實，一方面正可以說明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交戰國戰後的經濟恐慌的深刻化。同時資本主義在它的沒落期，工業復員的過渡期中——戰時生產時代到平時生產時代——經濟破綻的病態，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個破綻，更增大了列強的財政窮乏、原料品不足，國民大眾，更廣泛地貧窮化了。法、英、德以及其他歐洲諸國，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度的經濟恐慌，差不多使全工業界停止了活動。因此勞動者被解雇，成批的婦女大眾，失去了職業。

然而影響於婦女失業者的急激增加的，不僅是由於尖銳的經濟恐慌所帶來的工廠倒閉，在繼續工作的國民經濟部門，也成批地解雇婦女。戰後在勞動市場，

有兩種競爭者：——復員後的軍隊與勞動婦女。照往常，企業家比較歡喜前者，可是在盤算上，則前者不如後者；因為男子勞動者，不單不甚順服而且不時有許多要求，勞動力的價格也比較高。可是復員歸來的男性勞動者，他們有的是革命的精神，尤其因俄國的突然的十月革命，更給勞動者以重大的衝動與興奮。他們已學會了使弄武器，不怕死。這些因戰爭而兇猛化了的不穩健分子，讓他們沒有穩固的貨幣而開置着，在布爾喬亞社會裏，認為這是一個絕大危險。因此企業家們，甯願放棄從低廉的婦女勞動身上剝削剩餘，而預先防止赤化，不如把這些有赤化可能的勞動者，置在自己的支配之下。由於這種政治的作用，戰勝了經濟的盤算，所以不論德、法、英、意大利諸企業家，開始將有過榮譽的婦女愛國者「勞動勇婦」、後方女兵、逐出了工場，而以退伍兵來代替她們了。

資本主義國家，竭力想使戰時的畸形生產歸還到均衡，戰後的極度的經濟恐慌，漸趨和緩，以減少婦女的失業。可是婦女勞動問題的解決，還是很遙遠的而

不能實現的問題。相反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大規模的機械生產形態的高度發達，婦女勞動問題，更形激化，「婦女回家」的是否可能，是不待說明了。

一般的工業，或其中的一部分，由於一時新局面的開展，一定有許多新的婦女勞動力，被他們吸入生產部門，所以婦女勞動的增加，一方面固由工資的低廉，而主要，還是由於繁榮的工業部門，需要勞動增加的緣故。可是生產力，一時的勃興，它必然的，又會停頓，工場既倒閉，勞動力又勢必過剩。企業家們，為政治的關係，他們努力想把勞動者置在他們的支配之下，不得不犧牲了「合算」的婦女勞動者，因為她們做了失業者，還是沒有危險性的。這種現象，本來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產物，不足為奇，而到了現在更其顯著了。新的恐慌的不斷地一個一個的來臨，全國民經濟的動搖比前些時更深刻化，而範圍也更廣泛、波及的人民層，也廣大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支配了勞動，私有財產制妨害着分配



消費的合理的調整。所以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婦女問題——勞動與資本相互構成的婦女問題——永不會解決的。

在資本主義世界內，婦女勞動問題，既沒有解決與調整的可能，而不可避免的失業的威脅，又不斷地臨到婦女的身上，自然使婦女問題，更複雜而更嚴重化了。

戰前婦女參政權論者的鬥爭，以及比較穩健的同權論者的種種請願運動，都是徒然無功，直至戰後，布爾喬亞國家婦女的地位，確是得到了相當的改良。這其間有着兩個大原因在。第一是俄國革命，與戰後廣泛的人民大眾，示威浪濤的洶湧，攪亂了睡在安樂鄉的布爾喬亞政府。第二是將選舉法改正，給予婦女以選舉權，表示只要勞動者獲得了政權，已沒有再行「社會革命」必要，借此可鎮靜那已擴大的革命氣焰。

因此戰後，英、德、瑞士、奧地利等的給予婦女選舉權，並不是爲了酬報她

們的「愛國的服務」，而是出於他們——企業家的純政治的打算。

然而在布爾喬亞制度支配之下以及階層的不平等下的婦女，即使形式上被承認了平等權利，可是在本質上，婦女的地位，依舊沒有任何變更。戰後布爾喬亞諸國的婦女，依然是在社會上不平等，在家庭是隸屬。所以在這種國家裏，婦女問題的解決，不但是遙遠的事情，而且相反的，婦女生活的各方面，却受到特殊的壓力。

怎樣才能使家庭、結婚、職業、融洽而沒有衝突？怎樣使婦女從煩瑣的家事中跳出來，使她獻身於科學，從事她歡喜做的事情，讓她盡她的能力與勞動，以獲得無限的權利？

墮胎、賣淫與結婚、生產能率與能力的調整，負有養育未來主人的重任的母性健康問題等，像一堵銅牆鐵壁，直立在婦女面前，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這塊鐵壁，是無從打破的。婦女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鞏固的私有財產制的存

在，因個人主義的習慣與道德的頑強，因社會生活的缺乏集團的形態，它永遠是絆在複雜的而不得解決的社會亂絲中。

只有新興的勤勞大眾，才能從這種牽絆中打出一條出路來。

### 參考書

- (一) 李莉娜女士的後方的兵卒
- (二) 柯崙泰的革命期中的女工
- (三) 加布林的婦女勞動與蘇聯的婦女勞動保護
- (四) 柯崙泰的社會與母性
- (五) 柯崙泰的女工如何為權利而鬥爭

## 第十章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

### 一 勞動的組織

戰爭，確是爲婦女解放，創造了不少前提條件。婦女勞動，當作了生產力的構成部分，加入了國民經濟的計算裏面，有勞動能力的許多成年婦女，都被吸入社會，參加各種工作。可是實際上，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的婦女解放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現在且暫將這「蘊藏着混沌的社會問題」的資本主義世界放擱一下，轉過話頭，來談談：另一個於人類史上豁然一新——勤勞大眾握有政權，將國民經濟開始再組織的國家吧。

現在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世界最初的蘇聯勞農共和國了。國家的權力，已歸入勞動者以及農民的手中。布爾喬亞已經不能在蘇聯有投票權，他們已經喪失了

一切的權利了。一切寄生蟲、私有階級、掠奪者，都沒有在勞農共和國存在的餘地。勤勞大衆的蘇維埃共和國，將資本主義社會，從根粉碎，而從事再建徹底生活了。蘇維埃共和國，破壞了舊有的將從新創造並建設新的未曾有的偉大事物。革命以後，新的經濟組織，已有了基礎，社會的生產，已建築在新組織的支柱上，××主義的經濟原則，已經創始了，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了。一切土地、工場、鑛山、運輸，都歸入勤勞大衆的手握，統制於中央國家機關。賃銀勞動制，雖然仍存在，但是剩餘價值，已不歸企業家的腰包，而充任社會上各種必要的消費，以及赤衛軍的費用。生產與交換已經調整了，合理的消費分配的經濟機構，已經很快地有了方針。這種思維的果斷，創造的偉大，以及空前的一切，多在匆忙地建設，與創造發展的過程中。不論在那一方面，新的探求，勇敢的思維之活躍，到處是新興革命實踐的賜與。勤勞大衆爲了探求新的生產形態的基礎，已破壞一切有礙生產力發展的布爾喬亞的餘留物。他們已打開了新世界，這裏可以

努力從事於新經濟建設的根本任務——使生產力對於今後的再生產，得無限制的進展了。

世界上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緊張有力的事情，世界上也從沒有發見過人數那樣衆多，而意志於單一的事情。資本主義的基礎，已經破壞了，神聖的私有財產制，傾覆了。已經失敗的布爾喬亞，爲了想從事反攻，帶了武器，逃亡於外國了。

世界尙在困惑中，赤焰迷天地。有的滿口在咀咒，有的微笑着說，曙光已來臨：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經濟組織的特質是政府對生產與消費，都有嚴格的調整。國民一切的富藏資源，都歸諸有活躍的勞動力的——也是消費者共和國民所有。並竭力講究防止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競爭、恐慌、失業者等。事實上，我們在這個時代，那裏還會有空着手的失業勞動者充滿了市場呢？只恐怕還會感到活

活的勞動力的不足吧！

私有財產制撤廢以後，有的是需要與那些不勞而獲的寄生階層作爭鬥。「不勞動，就沒有麵包」，這是勞動蘇維埃的唯一口號。

國家爲了滿足最小限度的需要，爲了復興因戰爭和官吏的無能而被破壞的工業，爲供養防衛革命的赤衛軍，對於全國民的勞動，要求他們有最高度的緊張。

這個新創造的勞動世界，已沒有了專靠丈夫戀人養活的女子的地位，更沒有職業賣笑婦的地位。誰都在「不勞動，就沒有麵包」的條件下討生活。一切消費，都有嚴格的計算，只有勞動者，才得有「計口分糧」。不得因妻子與成人的女孩的名份來領取糧食。因消費領域的新的政策，與新的經濟關係，兩性間新生出了相互的關係：即婦女要獲得糧食券（領取食物的證券，譯者），不得不尋求職業，從此丈夫不復能自認是一家之長，一家之主了。

婦女，她已意識到她已是不依賴於企業家、丈夫、扶養者了。蘇維埃勞動共

和國不問男子勞動者以及婦女勞動者，他們（或她們）只有唯一的主人，即蘇聯勞動共和國。婦女勞動在蘇聯的建設，在國民經濟上，有很大的意義，這是資本國家——生活各方面，都顯示着男女不平等，婦女是屬從，國民經濟的生產與消費，均呈分散的私有經濟的布爾喬亞國家——所不能有的。

對於成年的有勞動能力的男女，施行均等而適用的義務勞動制，對於婦女的命運，有了絕大的變革，同時也是革命的最偉大的事績。這比十月革命給予婦女的任何政治上或公民的同權，來得有益。當時的蘇聯婦女——婦女勞動市民，女工、農婦，在各機關中，都被承認有選舉權，但與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十九日所佈告的：「根據男女婚姻同權而調整婚姻關係的」法令同樣，只是法律上的形式的承認同權，而在實際生活上，因過去布爾喬亞的傳統地給予婦女的重荷，以及過去的生活方式給予她的道德、見解、習慣等的關係，她們依舊是屬從的被束縛而沒有平等權的。只有施行義務勞動制後，將婦女的職責，在國民經濟上有了根



本的變革以後，婦女才被認為一個完全的勞動單位——是在集團生活中，分担着有益的勞動者了。

以後就很自然地各方面都確認了婦女的真正同權。同時我們更知道婦女在國家社會的地位，和男子同樣，是由於她在國民經濟所分担的職務而決定。這裏我們不得不絕對明瞭的是：義務勞動制在婦女解放事業中所得偉大的革命任務。

那時蘇聯的生產組織，正想實現三個基礎：

- (一) 將婦女歸入全勞動力，努力對於這種全勞動力有一個正確的計算，得有效地利用它。
- (二) 由個人主義的經濟，財產私有，家族的消費等，轉移到：計劃的，統一的社會經濟集團消費。

(三) 實施單一的經濟計劃。

以上諸原則，雖然是個別的，但現在已是做了經濟政策的基礎了。俄國因帝

國主義戰爭及長時間的市民戰爭，經濟陷於根本的荒廢，運輸業陷於破壞，技術的發展陷於停頓；因此，對於經濟的復興，生產力的向上等問題，成了當前的緊急任務。至於資本主義國家，亦經過了經濟的荒廢與凋落的時代，但是他們的資本家以及金融業者，依然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桎梏中，竭力掙扎求其生產的復活手段。結果，工業雖是一時的向上，但此後，又有新的金融恐慌與不景氣的來臨。可是蘇聯的勤勞大眾，對於增大將來的生產力問題，已解決了。蘇聯的勤勞大眾，已理解了；要把人類從已陷入野蠻狀態的衰退與荒廢的經濟，挽救過來，只有轉入生產的新形態才有可能。而蘇聯現在正調整着並建設着這些生活形態。不過蘇聯的勤勞大眾，因限於資本主義所繼承下來的技術生產；以及革命後，一時對科學的發達和技術上的發展，沒有急速前進的可能；因此，蘇聯的生產力向上的鬥爭，主要的還是採取新生勞動力的組織的方法。

××主義的經濟基礎，在於全般的有計劃的，換句話說：在於統一計劃的

組織下而勞動。這樣一個勞動者，他不是爲了個人乃至一家而單獨地活動，也不是單獨的爲了經濟要求。而是以全國民經濟爲目標，促進社會的富有。

使勞動能率提高，第一不得不將生產與勞動力有正確的計算和支配。在戰時共有共享時代，從事這支配與計算的，就是最簡單的義務勞動制。

資本主義國家，一切都是無政府狀態的，勞動者競爭支配了勞動市場。有的地方勞動者感受到失業的痛苦，有些地方，却感勞動者的人手不足。有些產業部門，勞動者因過度勞動而疲憊不堪，有的部門却因不景氣，生產停滯而解雇勞動者。而戰時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下，對於勞動力，有了正確的計算與支配，將勤勞大眾全體——尤其是女工，以及薪俸生活者，從失業的深淵中解救了出來。自實行義務勞動制時代起，大眾的失業者，就不存在了。所以義務勞動制，在世界大戰與內戰而引起的國內生產力的大破壞中，確是防止生產衰退的唯一良方。義務勞動制，怎樣爲婦女鳴不平？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怎樣發見了婦女的重負？義

務勞動制，確是承認婦女解放與同權的有力槓杆。義務勞動制，將婦女的勞動，確認了它在國家的見地上，是有益的必要的，因此同時承認了婦女勞動與男子有平等的價值。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實制義務勞動制，是戰勝了貧窮與飢餓的勞動共和國，增大生產手段的唯一妙法。

蘇聯共和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增大勞動資源的第二件事情，是集團的消費。婦女的個人主義的家庭消費，與非生產的、浪費的多數婦女（當時俄國女子人口，超過男子數百萬），都歸入了社會的消費組織而被解放了。蘇聯的食堂、託兒所，兒童院，婦女會館等，將婦女的非生產的勞動，都解除了。從家事勞動解放下來的婦女勞動力，被應用在最有利的社會經濟上了。所以義務勞動制是將私生活加以根本的改善，且與××主義的新生活條件的組織問題，漸相接近。

不改善生活的義務勞動制，適足以更加重婦女勞動的重擔，使婦女的生命與

健康，無限地疲憊。資本主義下的所謂義務勞動制，就是這樣反動的東西。至於一方面施行義務勞動制，同時將集團的消費，以及全生活的根本改善兼合而爲一的勞動共和國，完全以創造健全的婦女解放爲重任。目前的蘇聯，對於經濟的振興，生產的向上等問題，已較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更猛進了。每個男子勞動者與女子勞動者的生產能率向上問題，被當作第一計劃而研究着。不過我們國民生活的改善，還不能普及於勤勞大衆的全部，他們有不少還繼續着布爾喬亞世界的生活狀態。女工的勞動力，很顯明地還不能創造新的繁榮與新的價值，她們還有不少仍消費在個人經濟中，爲家事而變成一個不生產者，她們只有將勞力獻給一部分的事業，同時她們的工作，確有許多地方，比較不甚優秀，且也比較不甚熟練。總之婦女將自己的勞動力，再消費在生產以外的工作，那末她在事業上，工場上，終不免工作低劣的。一個爲乳兒而熬夜的，一個從事工場勞動之外，不得不再要利用自己的餘暇，從事三餐、料理家庭瑣務、奉侍家族的女子，比諸於至少

夜間得有常態的休息，不必担負家庭瑣務的男子，對工作的注意力當然會減低，同時亦會變成劣等的勞動者了。

只有生產組織化，公社會館網的廣大發展，隨處設託兒所，不斷地扶植集團主義的原則等，是提高勞動者，尤其是女工的生產能率的最正當手段。這樣共和國的勞動工會，或經濟機關，才能要求女工的作業優良吧？只有將那幾十萬幾百萬的婦女生產者的勞動，不必在工場以外再從事於煩瑣的個人經濟，那末才能嚴格地責備她在工場內的勤怠。

我們共和國的經濟機關，最重要的，在於使有損國民經濟的條件的減少，因此浪費在私生活上的婦女勞動力，有竭力使她們減少的必要。

勞動生產率的向上問題，不僅是與新勞動力的增大問題，有不可分的關聯，且與不斷地應用婦女的勞動力，及將個人的經濟，代以將集團經濟作為原則的生活條件的組織有密切的關聯。現在我們的勞動共和國的生產品政策，最顯著的就在

於應用新的勞動力這一點，第一從事生產勞動的數字的增加，和不創造財富而費用着共和國的經濟的，已日漸減少，即是明證。

勞動共和國的生產手段的社會化，確是創造了把國家生產力向上的絕妙的辦法。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是供給富裕的不生產者去消費的新創造的「價值」，現在則成爲國民經濟的財產，成爲勞動人口直接的消費，和將來再生產的基礎。不僅如此，在布爾喬亞的支配下，從事生產與創造價值的，只有人口中的一部分——都市與農村的勤勞大眾。至於國民的其他一部——全有產者層，只參照着消費方面。總之在布爾喬亞支配下，爲繁榮而生產勞動着的——滿足富裕者個人的消費，迎合他們的慾望而工作的人類——人數，日漸增加着，同時資本家們更領導了大批製造奢侈品的僕從、姬妾、頹廢的優伶、無聊不成品的藝術家或科學家，賣淫婦等，爲滿足自己的慾望，不妨消耗巨額的國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依男子而生活的婦女數——不生產的人口數——大批地增加。她們在大

戰以前，大多數都是依靠父夫爲生的。總之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而發生的現象是阻止勞動的單位的長成。到現在布爾喬亞諸國依舊使生產力的發展停頓着。至於蘇聯，現在事態完全不同了。不過布爾喬亞制度的殘留物，現在還不能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完全掃盡。主要的原因，在於比較富裕的農民，已深種了小布爾喬亞的習氣的緣故。這種現象，尤其在婦女身上容易反映出來。男子勞動者因爲國家對於人民私生活的不安定與舊的殘留物的作怪，他們有不少在苦悶着，而緩和他們在家庭裏的不如意的，是他們的妻子或母親。婦女負着這種重荷，對於她們的力量與康健，是有損的，所以對於私生活的組織問題——尤其婦女勞動者——成了問題。假使將有敏感的經濟眼的女工，使她覺悟了她有獨立性，給她相當的自由，她對私生活的調整上，比較男子勞動者，有更多的創造與能動性。勞動階層的婦女，雖家中一無長物，但能創造自己的家政，且已習慣了僅持些許的生活費，而能支持家庭。假使給她以思維上的發展，私生活上，使她傾向注意到集團



生活，使她們對這種生活，有堅固的信念，那麼對國民經濟與她們的自身，都是有利的，這樣可傾向以××主義為基礎而改善生活樣式。

不僅將婦女的生活改善與有興趣，使她有獨立性的眼光，同時還得盡可能地努力，使一切機關——創造勞動階級的私生活的改善，以及社會主義的根據地的機關——吸引多數的女工，組織協同工會。

私生活不加根本的改善，而要她生產能率的向上，那是空中的樓閣，所以最高經濟機關的使命，在於完成勞動的組織計劃。將勞動時間一部，使她們直接應用在私生活的改善上。換句話說，應將婦女勞動者（乃至男子勞動者）改善生活條件及為食堂託兒所所費的時間，都必歸入她們的義務勞動時間。

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能很廣泛地有改革私生活的衝動。

黨婦女部的使命，在於考慮如與生產機關相提携，如何利用私生活組織化的領域中婦女的能力而製定計劃。這樣女工可再不致負額外的勞動，即使僅有些許

的閒暇，亦與婦女有益，所以不得不起而保障。在××主義下關於私生活的組織工作，與從事於直接的生產——對國民經濟的勞動——同其意義。提高生產能率條件的創造，是發展生產力的實際的前提。因此計劃勞動組織，必需注意如下事情：即積蓄勞動力，不使婦女的勞動力隨便浪費於不生產的事件上，改善私生活，而集中於生產。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隨着義務勞動制而必起的生活改革的萌芽，奠定了廣大而深化了集團的消費的原則方策。這種條件，由勤勞大眾的獨裁而實現了。基於全人口的參加生產勞動的國民經濟組織，把婦女中的地位，在人類史上，有了絕大的變革。勞動共和國，從十六歲到四十歲間的成年婦女，都有將自己的一部份勞力，為國家服役，為生產復興而工作，與破壞作鬭爭的義務。義務勞動制，對生活於都市或農村的婦女，都可適用，它是將農婦從家庭裏誘導出來，使她走進社會的公共勞動。這樣農婦與農民，同樣有履行義務勞動的義務。準備燃料，掃除

鐵道路線、修理道路、植林、裁製軍隊衣服等工都用着婦女。這義務勞動施行了以後，對於農婦雖加重負擔——農村的生活形式，依舊和從前同樣沒有託兒所，沒有社會的榮養所，一切家務事，依舊堆在婦女的肩上——但社會上至少已公認了婦女是生產的一員，她們已經站在新的條件上，和從前完全不同了。老百姓們對於婦女的態度是：國家既將女子算作國家有用之人，丈夫對「老婆」，至少覺得她是具有用的資格。這種觀點，雖仍不減過去的侮辱，但至少兩性間的相互關係，已平等化了。

在都市裏，一般的婦女，都適於義務勞動制，沒有拿勞動證的——沒有在一定的工場、官廳或黨機關服務的，都從事於市的衛生、掃雪、掃除房屋、或搬運薪炭、裁製軍服、在病院中服務等補助工作。全國民義務勞動制，對於婦女私生活的解放，有了絕好的刺激。將歷來的兩性生活的姿態與關係，起了轉變。不過若將義務勞動制，看作可以解決婦女問題，那又是近視眼之流了。婦女在國民經

濟上所盡的責任，不僅是勞動力，而是母性，負擔着產生未來人的責任。勞動共和國，對於婦女的這兩個重要使命，不能輕易地忽略過的。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因我們黨婦女部的策動，發布了不少的法令，這些法令，對於婦女勞動者的勞動，有相當的擁護，考慮過渡時代私生活的特殊性。留意「母」與「主婦」之利益。蘇聯全體住民，這時都被強迫勞動，而對於婦女，却有許多特例。義務勞動，男子爲十六歲到五十歲，而女子只到四十歲。假使持疾病的證明書及四五%失去勞動力的婦女，也得免去義務勞動。一切妊婦（產前產後一個月），有八歲以下的子女的母親（家中無代爲管理子女的）亦免除義務勞動。婦女生產子女，而子女即行死亡的場合，仍從分娩日期計算，休息八週間。將自己計算在內，家中共有家族五人以上需要服侍的，也免除義務勞動，對於擔任笨重工作的婦女，妊娠初期可免除義務勞動，失去三〇%勞動能力的婦女，亦同上例。勞動人民委員會的附則中，規定婦女担任比較輕易的工作。

最後，都市的女住民，在有十四歲以下的子女的，農村婦女在有十二歲以下的子女的，得免除住所變更的勞動動員。

擁護未來「母親」的健康計，擁護擔負未來的後裔的勞動婦女的利益計，所擬的方策，大都由黨婦女部的提創與熱心的主張，在義務勞動制中，有了明確的規定。

這些和布爾喬亞的女權論所主張的空虛的形式的兩性同權論，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法律上的同權以外，加上擁護並防衛婦女特殊的利益——爲母性而應享的特殊利益——這是蘇聯勞動共和國對婦女問題正確的見解。

從母性的見地，保護婦女的體力與康健，誘導婦女到社會上去做有用的生產事業，這是解決婦女問題的根本正途。國家的權力，很快地被勤勞大眾掌握以來，婦女被引入社會成爲有用勞力——昔日的隸屬性，已到了末日——走上了生產的途徑，婦女解放的門戶已經開了。由於勤勞大眾的掌握政權，已經達到了承

認真正的男女平權。

參考書

- (一) XX黨與女工的組織 (論集與指令集)
- (二) 沙莫洛華女士的俄國革命中的女工及勞動戰線與女工
- (三) 蒲洛尼娜女士的女工與生產的組織
- (四) 柯崙泰的義務勞動制與婦女勞動保護
- (五) 列寧的女工大會上的演說

## 第十一章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

### 二 勞動條件與其保護

革命前的俄國，靠勞動收入而獨立生活的婦女數，在數字上看，是相當多的——據帝制時代最後一次的調查，為五千萬人以上。但這和全人數相比例，只有全俄女子人口的八%而已。

到世界大戰時，由勞動收入而獨立的婦女數，已有顯著的增加，例如一九一四年的俄國，婦女勞動者的從事於工業的已占全勞動者人數三二%，一九一八年一月，已達四〇%之多。

根據蘇維埃的調查，一九一八年的女工以及婦女薪俸生活者的數目，占全男子勞動者和薪俸生活者的四〇%。據全俄勞動工會的中央評議會統計，一九二一

年末，從事工業與運輸業的婦女數，超過兩百萬以上（這裏雖包括薪工女勞動者和農婦，但自耕農婦，並不在內）。有六個工業部門的婦女數（即六個勞動工會，她們的勞動都是經過法律公認她們是該生產的合法勞動員）。簡直超過了男子勞動者。一九二一年婦女占經濟部門全勞動的七四·五%，裁縫工業婦女占七四·二%，織物工業占五八·八%。家庭勞動者（僕婢等）占五三·二%，在數字上看，以從事於纖維工業、衛生材料工業、運輸、加工金屬工業、裁縫工業等為最多，此外大多數從事於公務員藝術以及國民教育等，到現在也如此。

不過雖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婦女因義務勞動的施行，被國家認為有用之材，因此六個工業部門的女工數，超過了男子勞動數，另十個工業部門，女工數在該生產事業部門全勞動者中，由四分之一增加到半數以上，不過在生產事務所、工場委員會、勞動工會事務所、蘇維埃經濟機關等機構內，婦女從業員，在當時，還是只有極少數。



茲將一九二二年度各工會的婦女數列表如下：

工會名稱	全工會會員與 婦女的百分比	工會幹部中 女的百分比
國民榮養機關	七三·五	三〇·九
裁縫工會	六九·一	二五·七
煙草工會	六七·八	三六·六
教員會	六五·二	三七·七
纖維工會	六〇·二	九·三
衛生材料工會	五二·七	二〇·二
藝術勞動者會	三九·三	九·二
化學工會	三五·六	八·六
製紙工會	三四·三	一〇·一
蘇維埃政府職員工會	三四·三	一一·四
印刷工會	三三·三	九·六
通信從業員工會	三二·五	一三·二
自治機關職員會	二二·五	八·一
農林業工會	一九·八	六·二

食料品工會	一八·三	四·三
金屬工會	一六·六	一·八
木工工會	一六·四	五·五
運輸從業員工會	一四·五	五·〇
皮革工會	一三·八	二·七
建築工會	一一·八	二·九

纖維工業中，女工數雖是絕對的多數，不過在三十八縣的百九十四名纖維工會幹部人員中，婦女僅占十名；尤其在工場事務室，統一管理的，很少婦女的存在，參加工場幹部的婦女，也不過纖維工場及裁縫工場內的幾個集團吧了。至於中央事務所，生產本部的幹部中，婦女數更稀少了。因這畸形的狀態，共產黨中央委員婦女部，在第八次蘇維埃大會裏，特別規定設立：「引導女工及農婦進經濟建設機關，給予參加管理生產的機關」等問題。

國民經濟，爲了提高生產，吸引了婦女勞動，因此在我們的一切經濟體系中，已沒有做妻子、做賣笑婦、及依賴他人財產而生活的寄生蟲了，然而婦女的

價值，仍這樣不能和男子平等看待（蘇聯婦女，不但在法律上已平等，且參加各種生產建設，尤其在赤色戰線上，更是積極的活動者）。這是由於古舊的偏見，蒙蔽着理性有以致之。因為雖然眼前的生產關係已改善，但舊道德觀念與舊思想，仍殘留在一般人的腦海中。

參加指導機關的婦女人數，這樣稀少，在有種場合，不得不歸罪婦女自身，有人說這是世界上一般的婦女，都比較富於消極性的緣故。

世界最先的勞動共和國，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 $x \times$ 主義的萌芽長成的試驗場中，婦女勞動是怎樣的狀態呢？第一，最基本的問題，即對婦女勞動，是怎樣處置的？婦女自與男子同樣出賣自己的勞動以來——自中世紀以來，婦女的勞動力，始終比男子低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對婦女勞動要求同工同酬，不僅女權論者，就是有意識有組織的勤勞婦女大眾，也早有這種要求了。在資本主義經濟下，這要求不絕地此起彼落，譬如：假使有一個勞動部門，由勞動者的組織鞏

固，而達到上述要求，但由於新的沒有組織的勞動力——婦女——不斷地洪水似的紛至沓來，因此全國一般的婦女勞動的薪銀水準，都比較低下，可是這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得解決的問題，在俄國，由於革命的成功而解決了。勞動者的工資，以性來分別的現象，已沒有了。工資的區別，都依照個別的原則，個別的經濟見地來區分。工業、運輸、農業、國營或私營事業的工作人員，總之一切的勞動人員的勞動薪工，都依照該勞動工會以及全蘇勞動工會評議會的審議，規定一個比例。完全與性別沒有關係，全依照勞動的複雜、熟練、工作的難易、危險性有無等為根據，女工在她勞動的範疇內，受她的工資。工資的高低決不是決諸於機會的遊戲——需要及供給的影響與布爾喬亞國家中的工會及勞動者爲了獲得更高的報酬的爭鬥——而是經過工會以及勞動者自身的意志而決定的。

一九二〇年莫斯科勞動調查，事實如下（未成年的女工——未滿十八歲者——的平均工資率，有許多部門，在革命當初數年，即和男子——未成年者——

相同，甚或反高：

生產部門	男工平均工資率	女工平均工資率
化學	六·二	七·一
煙草	四·三	五·七
自治機關	六·三	五·〇
衛生材料	二·八	五·一
織維	三·七	四·一
社會榮養	三·〇	三·二

但是將成年女工與成年男工相比較，女工的工資率，平均要低兩倍，化學工業中的男子勞動者平均工資率為一〇·六，而化學生產的女工則為六·八。食品工業的男子勞動者平均工資率為八·九，而從事國民營養事業機關的婦女勞動者則僅八。金屬工業生產部門的平均工資率，男工為九·二，女工則僅二·

七！

這種現象，由於蘇聯婦女勞動的技術，一般的尙未熟練的緣故。在婦女的

技術以及職業教育，沒有達到當然的高度，那末雖然勞動共和國已宣揚了「同工同酬」的寶貴原則，依舊只有形式的。

自從革命以來，蘇聯政府對勞動者，由支付貨幣，而代之以供給現物。例如不但分給麵包（持有勞動證的蘇聯男女市民，都有領取麵包的權利），也有享受住宅、煤油、燃料、工作服、出入公共食堂的權利。

隨着蘇聯經濟政策走上新的正軌，勞動者分給現物，以及以集團的給養為根據的勞動工銀等新原則實施後，我們對於男女的工資，已沒有再細說的必要了。不過因分配現物——生產與消費直接聯繫了——打破了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中的國民經濟第三要素「商業」，這一點，不得不認為有興味的一種經驗。由於分配，商業完全成了不必要的東西，而且也是無由存在了。等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成功，再由現物而支付工銀，那時當又是另一種形式了。

戰時這種分配方法，是否使女工們滿足呢？回答的是「不」！當時的給養，

還是非常凌亂的。有時糧食完全不到，或者分配太遲，被服不足，燃料、煤油等，需經過工場與製作所等的分配機關之手，才能達到每個人。使勞動者不得不求供於自由市場（非合法的），而那裏的生產物，又不斷地騰貴，因此婦女勞動者，陷於極端的窮境。當時這種苦重的生活，使農婦與女工的眼裏，將革命的勝利看作了暗影！

不過在勞動者之間，再也不會發見有提議再回復到資本主義，或贊成布爾喬亞政權的了。

爲了要對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的婦女生活狀態，更深一層理解起見，有一看當時蘇聯的勞動保護法的必要。兩性成年勞動者，以八小時制爲原則——即使生產的事情，有時有礙於三部交替制，但男女勞動者一週的時間，也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特別於健康有害的許多生產部門（例如煙草、陶器、若干的化學工業）。規定勞動時間六七小時，夜工在男子勞動一週規定七小時以內，女工則完全禁

止，此外智能勞動及事務所勞動，均只六小時。

日間的休息，爲三十分鐘起至兩小時止。一年中有一月假期，半年有兩星期的休息。不許未滿十六歲的有賃銀勞動，十六歲至十八歲的未成年的勞動者只准每日做六小時。

但是實際上這種規定，並沒有到處應用，因戰後後方陣地的需要勞動，與戰時已興奮了的空氣，所以這種規定，有時完全不被注意，譬如將一年休假一月的規定，改爲兩星期的，將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少年，課以四小時勞動的，夜工以及規定時間以外勞動，到處都在應用。一九一九年十月四日勞動人民委員部的特別規定，婦女的夜工，可由當地的勞動委員會、工會、以及勞動監督委員會的承認，暫時通行，只有妊婦與有乳兒的婦女禁止她做夜工（一九二〇年十月的法律）。

蘇聯的法律中對婦女勞動的保護，特別規定：禁止夜工，禁止額外的勞動，



及地下的勞動。實際上這種規定，亦因正當破壞時代，深感勞動力的不足，所以一切現存的勞動力，都有盡量地應用它的必要，因此這種規定，沒有實行，不過在健康上特別有害的生產事業，亦仍禁止婦女的勞動。且有特別的指令，規定：「給婦女力能勝任的工作」。並規定婦女從事搬運工作的，重量在四·一基羅格蘭姆之下。

這樣看起來，在當時保護勞動男女工的法律，實際上，並不完全遵守，已經很明顯的了。

由勞農政權預定的方策，因經濟的破壞和熟練的經驗的勞動的不足，妨礙了它的實現，等到企業內的衛生設備以及衛生防止等都完全了以後，才真能實現。譬如爲了適應一切，如起重機，搬運機等一切技術的應用，熟練的勞動手，都是必要的條件。戰時的蘇聯什麼技術的準備都沒有，熟練勞動者也感十分的不足。勞動是非衛生的，有害於健康的；勞動保護法，與其說它有實踐性，毋寧說它是

一種裝飾，不過最近已漸見進步了。

雖然在戰時，全般的勞動保護，很少能夠實行，但蘇聯政府至少有了社會主義的一分野——母性的社會的保障與兒童的保護。製定母性保護策的基礎，是在十月革命後第一次女工會議中，製定了綿密的項目，審慎地決議了的。

母性保護的基本原則如下：受國家保護的不是全市民。換句話說不是富農或工場主的妻，而是不僅是勤勞大眾（不榨取他人的勞動）之妻得受國家保障，只要從事筋肉勞動的婦女，產前後十六週，生活由國家保障，從事其他勞動的，則休假十二星期，另給予手術費。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法令，特規定智能勞動中，容易疲勞的如電話接線生、電報報務員、打字生、女醫等，產前產後，得給予十六星期的休息。妊婦或產婦有受給養的權利（一九二〇年的十一月的法令）。

戰時的法律中，規定有乳兒的母親，在授乳期中，至少得給她當地最少限度

的工銀的半數以上，且給予當作養育料的分配物，當時的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貯藏品並不豐富，但對於母性和嬰兒却努力保障。所以並特別規定應受保障產婦，給予十五俄尺的織物，當作給嬰兒的養育料，這種織物可以交換別的東西。母性保護部，到了軍事共產主義時代末期，已分給乳兒已做好的物品了。

義務勞動制施行時，有幼小的孩子的母親，不使她做離住宅二俄里以外地方的工作。當時雖只對勞動者給予每人的給養（國家一切的積蓄，都非常凌亂，全勞動大眾，都只根基一定的標準來分配），但妊婦和授乳中的母親，却受到特別的待遇。例如妊娠的後半期至養育乳兒期間，母親除勞動給養之外，更給予營養物如：麵包粉、奶油、砂糖等，對於嬰兒，更有肥皂煤油等的分給。

妊婦要乘電車或火車，只要她有許可證和身分證明書，可和中央執行委員受同等的待遇：不必依次等待而乘車。這是全世界沒有看到過的創舉。這時爲了扶助母性，國家支出達數十億盧布。到一九二〇年，這種扶助金，全國超過三百四

十億盧布。同志額培華說得很中肯：「將國家的財富，對母性保護事業，作如此的支配，只有衷心樂意於保護未來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即勤勞大眾的新後裔）的支配階級，才能做到。」

俄國革命最大的社會勝利，是母性的保護與保障，他的目的，無疑的是使婦女可容易地對集團得共同勞動，和行使婦女自身的本來的使命——母性，母性保護的規定，真是勞動共和國值得誇示的事業。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的蘇聯，婦女的勞動法和一般的條件如右：

隨着義務勞動制的實施，婦女勞動被確實地承認了。在工業上，婦女勞動顯著地盡了她們的任務，在六百萬勞動者中，約有二百萬婦女勞動者。換句話說：婦女參加搬運的或從事工業的農業，以及在各種蘇聯機關服務的，占全勞動者三分之一。至於工資，雖然根據同工同酬的原則施行，但婦女勞動者的大多數，因缺乏熟練的技術，所以勞動共和國的婦女，至少在革命的初期，是受的極低廉的

工銀。所以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黨婦女部，對於兩性勞動的必要條件——職業教育，極有深切注意的必要。多量地準備着勞動力，不僅於婦女勞動，即對勞動共和國的國民經濟，也有莫大的利益。

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蘇聯的勞動保護法，雖沒有實際施行，但對於保護事業，很早就把握住對婦女勞動的特別保護與母性的特別保護原則而施行。

對勞動者由支付現金而改爲使他滿足自然的消費，這是革命的方策，這方策，因種種原因，雖已被放棄，但根據於革命初期的經驗，知道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強化與長成，有使它實現的必要。

### 參考書

- (一) 蘇聯權力與婦女解放 (法令集)
- (二) 加波羅女士的婦女勞動與保護
- (三) 烏愛·賴培華女士的蘇聯勞動共和國的母性與嬰兒保護

- (四) 柯箭泰的生產與私生活
- (五) 賴羅奈羅的俄國女工的經濟及法律地位
- (六) 理樂諾華女士的勞動運動與女工
- (七) 特羅斯基的我們的生產任務

## 第十一章 生活的革命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經濟組織總體，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道德、思維、見解等都起了變化。

只要有眼睛，誰也能夠看到，「生活」在我們的眼前，漸漸地變化了。幾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婦女的「無權利」，完全被破壞了。勞動共和國，一方努力將婦女引入生產的勞動，他方將這些生活在新經濟原理下的婦女，加以組織，教她們集團的習慣、概念、見解等等。

生活的變革，特別在革命的初期——軍事共產主義時代——有顯著的變化，從古以來一直到現在的習慣、私生活、生活樣式的根基，一轉眼打得粉碎了，因內戰的劇烈，國民經濟的非常混亂，而社會主義的制度萌芽了，它的燦爛的新生

活，以少有的光明而建立了。

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它的唯一基礎是什麼？它不僅是「生產」，而是以消費組織來調整着。消費的調整，不僅是計算將全國的產物與富有，來平均地分配。而且是將消費的組織，建立在新的社會主義之原理上。

勞農國家第一使人佩服的是：合理的，儘可能地經濟的，而且聰明的消費的組織，這些的最初的出現是：「社會的給養」之實施。

爲了當時的窮困狀態，與貯藏的不足，來設法與這一般的貧困飢餓相搏鬥的，不僅是消費的社會化集團化，而是尙有其他不少的方法。

勞農共和國從一九一七年春以來，因迫於必要，各都於「社會的給養」的原則下，設蘇維埃食堂和給幼年者以免費就食，因此使以家族爲基礎的家庭經濟範圍狹小了。由於我們的貧窮與產物的稀少，有碍於社會給養工作的發展與擴張，是不待說的，雖然社會給養的機關已經組織了，爲了流通國民的營養物，已由中



央開設了運河，可是食糧依舊沒有。

我們的國家，已窮困到了極點，國家的生產物，貧乏得不堪，可是滿懷惡意的資本主義列強，偏又封鎖糧食，我們中央共有的倉庫，不能吸收外國的產物，因此一切都感到缺乏，食物粗劣不堪，然而「社會的給養」在都市住民的生活上，我們認為是不可缺的。譬如彼得格拉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全人口的九〇％都受「社會給養」的。莫斯科估登記需要「社會給養」的全人口六〇％以上。一九二〇年有一千二百萬人（小孩在內）的都市住民受着「社會給養」。由於這種事實，婦女的私生活起了極大的變化，使婦女變成奴隸的廚房，已不是家族生活上不可缺的東西了。果然，走向××主義去的路，只是正在探求中的過渡時代，而且布爾喬亞的社會生活形態沒有消滅，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變革的這時代，束縛婦女的廚房，依舊有它的重要地位，不過爲了「社會給養」的補助，至少廚房已不是「家庭第一」了。這裏我們的公共食堂極有飛速增加的

必要。女工們首先意識到公共食堂能經濟她們的時間；只有吃不飽或十分沒有營養的東西的時候，會使她們不滿，此外再甘願自己做東西吃的，只有愚頑不過的人了。不過社會的給養，雖然比較改善，但對廚房還抱着趣味的，也許不乏人吧？在布爾喬亞制度下，婦女對扶養她的丈夫，親手製菜，博丈夫歡心，這是因為丈夫是她唯一的靠山，不得不如此的緣故吧！現在的婦女，已被勞動國家承認她有獨立的人格，是一個市民，在這種情形下，還有歡喜費盡時間，委身於炊事的嗎？在男子一方面的觀察女子，不是看她怎樣會揉麩粉，而是尊敬她的人格、個性、以及她是「人」。廚房和結婚分開，這和宗教與國家分開同樣，是婦女命運史上的重大變革。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這種分離，只不過是一種計劃，但到勞農共和國，基於新經濟形態的發展；人的勞動力、燃料、生產物的消費、儘可能地節約，使消費形態，達到最經濟的最合理的形態，要到這目的，不得不借助於社會的給養。共和國的經濟狀態愈困難，社會給養的組織，益感必要與緊急。

此外依照由勞農共和國的新住宅條件：有爲家族而設的共同住宅，有專爲單身者而設的普遍的「公共之家」，於私生活，尤其對婦女的生活，有極大的影響。在現世界中，沒有像我們勞農共和國那樣有各種的共同住宅了。一切的人都企望着住公共的住宅。這個公共的住宅，不消說不是像十九世紀傅立葉所倡導而爲某些「理想家」所實行的非實用的、藝術的「共產團」的組織那樣的主義與強制。它有比私有住宅便利的各種經常設備，譬如燃料、電燈等，都有保障，有不少的公共住宅，設有熱水管、蒸溜器、共同廚房，掃除等有專任的掃除婦担任，有些尚有共同的洗濯室，其中也有設置着托兒所幼稚園的，絕不會有荒廢，物價騰貴、燃料不足、水道設備不完全等的憂慮。因此企望住到共同住宅去的人更加多了。志願住共同住宅的候補者，在登記簿上，不絕的在增加。

當然要公共住宅絕對的代替私有住宅，尙需相當的時間，有許多的都市住民，仍滿足着她的私有經濟和以一個家族爲中心的生活。不過以家族爲中心的家

政，已失去了它的準規，這是一個絕大的進步。尤其使陷於經濟困難的會傾向住公共住宅，即使公共住宅的條件不甚適合，但至少它有許多優越性，尤其在生產繁榮時代，公共住宅，比諸浪費婦女勞動的家庭經濟可以勝算等的認識，是很重要的。公共住宅在勞動婦女，真是救命皇菩薩。由於有職業的掃除婦、公共廚房、中央洗濯所、電燈、燃料等的完備，使婦女可以省却不少精力的浪費。一般的勞動婦女，現在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公共住宅的增多，掃除無益而且消耗婦女精力的家事」。當然尚有許多頑固不化的婦女，不肯離開古舊的生活形式，這些只是全生活集中於爐灶的周圍的「妻的專門」型的人物吧了。這些人即使住在公共的住宅，也會爲了她的丈夫，將自己的生活，仍消費在鍋裏灶邊的。可是，未來已不是她們的了，由於集團勞動的精神，這些無益於世的人們，跟着經濟戰線的共產主義的建設而消滅。公共住宅，不但合理地解決了都市的經濟與住宅問題，且創造了減輕勞動婦人在這過渡時代所負的重任——家庭與職

業的勞動。隨着適應各種要求與適應各種趣味的各種公共住宅的增加，很自然而且不可避免地以家族為中心的家政，消滅了。跟着保守家庭的個人主義經濟的消滅，現代布爾喬亞家族的根本上羈絆便脆弱了。家族既不是消費的單位，就不能以現存形式再存在下去了。但是這個斷定，是大抵不能威脅布爾喬亞家族的信奉者們的——到××主義的消費勝利，還很是遙遠的、由資本主義到××主義的過渡時代，勞動者的獨裁時代，社會的消費形態與個人主義的家庭經濟間，尚需要劇烈的鬥爭，要促進前者的勝利，只有依賴與這問題最有利害關係的市民層——勞動婦女正確的認識。

住宅問題，在現在的蘇聯統計中，固然在事實上，仍是很貧乏的，但是比諸戰時，現在公共住宅在我國的都市經濟上，至少在大都市的經濟上，已占着顯明的數字。例如在莫斯科一八二〇年二萬三千幢房屋中，有八千餘幢是公共住宅——包括獨身者及家族用兩種——尤其給家族居住的公共住宅占全房屋中的四〇

%，勞農國家自成立以來，對於產業經濟的組織等根本的變革，雖然很緩慢，但是很快地創造了婦女解放的條件——逃去非生產的家政囚籠。

不過減縮婦女在家庭經濟上的非生產的勞動，只是婦女解放問題的一面，此外使婦女束縛在家庭中，做家庭奴隸的，是子女的教養問題。在這方面，蘇聯極力注意到母性的保障與社會教育，婦女這種重荷也減輕了不少，而將這種重荷，移到社會集團，勞農共和國之手。

蘇維埃共和國，在探求適應勤勞大眾利益的新經濟生活形態的途中，不可避免的犯着不少錯誤，計劃也常不斷地在改革，但教育與母性保護問題的由社會負擔，起初即有了預定的正式方案。因此在現在的生活與世界觀，有了深大的革命。總之在布爾喬亞制度下不得解決的問題，只有在一切的政策是使國民經濟向上，有強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中，才能解決。

蘇聯勞農國的根本任務，是站在發展國家的生產力，復興國家的生產等見

地，來講母性保障問題的。實現這個問題的第一義，是儘可能地將許多勞動力，從非生產的勞動上解放出來；爲了經濟的再生產，要很巧妙地利用現在的勞動力。第二在於使新鮮的勞動力，不斷地產生，即正常地增加人口，是保障勞農共和國所必要的。

因此，母性保護問題，合理地被解決了。我們樹立很新的原則：即繁榮後裔的一切用心，不是個人的或一個家族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國家的問題。母性保護的被保障，這絕不單是婦女自身的問題，而是勤勞制度轉變時，以國民經濟的任務爲出發點，要利用婦女的力於集團，不得不防止對家族的非生產勞力的浪費。同時爲了保障未來勞動者的康健，不得不保護婦女的康健，可是布爾喬亞國家中，要這樣來講母性問題，是不可能的。階級的矛盾，個人經濟與國民經濟的利益缺乏一致，都是妨害它的發展的。與此相反的，勞農國家，因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成，個人主義經濟，漸次在國民經濟中解消了。所以母性問題的這樣解決，實

由於實生活與必要所驅使。勞農共和國，首先將婦女看作有勞動力的人，將母性的職能，不隸屬於家族，而是社會的重要的一員。

賴培華說：「我們常在勞動過程中，將婦女放在眼前，以這種方針，來講母性與幼兒的保護政策」。這話是很對的。

但是要使婦女有參加生產的可能性，使她的本性不致受壓迫，同時也不致破壞做母親的職能；這裏最要緊的，要將做母性的一切煩累，從婦女的肩上除去，移向集團，因此子女的教育工作，有由家族的範圍移向於社會的必要。

「母性」已經在新的觀點上被理解了。蘇維埃的權力，將母性認為社會的任務了。從蘇維埃權力，以這原則為出發點，力求將母性的重荷，從婦女的肩上除去，轉移到國家的各種方法。幼兒的養護，子女的物質的保護，社會教育的正常設備等，均由母性、幼兒保護部和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社會教育課來擔任了。

解決母性問題的原則，雖不能說漸漸地完全實現，而且離開這個目標，還是



很遙遠；把勞動婦女從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生活在新的生活形態中這件事，因為我國經濟的時代落後，與生產力的不足免不了有許多障礙，不過至少，解決母性問題的道路，已經填好了基石，剩下來的問題，只有依照既定方針去做吧了。

勞動共和國，不僅用金錢來保障母性，給做母親的各種補助；且更努力於改革她們的私生活，譬如婦女既為共和國生了幼兒，仍得使她有對幼兒的遺情、照拂、擁抱的餘裕。

蘇聯自從勤勞大眾獨裁以來，即努力將母性保護與社會教育的設備網，引渡到勞動共和國之手，母親與幼兒，是政府特別顧慮的對象。革命的最初，社會保障人民委員部——當時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即以保護母性的權利，把和婦女看作生產勞動單位這兩件事，看做發展勞動共和國政策的重要任務。

一九一八年一月，社會保障人民委員部，即提議母性保護問題，着手組織模

範的「母親的宮殿」，此後由熱心的婦女活動的同志；賴培華的指導，母性保護工作，漸次開展，確實地填下了根基。

蘇聯為援助妊婦與產婦而設的診察所，遍及全國，帝俄時代只有六個地方，現在這些診察所與乳兒院，何止千萬？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解除保育幼兒等非生產的工作——麻煩的襁褓工作，搖籃的牽絆等——使母性對社會的義務，只是生育健康有能的孩子。因此勞動社會，必需將妊婦保護周到。婦女自身，宜注意妊娠時的攝生，她要理解這個時候，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服務於集團，生產着新的勞動單位，共和國的新成員。母性對社會服務的第二義，是拿自己的乳汁，去喂乳兒的問題，用自己的乳汁去養乳兒，這是婦女在勞動國家中的權利，對乳兒也就是盡了對社會的義務。此外對子女以後的種種，都是集團的事了。自然，母性的本能是強的，不能使她退化的。但是爲什麼這本能——愛護幼兒的本能，只能對於自己的小孩？爲什麼不

能把這本能的萌芽再發達一點，使它能愛護到同樣需要保護的自己以外的幼兒？

「不單要做自己兒童的母親，要做一切勞動者與農民的幼兒的母親，」這口號是勞動婦女的新母教。假如有一個女人，對於另一個乳水不足的人的幼弱小孩，因為不是自己同志的子女，所以拒絕授乳，這樣利己的，反社會的行動，在××主義未來的人類裏，是將認為驚奇的，這和野蠻人的只愛自己的子女，而拿異族的子女來充飢是同樣的性質。

此外還有一個不合理的事情，即做母親的，怕帶孩子的煩瑣，因此不願以自己的乳汁去喂幼兒，這種事實是被許可以嗎？不錯，現在的蘇聯，確有不少的棄兒，這是事實。這種情形，正因我國的勞動問題，尚在開始解決而沒有完全解決的緣故。數十萬的勞動婦女，在這個困難的過渡期中，在雙重的重担——勞動與母性——下困苦着，她們都感到託兒所、育嬰室、「母親之家」的不夠，補助金的不足，因此許多女工和職業婦女，不得不和「母性」作戰，不得不將乳兒，

由自己手裏遺棄給國家了。所以棄兒數如此的多，由於我國，還沒有使婦女深切地意識到做母親不是個人的工作，而是社會的義務。

在婦女間活動的人們，對這一問題，有留意的必要：例如在女工、農婦、職業婦女間，必需為她們說明：我們共和國的新事業中，做母親的義務是怎樣。同時努力督促母性保護及社會教育網等事業的發達。只要做母親的，能很輕便地做到勞動與母性的雙重義務，那麼棄兒的數目，自然會慢慢地減少吧。

所謂「母性」，並不是說做母親的不論什麼時候，都得跟着幼兒，也不是說做母親的得埋頭於幼兒的精神的肉體的教養。她對子女的義務，只是使子女能健全地發育與長成。

我們在勤勞大眾的階層裏，可看得見健康的小天使嗎？這些小天使只有在富裕階級間看見，這是什麼緣故？是否富裕家庭的母親，都是親自教育自己的子女的緣故？不，決不如此，富裕階級的母親們，都把教育子女的責任，交給什

麼媒姆、家庭教師、任這雇傭勞動者擺佈。只有生活沒有保障的家庭，做母親的，才擔負着一切母性的重荷。在這種場合，母親因不能兼顧一切，所以子女都被隨處放任，她們（或他們）只有偶然在街頭受到一點教育。布爾喬亞諸國的勤勞大眾，以及貧窮的人們，子女隨着母親，只有自生自滅，沒有被注意到什麼正常的教育。至於進步的有意識的母親，即在布爾喬亞社會裏，也希望將教育小孩的一部分，交給社會：像送進幼稚園、小學、夏季學校等。有意識的母親，理解了對子女不應該有獨占式的母愛，而應由社會來教育子女。

布爾喬亞社會的富裕層，對子女的所謂正常教育，最重要的還是授予布爾喬亞的精神，父母將子女委託給有經驗的媒姆、家庭教師、醫師、少年感化者的手裏。讓這雇傭來的人，代替母親，看護子女的肉體，施予教育。而作母親的，真正的唯一義務——自然的義務，只是生產小孩而已。

勞動共和國所創造的新制度，決不是像布爾喬亞諸國所惡意地宣傳的：什麼

將子女勉強地從母親的手裏奪了；而是努力使一切的母親——不是單爲某些富裕婦女——都能在康健正常的喜樂環境中，養育她的子女。勞動共和國，希望能使一般做母親的——女工、農婦——都可以將小孩放在託兒所、幼稚園、嬰兒室讓她們得安心工作，而不必將子女委諸於乳母。

在蘇聯，小孩自生出至十六歲爲止，由上述的社教機關，在健全的狀態中，受教師的指導與母親的監督（在託兒所中，母親有日值監督的義務）而長成。要製造新社會的成員，這種事業，是必要的。在託兒所、嬰兒室、幼稚園的道德、生活狀態中，扶植着××主義建設中所必要的習性與特質等。被社教機關教育出來的人，比諸於出自孤立的家庭，習慣於利己的幼年生活的，更適於過勞動團中的生活。

革命的初期，由託兒所或兒童宮中所養育出來的小孩，和愛如命寶的母親手中教育出來的小孩，完全不同，前者極富有集團的習慣，富有「團體人」的思

想。在「兒童宮」中常見來自個別家庭的新成員，拒絕共同的操作。於是由整個集團包圍了這新進者，熱心地爲他說明。像什麼我們大家去散步，只有你一個不去，好嗎？我們團體輪到勞動，你獨自不肯掃除，可以嗎？我們這團體大家用功，你一個人攪亂可以嗎？他們之間，沒有個人的感情，因此一個肥胖的四歲小孩，會很認真地說明：「我們這裏，沒有你的或者我的東西，我們這裏有的東西，都是大家的。同時大家都要竭力注意愛護團體的所有物。」——這是小兒生活的根本規則；而且相互間，彼此勉勵勿損傷「我們的」財物——「兒童宮」之財物。

勞動共和國，爲了保護作爲種族再生產的婦女，於革命的初期，卽有「母親之家」的建設，只要是婦女大家深切地需要的地方，卽行建設。「母親之家」不僅安置獨身者，卽使有家庭的婦女，也許可有一時間的居住。例如產前產後的幾個月，爲了避免家庭與家族的煩累，恢復自己的精神；以及爲要深切地注意嬰孩，許可她居住。經過了相當的時日，小孩不一定要母親親自養育，但最初的幾

個月母子間因生理的關係，嬰孩離開母親，是不合理的處置。

要住「母親之家」的，女工不必說，即較上級的職業婦女也都歡喜去住，因為那兒有好的照顧與安全的休息。不必宣傳，誰都會欣然地去住。最不幸與最可悲哀的，乃是蘇聯的缺少積蓄，因此不能為勞動婦女農婦等建立「救護所」於全國各地。到現在為止很遺憾的，對於農民間的母性，僅有些微的幫助：即僅設備了夏季託兒所。但對於農婦中做母親的，確已減輕不少對於幼兒的麻煩，得容易地從事田地上的工作。

為了從事職業的勞動婦女，在各企業及各種機關中，附設託兒所，一里有一里的託兒所，市有市的託兒所。託兒所的減輕勞動婦女的負擔，不是言語所能盡的。我們認為遺憾的是：這種託兒所，還感到不足，還不能滿足做母親的十分之一的要求。

解除母性的累贅的社教機關網，除出託兒所與收容三歲以下的棄兒及孤兒的



兒童宮之外，還有什麼呢？這裏尚有收容三歲起至七歲爲止的幼稚園，到學齡兒童爲止的兒童遊戲場，兒童俱樂部，最後有兒童的「共產之家」和兒童的勞動宮。此外兩親對兒童的重負中的吃的問題，現在也給國家的社教機關來負擔了：即爲小學兒童及未到學齡兒童所設的免費食堂，這種食堂，是根據一九一九年死於革命的樊拉·樊吉娜的意志而創設的。這種方策，在急烈的內戰中，給與我們不少的幫忙，至少使勤勞大眾的子女，不至死亡與飢餓。國家對兒童的照拂，除上述以外，更給兒童免費吃牛乳及給予其他補助食品等，尤其最困難的是給予衣服鞋襪等。

當然這種計劃，還是不能完全地實現的，事實上，現在我們只計劃了極狹小部分的市民的事情。這個主要的缺點，不是不希望解放兩親對子女的重累，而是這個時代，我們的國民經濟沒有整頓，不能依照蘇維埃權力，去實行社會教育事業的全盤計劃。總之勞動共和國所取的解放母性問題的方針，是十二分妥當的。

以上只就個人經驗所及，加以敘述而已。這些計劃，都是生活的革命，使兩性間的相互關係，有了根本的變化。

這裏蘇聯對婦女，也提出了如下的任務，即婦女脫離了非生產的家庭勞動以後，爲了創造新的財富，有爲國家與勞動集團而勞動的義務，國家爲這種重大的事情——勞動與母性的義務——保障婦女的利益與幼兒，使婦女得並行兼顧地盡她的義務。蘇聯自從革命後的第一日起，即努力創造以下的生活條件：即使婦女不致牽着兒子，無路可走，不得已跟隨着沒有愛情的丈夫；被丈夫遺棄的婦女，不致因求助無門，因此而自殺或殺戮子女。我們勞動共和國的援救勞動婦女不是用什麼博愛事業，或什麼卑鄙的慈善事業，而是努力減輕爲社會建設而鬥爭的勞動者農民的戰友——母性之重荷。和男子同樣，參加了國家的經濟復興，同樣地參加過內戰的婦女，她有權向國家要求：在她生活中最有責任的時期——她給予社會新成員的時期——集團應爲她擔負照料未來市民的任務。這是我們對母性保

護問題的政策。不過實際上還是與理想離得很遠的。

母性保護部與社會教育部工作的活動，雖漸次在成長擴大，但是仍舊十二分的不夠的。獨裁政治的過渡時期，舊的完全被破壞了，新的尚未創造的中途，婦女特別感到在苦重的條件下生活着，因此對母性問題的解決，黨與政府不得不加倍的留意。這一問題，得到正當的解決以後，不單是婦女，就是在共和國的生產上，國民經濟上都有利益的。

與母性問題有直接關係的另一問題，尙有來說一說的必要。即蘇聯共和國，對於墮胎的態度。勞動共和國，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公布法律，承認墮胎爲無罪，這法律，由黨部提倡而實施。至於對這問題，爲什麼要抱這樣的態度？蘇聯，不單沒有感到勞動力的過剩，而且正苦感到不足；蘇聯既沒有感到人口過剩，而且正感人口過於稀薄，所以勞動力，我們是感到非常貴重的，那麼爲什麼會認墮胎是無罪呢？勤勞大眾所執行的政策中，決不歡喜含有虛飾與虛偽。墮

胎，與沒有保障的婦女所生的母性問題，有着關聯的現象（這不是布爾喬亞社會的一般墮胎原因，譬如：怕分散遺產，婦女不歡喜育兒的累贅，此外怕因此損傷了容貌，或拋棄了愉快自由的日子等等）。

墮胎，是一般國家都有的現象，而且是很盛行着，任你用怎樣的法律與罰例，都不能禁絕，而祕密地在施行，這種祕密的墮胎，常常使婦女成殘疾，或者永遠為國家貽患，減少了勞動力的分量。假使墮胎能在正常的外科手術下施行，不單沒有毒害，即危險也可減少，手術過後，就可以勞動。而且蘇維埃權力知道，因共和國的母性保護與社教機關的普遍設立；可使婦女深切地意識到生育健康的幼兒，是婦女對社會的義務，那時候，墮胎即可沒有。因此許可了公然的，健全的墮胎。

勞動共和國的問題，在於使母性保護事業廣泛地發展，因此加強了婦女中健全的本能，使她們得適安地做母親同時又為集團而勞動，因此就沒有墮胎

的必要了。勞動共和國，將這種在布爾喬亞國家中的婦女不得解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布爾喬亞國家的婦女，立在世界大戰後的苦重地盤上，在爲了金錢而做着工銀勞動，和做母親的雙重重荷下苦悶着；而勞農的蘇聯，女工與農婦，都幫助着黨，建設着經濟的新基礎。毀滅了將婦女處於奴隸狀態的舊生活。

隨着婦女成爲國民經濟上不可缺的勞動單位，從此尋出了解決這錯綜複雜的關鍵。以家事來補充着資本主義的經濟，以及私有財產鞏固地封鎖着家族形態的布爾喬亞社會中，找不出勞動婦女的血路的。

婦女解放，根本地需要改革生活才能實現，同時也只有生產根本地建築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新基礎上，生活才能改變。

在我們的眼前，生活的革命，很廣泛，也很深切地進行着，同時實際的婦女解放，也在生活中深入了。

參考書

- (一) 克魯普斯加雅的蘇聯的婚姻與家族法
- (二) 柯爾泰的家族與共產社會
- (三) 莉莉娜女士的社會教育
- (四) 齊雪的社會教育問題
- (五) 尼哥拉娃女士的關於社會教育
- (六) 斯獲波羅斯基的食糧問題
- (七) 莉莉娜女士的女工生活中社會營養事業
- (八) 蒲洛尼娜女士的女工及農婦的完全解放諸條件
- (九) 莉莉娜女士的共產家族與共產社會

## 第十三章 道德的革命

勤勞大眾執政時代的所謂生活革命，不待說，不單是社會的給養，公共住宅，社會教育以及母性保護等而已。這革命且更深刻、更複雜、更多角地、差不多包涵了我們生活的全領域；而自然地反映於道德和思想之上。這光輝的時代，牠的運動的全而——對舊的東西的破壞；對新的生活和經濟形態以及人類相互關係的探求；這在將來某一世界的歷史家們，總是會很有興趣地研究牠的。在我們的生活裏面，包藏有多少豐富的未來的嫩芽，此則不必計算牠。在以淚、以血、沖洗過去渣滓的內戰火綫裏面，已經有新鮮的、強壯的、青春的、未來的××主義的嫩芽，伸出頭來，不過我們不會熟睹牠……讓兩個敵對的世界的狂暴的漩渦，所捲起的塵埃，將牠蒙蔽吧；讓活生生的血液，蔭翳了新的奔流的鮮明吧。

……但是，奔流是存在的。牠和春天的小川似地；擊碎岩石一般的冰塊，洗滌大地，受了××主義的陽春蓬勃的強烈愛情的燃燒，而潛流於積雪之下。

試看看周圍，這還是我們經驗過的一九一七年以前的那個俄國嗎？這還是沙皇時代生活着的那些勞工農民或小市民嗎？思想感情、慾望、任務、全是不同的。蘇聯共和國各種狀態，全是不會經驗過的新的東西。看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着的人們，覺得我們簡直是前進了一世紀似的。從這兒可以估計革命落後的國家所起的事變的前途。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我們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事情，還不能和那些被資本主義的障壁隔絕了的同胞們，打成一片。這經驗，使我們遠離過去的東西，而去接近未來的，成爲活生生的東西。透視未來，比透視過去更加容易。我們比較大革命以前，見過更多的東西。我們比較那些沒有體驗革命戰爭時代，沒有體驗熱烈、迅速、巧妙、抄捷徑以向××主義進行的建設期間的同志，知道更多的事物。不管有過幾多的錯誤，我們的革命的經驗，是生活建設的



最勇敢的嘗試，是以幾百萬的集團組織成的意志，使經濟的盲目的力，服從於自己的一種企圖。蘇聯的勞工革命，展開了人類歷史的新鮮的一頁。不管到實現××主義的全姿態，其路程是怎樣困難，怎樣遼遠，却是已開了端緒。勤勞大眾層，已經牢牢地把握了自己的歷史的使命，和在社會建設上的意義，定會指着自己的最後的目的，不屈不撓地進行。這個目的，已經不單是一種幻想，只要向着那一方伸出手來，勤勞大眾的自己的指頭，就可以觸着牠的目的底現實性，而可以感覺目的底實在。……

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前進，第一是反映在勤勞大眾們的和生活的態度上。試看勞動者在革命前，他們是怎樣的？當時的勞動者，不是失却自由的奴隸，便是貧窮困苦，被鞭打而仍順從，再不然，便是雖然憤怒而仍沒有氣力。他們沒有自信。他們以為壓迫他們，使他們卑下的法律和秩序，都是不變的東西。假使誰向他們說：「只要有一百萬的勤勞大眾，想要那麼做，那你們就會是生活的主

人。——那他們定是疑惑地搖他們的頭。

可是現在怎樣？不待說，勤勞大眾的生活，仍然是很苦的，他們仍是穿着粗陋的衣裳，粗陋的鞋子。他們還在忍受無限的困窮，負擔無數的犧牲。可是他們却信賴他們自己和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既學到了偉大的新的真理，那：假如新興階級指導社會的話，人生、法律、生活——一切都要變化。在沙皇時代的廠主和地主的統治下的人，到了勞工支配之下，成了另一個人。他感覺得他是自己的生活的主人。他是生活的創造者，他不一定常常苦心地去創造，他就是創造。使經濟發展的法則，意識的地從屬於集團的意志。在這艱苦的學習中，在這社會的意志對經濟的盲目的力的勝利中，有着勞工人類的偉大的勝利。

再看女工，這兒的進步，更加明顯。最大的特徵是：廣泛的婦女大眾，她們對社會的愛情，對自己與集團之間的連繫的意識，對社會，對勞動共和國的義務觀念，非常發達，這在若干世紀之間，被教導成僅僅知道對家族的義務的婦女，

特別是新鮮的事體。現在女工和勞工的妻子，十分知道她們是有完全的權利的市民。不單如此，假如她們不負擔社會的甚麼義務的時候，她們一定自己辯解，說是小孩們妨礙了經濟，而且指摘我國為小孩的設備太少，「公共之家」的太少等。假如一切都已齊備，她們一定能夠在婦女部或勞工合作社，為黨而工作。

革命不僅是將婦女從封鎖的，窒息的家庭氣氛之中帶出，投入於廣大的社會生活之內，而且是以異常的速力，將集團的連繫的感情，運入她們裏面。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禮拜六工作的成功，就是明顯的證據。女工、黨外的勞動婦女、勞動者的妻子、農婦——這些人們，是禮拜六工作的自動參加者。十六縣裏面，大約有十五萬的勞動婦女，在一九二〇年參加禮拜六工作。那算是：僅僅社會性的成長和集團的努力，方可以征服荒廢、流行病、寒冷、飢餓的自覺的證券。禮拜六工作即是為集團的自動的工作，是所以輔佐義務工作制的。工作已經不僅是必要的東西（奴隸的工作，為貧乏所驅的勞動者的工作），而且是社會共同的義

務。有如古代種族的人員，對於自己種族集團的職務，參加工作一樣。黨外女工隊和我們的婦女代表者們，爲了準時參加禮拜六工作，拋棄了家事，而來搬運燃料，掃除路上的雪片，縫補紅軍的襯衣，分配小孩的衣服，整理病院及兵營的秩序和清潔。他們有許多都有自己的家族自己的經濟。即是說：女工們一星期中一天的休息，是有她們自己應做的家庭事務。可是她們却貢獻自己工作於急於燃眉的社會工作。她們意識到：與其錯過供給國民經濟的機會，不如放棄個人小小的經濟爲有利。

於是婦女爲了參加禮拜六工作，而放棄了自己家庭的事務。

或者有人說：這種黨外的女工和農婦。不只是極少數嗎？不錯！她們還是少數。可是她們的數目，明明地是一天天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而且不單是女黨員，連黨外的婦女也同樣地行動，那牠的本身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少數婦女的行動，終於教育廣汎大衆以同樣的精神。以前那些不願意參加社會工作的婦女，很

熱心地，有時甚至很生氣地，主張她有權利輕蔑社會工作，她討厭做「被選舉者」。她一定要對你多方的解釋：她的不做「代表」的精神權利。但是現在，在都市上，簡單地否認這問題的女工已經很少，這些年月之間，個人的意識上，對於社會經濟的恢復狀況，社會的義務，充足個人的要求的餘暇等等的連繫，已經增高到了這一程度。可是在經濟封鎖的時代，情形怎樣呢？燃料快完了，而堆滿了薪炭的車，放在那兒沒人搬動。於是大家叫起來：「爲甚麼不搜集人民參加禮拜六工作？」流行病發生了，又同樣地叫起來：「叫大家參加禮拜六工作，把街道大掃除！」換句話說：就是要求自動地貢獻勞力，從事於以共同的力量，撲滅經濟力的障礙，戰勝共同的災害——流行病。所以在當時，對於那些不願以自身的勞力，貢獻於社會的利益的工人，是加以非難。於是新的精神上的法典和道德的基礎，得以築成。對於逃避工作的新的概念，得以出現。資本主義社會，是非難懶惰者和工作怠慢者的，可是資本主義的概念，勞動是屬於私事的。想工

作的，就去工作，不想工作的，就去餓死，或是叫他人代替自己工作。特別是後一種的企業家的風度，特別被尊重，特別值得尊重。假如資本主義社會要非難怠惰者，那一定不是非難爲自己工作的人，而是非難爲他人工作的人。假使這種時候，誰沒有使盡自己的全部勞力，就是欺騙主人，使主人的利益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觀。所以資本主義的社會，懶惰和怠慢，安置了「惡德」的烙印。但是爲了地位或勳章的關係，而得到了職務的實業家的兒子或貴族少爺，他們雖是極露骨的無爲無能者，然而他們並不因不工作而受非難。因爲人們勤勞或不勤勞，是他的私事。——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見解。農民或私有者，縱使懶惰怠慢，放棄了他自己的經營，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決不以爲他們是害了社會經濟，而予以非難。僅僅，因爲他們不熱中於自己的利益，而輕蔑他們的愚昧。

資本主義社會，和勞工共和國，對於工作的態度，是這樣不同，由是而以另一種精神，教育工作的人民，使之有另一種想法，另一種感覺，而產生新的道

德。

由我們對於工作的態度，而生出對於各種現象的新的關係，產生新的道德的規矩，——即決定人們對於集團的關係的規則。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主要的只規定人類相互間的關係的標準，而對於社會的關係，只不過具有道德的一般法則（各種規則的總和）。它所規定人類對於社會的義務法則，比較約制人類個人間的關係的法則，少得多。該當於前者的，僅有：擁護祖國，忠於沙皇和祖國，和極有條件的「勿受辱」。該當於後者的，則羅列了很長很長的戒律，以擁護私有財產和個人的利益。譬如：勿偷盜、勿怠惰、勿奪法律所決定了的他人的妻子，勿在買賣契約之際作弊，須要節儉，等等。

而在勤勞大眾獨裁之下，道德律是從集團的利益為依據。假使你的行為無害於集團，道德不會拘束誰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認為名譽的東西，在勞工共和國裏反而會受非難。例如資本主義社會，對商人是取的甚麼態度？假若他的賬簿是

沒有毛病，他不曾詭詐地請求破產，這種商人，不但不坐牢，而且會受尊敬。稱爲「第一流商人」或歷代可尊敬的市民。

那末革命的初期（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我們的對「投機者」取怎樣的態度呢？我們認爲不爲共和國勞動，只熱中於個人的利益，而營種種狡滑的事業的，我們都叫它「投機者」，這種非勞動份子，不但受不到我們的尊敬，而且常將他們拘捕到非常委員會去。因爲在這一時代裏，一切的成人市民，都不得不專心於生產勞動，來拯救被破壞的民國經濟，並保障全勞農國民，至少不至飢餓與缺乏。那些不創造新價值與生產物，不勞而生活的人們，不適應生活與生產組織，一味投機取巧而自肥的人們，是有害於共和國的利益，使國民窮困與荒廢，總之他是有害於集團的。因此投機者被誹議爲無益的存在或全社會的巨蠹，不是沒有理由的。到現在，我們對於那些「非勞動份子」如在聯邦中的貴族、地主、僧侶、貨幣的投機者等，都認爲有害而不必要的。



從變化的生活條件上，新的良心，新的社會生活規則（道德）長成了，當然要將人類完全改造成爲嶄新的，那是即使十年或數年以後，也是不可能的。不過，雖然不可能要一切的人類，都是××主義者，但既成現象擺在我們眼前，心理上——即我們的思維，已經很快地適應了新的條件，不是新的人——同志間，已經早有了共同生活的規則嗎？這是不可思議的。

革命在兩性關係方面，最顯著；世界大戰，不單是俄國，即其他交戰國的布爾喬亞家族的堅壘，都起了動搖；第一因婦女勞動的增大，婦女經濟獨立。第二結婚以外的分娩，加增得非常大，布爾喬亞道德的一切規範，都很快地毀滅了，愛好的兩性，都無視了布爾喬亞的偏見，教會的戒律，而同居了。布爾喬亞政府認爲非正式的結婚，或兵士的妻子，現在公然在法律上被認爲與妻子同樣享有財產權了。這真是特有的現象。蘇聯共和國，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即廢止了教會的結婚，法定的夫婦之子，和私生子的區別，完全打破了（一九二一年十二

月十八、十九的法律），且婦女因義務勞動制的關係，被確認為國民經濟前的一個勞動單位，教會的結婚，或單純的登記結婚，已失去了自然與原來的意義。因為布爾喬亞社會的結婚，只是男女相互間訂立了一種契約，爲了使這契約不可侵犯，更需要神或證人來做保證。男子拿自己的錢來娶妻子，有扶養妻子的義務，但同時，妻子應爲他儉約財產，爲他服役（她自己以及家人幫着整理家政），爲他生財，爲他的財產繼承者服役；爲了不至使丈夫擔負私生子（與別的男子生的）的責任，所以要完全負責操的責任。妻的通姦，是破壞私有財產經濟的均衡的，所以布爾喬亞社會的法律上，規定丈夫的處理妻子，非常殘酷的理由，在此就可以明白了。丈夫對妻子的背叛，在布爾喬亞社會，認爲非常隨便，原因由於他的這種反叛行爲，是不破壞私有家族經濟的。布爾喬亞社會爲什麼這樣迫害法定以外結婚的母親呢？假使沒有被登記的愛的結合（沒有正式結婚的），他的小孩，誰來扶養呢？這幼兒既不能承受父親的私有財產的恩惠，那末就得交給「犯

罪己的女人的雙親，或交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國家機關來收容。總之，在不歡喜負擔社會保障的布爾喬亞制度下，一切都是不歡喜的現象。

十九世紀的後半，婦女開始靠工銀勞動來養活自己以來，對沒有正式結婚做母親者的態度，在布爾喬亞世界，也漸起了變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頭，有許多小說家、思想家、都以此為題材來寫文章了。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勞農共和國，將個別的家政改變為集團的消費（公共之家，共同食堂等），一切的婦女，和男子同樣爲了集團參加勞動（義務勞動），妻子和丈夫同樣得到自己的給養；結婚、家族等問題，以新的形態出現了。婦女不單和丈夫有同樣的獨立給養，而且母親的勞動賬簿中寫有子女的名分，她可替子女受到國家的給養，不必再勞父親的名分。至於妻子在家庭中服從丈夫的事情，不單失其效力，而且事實上根本絕緣了。

在這個時代，特別在都市裏，假使準備爲自己的家，或自己的經濟而從事經

濟打算的結婚，已很困難了；男子既不能爲自己而獲得沒有代價的勞動力的妻子，女子亦不能得到法律規定扶養她的丈夫。自然以「經濟的打算」爲出發點的結婚場合，並不完全沒有，但要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結婚和家庭那樣受到保障，至少已沒有那種對手方了。丈夫一日的勞動不能再扶養他的妻子，因爲衣、食、住、燃料等，平均分配後，再要養一個人，實在是問題。而且妻已不能爲丈夫而「無償勞動」，這原因，第一：她既不能以全部的時間獻給丈夫，同時正在從事家庭以外的生產勞動（義務勞動制）。第二，假使他和她妻子平分一份給養，那末結婚，至少是與他沒有什麼利益了。因此不是誰靠誰，而是各自憑藉了自己證書，直接向自己勞動的機關，領取給養。所以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利害打算，只有相互地因共鳴，戀愛，走入結婚生活。

當然，在那荒廢與國庫儲品不足的狀態下，勞農共和國，對勞動者，常不能依秩序來分配一切；因此住民常爲了自給自足營他的家庭經濟，向自由市場購得

煤油或其他燃料等。所以那時的結婚，有時也含有經濟上打算的性質；例如：一個女人和某一個男子同居，並不是尊敬他或愛他，而是爲了他有一間「蘇維埃之家」的房子，男子也有爲可領得兩份燃料的證書借此可快樂地過冬，所以和這個女人同住，不過這些事實，總不免是變態的特例吧了。在這時代，一般的傾向，契約的登記結婚，已漸少了，即登記，已不能因此而得到什麼特權。不錯！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的婚姻法，規定沒有勞動能力的，「配偶者不得不互相扶助」。這是因爲當時社會保障機關的網，沒有十分發展，在勞農國家的經濟生活的保障事業沒有廣泛地發展以前，沒有勞動能力的，不能靠集團成國家，則不得不靠個人，這種只是過渡時代的一種方策。這一法令，在戰時很少實行，因所謂扶養沒有勞動能力的配偶，即需將自己的一部分給養分一半給配偶，但同意而這樣做的，究竟只有少數；一般的大半取如下的解決方法：假使配偶者中的一個是不能勞動的話，她的配偶，就爲她奔波設法，送入社會給養的療養所、病

院、廢老院等機關。健康的配偶，不能勞動時，就歸社會扶養（這不限於特殊的人，即是互相愛着的，也如此做）。當時誰也不能來非難的（雖則法律規定，不能勞動的應由配偶者相互扶助），社會認為負擔照料沒有勞動能力的成員，是當然的事情。總之物質打算的責任，需要集團或社會來負擔的。人，只要能夠勞動，她有以自己的勞動力來創造社會的繁榮、貯藏、資源的義務，但到了年紀老了，殘廢了，社會給予他（或她）的援助不是當然的責任嗎？

結婚在新的形態中，夫婦關係，起了極大的變革。特別有趣味的是：新的私生活，新的道德，反映到了原來的布爾喬亞家庭。本來過着寄生生活的布爾喬亞夫人們，現在也會像洪水似地湧進蘇維埃機關開始勞動。因此對丈夫也提出了獨立的論調。常常妻子反比丈夫會做，在這種場合，常常本來低首下心的妻子，現在反做了家族的頭兒。有時爲了妻子的急於要出外工作，丈夫反在家劈柴煮物，赴市場買東西等等。過去有些家庭婦女，爲了丈夫沒有給她買春季的流行帽，或

新的靴子的錢，因此而陷入歇斯的里病。現在妻子早已不必向丈夫要求什麼，而轉向給養所的職員要求支付證或追加給養了。

平心靜氣地說，過去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婦女，現在有時却非常勇敢，——比她知識的分子萎縮的丈夫勇敢，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肩荷了家政及勞作的一切重担，與窮乏及無秩序的生活作戰。至於她們的家族，也竭力把家政簡單化：漸傾向於就食於公共食堂，或將子女送入「兒童宮」。爲了迫於「必要」，在在免除種種家庭的煩瑣。隨着個人經濟轉化爲國民經濟，新道德習慣，有了根底，布爾喬亞社會的所謂家族，完全死滅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家族——不是肉親的，而是勞動有共通性，利益單一，欲求與任務，將人與人團結得鐵般堅實。精神統一共同勞動的兄弟集團。

新的生產條件，經濟上新的組織，產生了新的生活，被改造後生活着的新人，她的靈魂與意志，創造出真實的××主義。

結婚既不是建築於物質的打算，因此也失去它的堅定性，所以現在的配偶者，比從前更容易離婚了。假使沒有了戀愛，已沒有勉強維持家庭的必要。她（他）們已沒有從前那樣的共同的家庭，以及對子女的義務。教會的結婚早已打破了，自然這現象當然還不能一般的普及，要全般革除，還是很遼遠的事情。但是隨着我們的新生活形態普及一般，這些鄙習也會逐漸沒有它的成長餘地。我們勞動共和國已實行了「結婚與廚房分離」，掃盡了從結婚生活產生的一切的盤算打擊的臭氣。現在常常在很自由的方式下結着婚，他們不是僅為自己的巢穴（家庭）而急急營營。以前的人，要結婚，就首先要考量着：一有妻子，自己的經濟能許可嗎？這一件事情，與他本人有怎樣的利益？做父母的盤算着：女兒的出嫁，她丈夫給她如何的保障？夫婦兩人一結合首先盡了「力與財政」來經營「家庭」，收入一豐富，既有了妻子，又想要住宅了。比較貧困的人，至少也要為自己買點「白開水」。總之，家庭的開始，就是經濟的開始。夫婦務必同居。自



然也有因風波而別居的，那是例外，不是正常的現象。

現在，兩個彼此愛好的人，常常各自分居，雖然常常也有因要維持久長的愛好（人們在結合的起初，總是但願久長的）去登記所，受蘇聯婚姻法的保證。但常常是妻在這一方，夫在那一邊，例如妻子在莫斯科，丈夫在泰休開脫。碰到工作的餘暇，才得相逢。因為兩者都得工作，為社會盡義務，是先決問題。這種結婚生活，在黨員中常常看到。從前，特別是婦女，覺得沒有廚房，就無所事事地一味奔命於「私人經濟」，現在却與之相反了。男子也會為自己的住宅而準備，常常妻坐在旁邊，他自己弄炊食。在婦女中，特別是從事於共和國建設的進步的勞動婦女，她們已從關心「自己住宅」等事，轉成「不願担任家庭的煩瑣工作，寧願分居。現在我是可為共和國而工作了。一有家庭的煩瑣工作，我將怎樣？這是束縛我的，所以不歡喜，分居為上。」在這種場合，做丈夫的，也不得不忍耐着自守巢穴！

自然，不能說都是妥協，有時丈夫因見妻子黨務忙於家事，大爲憤慨，燒毀黨婦女部的書物等，不是沒有的，不過至多是一次二次吧了。

這種發展過程中所生的現象，以及發展的結果，有注意的必要。勞動共和國中，究竟將家族關係加以鞏固還是捨棄？有承認的必要。此外假如看準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向，必定可以明瞭：以前的布爾喬亞家族，漸被勞動集團解消了。

另一個特徵：勞動社會與法律，對於非正式結婚的母性的觀點，有了變化：現在一個男子和女子結合，已不會有因這女子過去與另一男子的有過戀愛關係，而加以拒絕的事了。女兒的什麼「白玉無垢」、「貞操」、「處女」等建築在私有財產上的生活組織，已經是不必要了。布爾喬亞社會，對幼兒的「合法性」視爲重要的理由有二：第一，法律上誰是盡養育幼兒的責任的（布爾喬亞社會，對後裔的扶養義務，不認爲是社會所有的），第二，持有私有財產的，爲了企望保障遺產讓給「血族繼承人」，承認了私生子的權利，有分散積蓄着的財富之危

險。因此布爾喬亞社會，始終是在法律上反對私生子與正出子享同等的權利。直到世界大戰以後，有些地方才在讓步。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起，私有財產，完全廢止，雙親已沒有什麼遺產傳給子孫。國家則對幼兒的產生，很重視，他是出諸於怎樣的結婚的父母，他的父母是否結婚已登記，都不成問題。因為蘇聯對母子都有了保障（雖然有時不一定能實行，但至少已在法律上規定了），在這種場合，他可不必關心幼兒是以怎樣的條件生出世來，是不是經過結婚形式，以及父親的承認與否這些問題。私生子或結婚以外的母親等的稱呼，當時都當作奇怪的；這裏只知道是：「勞動共和國的母親」，「勞動共和國的子女」。

當時雖然仍有不時遇到過去的遺跡，例如調查書中，尚規定着什麼「既婚者抑處女」的愚蠢質問，向民警署要求發給結婚證書等。這些事實，都是過去的偏見使他們如此。且借此也可以說明了勞動人類，要脫離布爾喬亞的偏見的泥滓，

是多麼困難。然而在這一時代見到的一個大進步：因為沒有結婚而做了母親，畏懼一切而自殺的事情，已消滅了，私生子的母親，殺戮嬰兒的慘劇，已經沒有了。這是值得記憶的重大事情。現在發現了另一現象，即父親不要支付子女的養育費，而將子女殺戮等事情。當然，這些與其說是時代的特徵，不如說是：「一個奇談」比較來得妥當。結婚的，當時只有有病的，才加以限制。結婚關係的調整等，當時不屬於司法人民委員部，而歸保健人民委員部討論。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在任何條件下，母性沒有犯罪的餘地，由於家族制度已崩潰，對結婚的形式，更加無視了。做「母性」，已是被認為女性對社會的義務，對國家的本質的義務了。

跟着革命後家族婚姻關係的變化，對於賣淫的態度，也起了變化。戰時，「賣淫」雖已不像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狀態，但至少還不能全然消滅——不久亦即行消滅了。賣淫，是婦女被男性經濟束縛的結果，是婦女缺乏不能

以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的結果。婦女的生存，仍舊屬於法律上的夫，或者同棲者的時候，婦女的勞動，仍舊不能和男子同條件的時候，不問她是取公然的職業賣淫形式，或爲了保障自己的給養，與沒有愛的丈夫作「法律上的結婚」——隱然等於賣身——形式，不論那一種，都有賣淫的性質存在。

隨着義務勞動制的實施，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婦女必需做家庭以外的一定的生產勞動，因此職業的賣淫，很快地消失了它的形跡。

人們的直接勞動——筋肉的或者精神的，對生活上必要的給養，都有了保障，婦女早已不是男子的殘餘，男子自身，也沒有這種殘餘物的存在了。同時一切的婦女，都從事於工作，使她們有自食其力之可能。

蘇維埃權力，自從義務勞動制實施以來，對於賣淫婦的見解，別開了一個新面，我們所說的賣笑婦，不是因賣了淫才叫她賣笑婦，而因爲她是沒有爲全集團的幸福，參加生產勞動的不工作的人。雖然這種不勞動份子，我們改叫她「賣笑

婦」，但這絕不像布爾喬亞國家那樣，將她當作卑鄙的下流東西。

在勞動共和國，不管這女子將自己賣給一個男子，或者是職業的賣笑；或者自己不參加有意義的勞動，終身靠丈夫給養作所謂法律上的妻。總之只要她不從事義務勞動，或爲了家庭有孩子，不担任工作而逃避勞動的一切婦女，都當她「賣笑婦」，被強制她義務勞動。蘇維埃權力，對賣笑婦和依夫爲生的法律上的漂亮的妻——不問她的丈夫是誰，即使是人民委員——沒有什麼差別。

許多逃避勞動的，都有一個類似點。即在勞動集團上說，一個女子雖不出賣她自己的肉體，但只要她是不爲集團作有益的勞動，判她爲賣笑婦。這是爲集團利益而命名的新賣笑婦。

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職業的賣笑婦，已非常少了。在莫斯科、彼得格拉等大中心地，職業的賣笑婦，已不如從前那樣是幾萬人，而只是幾百人的少數了；這是一個進步。但在這時代，說賣笑婦已完全消滅，那還是不能那樣樂觀。要求

買銀勞動的婦女，還不能十分有保障，感到生活經濟的不滿，在暗中依賴丈夫的，不仍是賣淫嗎？女事務員，爲了想發跡，爲了想有好地位，投身於沒有愛的男子時，這不也是賣淫嗎？爲了要漂亮的鞋子、砂糖、麥粉、與男子發生關係，這也是賣淫！爲了要有一間房子而嫁，這不是賣淫？爲了要佔火車的一席之地，與車掌相親，爲了子女的要得到麵粉，投身於穀物的守衛隊長等不是賣淫嗎？

總之，她們取的方式，雖各有不同，但同樣地在婦女是苦重、屈辱、悲痛，在勞動共和國，則是有害的賣淫。她使國民健康低下（傳播花柳病），毀破社會感情。不過至少，這些形式，比諸於職業賣淫，已進了一步，這是不能否認的。從前將自己的愛情爲商品而生活的婦女，被認爲卑鄙的社會的一員，被認爲侮辱的對象。男子買了職業賣笑婦的愛情，以爲有了任意地玩弄女性的權利。賣笑婦不能鳴不平，不能提抗議，金漆招牌，許可一切，沒有了這招牌，被認爲沒有登記，就得遭警察的毒手，可是不能向買方作半句怨言。如今，關係完全不同

了，女子自己身邊有了工作證，或已在工場工作的場合，她不是買賣的對象了。即使在經濟上打算，但至少她是會選取適於她的趣味的對手了。布爾喬亞結婚的成立，十九以金錢爲契機，因此「盤算」是第一要義。但男子一味任意對這些女人——職業賣笑婦，或普通的姑娘，但可以不許他玩弄，她可以比法律上的妻更遺棄得乾脆。

隨着婦女失業者的增大，又不得不歸復到痛苦的賣笑生涯。在婦女勞動缺少保障，婦女依然取的是低廉的工銀，勞動只限於一小部分的時候；賣淫——不問她是公然的職業賣淫，或者暗中作爲副業，或者法律上是有扶養者的妻——總繼續存在的吧。被扶養着的法律上的妻子，終日修飾，逃避一切勞動，託人管理小孩，家事及一切均任傭人代勞，這種女人的典型，只是多種多樣中的一種而已。這種婦女——法律妻、木偶人——是勞動社會中最無益，不能讓她存在的。由賣淫而有關係的各種問題，都是重大的題目，這裏且在他日作專門的檢討，現在仍



將話頭轉到生活改革的問題。

十月革命起初，關於生活道德變革的調查資料，是些什麼呢？這調查資料中，第一寫着：婦女在社會的地位，家族的相互關係，結婚生活上她所有的權利，生產中她的職務等，完全決定於她的參加爲國民財富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組織。「勞動」，是婦女地位的尺度。資本主義下的工銀勞動，個人的家庭制度支配之下，婦女完全被束縛着；只有在一切社會主義的生產，消費組織發達中，爲集團社會而勞動，才能真正解放。第二：生產與生活的新樣式的建設，經驗了家族有了深刻的進化。家族的結合薄弱了，結婚只是一時的現象（不是宗教的神聖不可侵犯了），母性，已是社會的職能了。

非常急速地預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指標，在革命初期，已有了偉大的成功，這給予解決兩性關係一個強有力的刺激。一切的現象，不僅在我國留了很深的痕跡，且影響到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活的勤勞大眾，對婦女問題及家族結婚等問

題，有了怎樣解決的藍本。世界勤勞大衆！爲了未來××主義的建設，可研究我們的成果，特別是考察；急速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工作時代所起之變化，最爲重要。對獲得全權的勤勞大衆的新生活形態的建設經驗，記錄、查考，都有利用的必要。

參考書

- (一) 克魯普斯加雅女士的戰爭與出產
- (二) 綏瑪西珂的關於再緊急問題
- (三) 女工工會中央委員會報的關於墮胎賣淫與鬥爭的綱領
- (四) 柯崙泰的關於結婚關係中的××主義的道德綱領
- (五) 柯崙泰的家族與××主義
- (六) 柯崙泰的賣淫和它的撲滅策
- (七) 拉伐依齊的在彼得格拉的賣淫撲滅

## 第十四章 婦女問題的展望

勞動共和國的一切人民，無分男女，都引入了社會的勞動以後不久，婦女解放的過程，預定是很快的。特別顯現在動勞大眾的都市住民以及工業地帶。生活與道德的革命，對農村，沒有什麼影響。農民社會，生活在家族的私有財產基礎上，經濟是安定的，農婦在原則上，只是丈夫的經濟補助者，雖然她做了比工業化的勞動更重要的工作，但她的狀態依然沒有變化。雖然這樣，在農村中也承認婦女有獨立與平權，因此在一定限度內，起了些許變化。蘇聯共和國，農婦比農夫多八百萬人，這裏必然的獨身農，是經濟單位的代表者了。她們大多都是死於內戰戰場上的戰士的寡婦，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兵士的寡婦，赤衛軍及勞動者的妻或母。爲了農婦亦被課予義務勞動搬運或其他義務，所以郡村等對於這些獨身農

婦的意見，不能渺視。種籽的分配，食糧、食糧稅等的要求，農婦都要求參加。內戰爲農婦們劃了一條深刻的界線；將她們從「忍從」的囚牢拯救了出來。農婦，特別是烏克蘭、頓河、西班牙等地方的農婦，都各人依各人的認識，擁護着黑或白，積極地參加着內戰。法國大革命時代，凡台哀與蒲利他尼兩地的農婦是反革命運動的中心。同樣，在蘇聯共和國，各種烏克蘭的「團長」，都受着無自覺的農婦的支援。不過這僅是革命初期的傾向。自一九一八年末以來，很顯著地農婦已轉向於蘇維埃了。自從蘇維埃權力，實際地表示援助婦女解放以來；自從黨部不問如何荒僻的村鎮，都由各郡縣召集代表大會，女工農婦會教育勞動婦女如何才能減輕生活重担以來，獲得了廣泛的農婦羣的同情，很明顯地轉變到傾向於我們了。其次：對年輕農婦被吸引到都市，使她得受教育，在勞動者豫備學校、黨校及各種蘇維埃學校中，農婦入校數，驟然增加。因此農婦們不單開始研究自己的命運，同時將解放事業和革命事業聯成一線來考量了。廣泛的農婦大眾，不

僅是意識的發達，即實際地在蘇維埃教育、社會保障，社會教育各科、工場、製作所的經濟問題委員會，工會等機關中工作的婦女數，也大大地增加了。即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婦女數也不絕地在增加。革命的起初，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只有女工，現在，却是農婦數超過了女工與女公務員了。

農婦在各地的蘇維埃機關，占着非常重要的職位，在聯合工會、農事改良事業，勞動監督部，國民教育各方面，都有婦女認真地在活躍着。

我們的主義所開拓到的地方，對黨的熱心，農婦勝於農夫。農夫原來是私有財產的所有者，他對原來的經濟組織——家族中（妻亦在內）一族均服從於家長的權力——是很愛着的。何況革新的私生活，對農夫的地位很少有向上的把握。反之，對農婦，因農業集體化，牛乳及其各種合同工會，農業工會等的發達，同時××主義的精神的生活改革（託兒所，中央麵包廠，洗濯所），給予了不少恩惠。這種原則下，直接實踐地，將她們的生活，工作都減輕。因此農婦比農夫，

更容易抓住主義的本質，成了黨的熱烈的支持者。婦女在農村裏往往是黨的支柱，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農村間，到現在，尚有一種動搖着鞏固的家族主義的根基的現象：即革命以前，農夫的家族，沒有議論離婚問題的餘地的。丈夫拋棄妻子的事情常有，農婦離異丈夫，是絕無僅有的事，即有，也是農村的驚奇資料，誹謗的「矢的」吧了。現在，隨着離婚的容易，夫婦的離婚，在農村中，尤其是年青人中間，已是很平凡的現象了。

農婦離異丈夫的事實，已不致引起隣人的憤慨驚異了。農婦作為獨立的活動者，作為蘇維埃代表；多數為州、村、郡、負擔了社會的有益工作，因此對婦女的評價：如「不能平等」的見解，自然地消滅了。農村中婦女私生活的解放也更加容易了。這過程，隨着蘇維埃聯邦農業機械勞動化（農業電化計劃），農村中的合作事業的鞏固，更將強固。那時，在我們的農村裏，由於生活，道德的革

命，和婦女的完全解放，必然地會創造更強固的各種條件。

固然，因中農經濟尙很鞏固地有它的根基，生活也安定，不可避免地，小布爾喬亞的生活秩序，仍會抬頭，這是事實。同時婦女解放及創造，根據××主義原理的結婚形式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滯緩了。

因此，現在對建築在超歷史記錄的新生活形態的誕生，有將這種現象來刻印的必要，這種現象，——表明了××主義的建設，不單在經濟分野上，有了表現，即在生活、道德上，也有了顯著的反映。學習這一時代給予的經驗，研究新生活所鑄出的樣式，指出在風俗習慣中，表現新主義的特徵等，是最有益的。這些工作，將由蘇聯的勞動者女工等着手的事業，使它展開；由我們經驗中的教訓，必有助於世界的勤勞大眾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勞動婦女的解放，已不是形式的，已經是擺在實踐的基礎之上了。不僅如此，蘇維埃權力，已認爲作「母性」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社會的職能，所以國家對懷抱幼兒的母親的利益，有

支持保護的必要。這是世界的創舉。蘇維埃權力，宣揚將教育成爲集團事業，因此確立學校組織基礎於社會負擔的教育制度，蘇維埃權力，不因婦女性的頹廢而處罰，只有逃避勞動的，判她爲賣笑婦。蘇維埃權力，以義務勞動制爲基礎，確立了一個概念，即認爲婦女和男子同樣是活的勞動單位。勞動共和國，已經創造了各種條件，開始消滅了古舊的家族形態，建築了自由的、有伸縮性的兩性結婚形態。

偉大的蘇聯革命，是婦女的解放者，但是我們不可忘記女工是和工農同樣地手創蘇聯革命事業的。

女工和農婦，不僅奠定了蘇聯革命的基礎，即在艱難緊張的內戰時代也活潑地參加了革命。

這問題已是十分明顯，一切女工運動史，是和黨的運動相結合着的。在這裏，還有一件事，要特別指出：乃是從獨裁的那天起，沒有一個蘇維埃建設的領



域中，沒有女工和農婦積極地在參加。有不少婦女的名字，她的勇敢和活潑與促使各種蘇維埃機關的發展史相結合。從開始組織蘇維埃起以及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時期，積極參加蘇維埃建設的婦女們，都當選為執行委員，蘇維埃政府是世界上允許婦女加入，並作人民委員的最初的一個政府（柯崙泰是最初召集的人民委員會議中的國家監督人民委員），在烏克蘭，同志莫伊洛也就了同樣的職務。在各州，許多婦女作為執行委員而成為蘇維埃建設的重要份子。即使在現今，大多數的女黨員也都成了人民委員部的參與委員。自然她們也有成為蘇維埃各課主任而努力服務着的。在她們之間沒有一個不是曾經直接站在工作之前，或者手握着鋤頭操勞的女工和農婦（同志格利莫娃尼古拉歐娃契而怒伊休加爾伊期那伊克歷厄斯脫哇），嶄新的蘇維埃制度，急速地鍛鍊了這許多女工們。這也只有冒着革命鬥爭的熱心的××主義槌子，才能完美地獲得這樣的結果。

假使沒有女工和農婦們活潑的共鳴和活躍地參加，蘇維埃權力要是在沒有羣

固的三年中間，實行由勤勞大眾用突擊的精神所預定的計劃，一定不能完成其十分之一吧。假使由革命所促醒的女工，不去應時地援助勞動者，則在生活困難和崩壞的基礎上，要想建設蘇維埃機構，而且運用這機構，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未來的歷史家將指出俄國革命的這一個特徵吧！即在這次革命中間，女工和農婦已經不像法國大革命時代那樣僅僅只表演補助的作用，她們是做了更積極更活潑的工作，所謂女工和農婦成爲革命的支柱，決非偶然而而是必然的。這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召集的第一次全蘇女工農婦大會中，很明白的證明着：這次大會到九月才計劃起來，由十個乃至十五個同志組成指導團，做籌備工作，因在百忙中完成，既沒有完整的機構，也沒有參考資料，然而只要向婦女勞動大眾叫出：

「從這個國家的一切角落裏，甚至從荒野的未開墾的地內，努力選出一一四七人來參加大會啊！」這幾句話，就很夠了。正惟是這個大會，才是指明了：革命，將悠久地桎梏得無聲氣的婦女們動搖了。我們爲要體會婦女在革命中所盡的任務

的意義，必須要把我國革命運動的各個現象細心吟味。女工的參加共和國的防衛，尤其是可驚的事業。革命事業的這種領野，已是超越了過去一般婦女的生活的範圍，去過認為婦女在這方面是最不適當最不中用的。

用女工們的階級本能，使她們努力來支持突進的赤色戰綫，是有很大的力量的。我們已經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婦女的參加鬥爭；她們處理行軍中的炊事，組織衛生隊，負擔通信事務。把婦女的力量用在防衛工作方面去，是蘇維埃共和國對於勞動婦女所採取的新態度。

男子是天性要負起防衛國家和祖國的責任，女子則是家庭廚房的管理人，而且必需如此——這是布爾喬亞所經常根據的理論。他們認為軍事乃是男子的工作；婦女加入軍隊，在布爾喬亞社會，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她們認為婦女採取了這樣的行動，也許要打破鞏固的家族，這種鞏固的家族，對於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國家，却是必要的原則。爲了軍隊的必要和軍隊的支持而利用女工和農婦這一件

事，在勞動共和國是完全採取不同的態度。

在我們所體驗到的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勞農共和國全體人員的任務，是和勞動義務、防衛勞動共和國的義務密切地聯繫着的，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生產組織和國民經濟體制上所發生的大變更，以根本的形態反映出了婦女命運，反映出她們在整個國家所起的作用。成年市民的整個的能力，常被鄭重考慮，如何可以更合理地應用，可使國家生產力更能發達。於是婦女也被計算在內了。爲了勞動階級的利益，經濟的根本體制極廣泛地展開，於是要求婦女加入經濟體系；同時要避免布爾喬亞支配的階級自衛，也使女工和農婦有參加軍隊和艦隊的必要。女工和農婦的參加軍事工作，不是像帝國主義時代布爾喬亞政府所做的那樣，只當作一種暫時的策略，而作爲決定階級的生死問題。許多勞動人口愈益加入軍隊的戰鬥任務，勞農軍隊防衛工作也就因此而愈能成功。

赤衛軍必須有女工和農婦的積極參加，爲了保障戰綫的勝利，不得利用婦

女的力量。婦女們爲了獲得完全的解放，爲了鞏固自己在十月革命時代所爭得的權利，她們自身也必須保持着這種戰綫的勝利。所以女工和農婦的參加軍隊工作，不單可以從她們歷次參戰的觀點來加以評價，即從她們參加了軍事以後所生的變更，亦可加以評價。假使十月革命，是建築在打破過去的「兩性不平等」上的話，那麼婦女積極地參加了我們的二條重要戰綫——勞動軍和赤衛軍——而忍耐着目前的不平等，直到最後，連偏見也因此而被粉碎了。婦女的被吸入軍隊，在於被確定了認爲婦女是具有同等的權利和價值，是勞動共和國的一份子。將婦女當作男子的附屬物的概念，早已脫離了歷史的分野，和私有財產制，布爾喬亞支配同樣，已經和被廢除的原理一同成了過去的東西。

女工和農婦的加入赤衛軍，首先是表現在軍隊的政治工作上，女黨員屢次在炮火下，在軍隊裏作政治活動。有時被任爲軍團革命軍事會議委員，她們除了做政治工作之外，也有做赤色看護婦和醫務員工作的。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

之中，會有六千以上的赤色看護婦被派遣出去，——都是女工和農婦。也担任軍隊中的通訊事務，並學習分配軍隊給養的工作。有時候，婦女更作爲赤衛兵而在戰綫上作戰，在士官學校會有過女學生（即在現在還有）。在陸軍大學有過兩個女聽講生。受軍事教育的，在一九二〇年已經有五千個年輕女工和農婦。無論那一種民衆運動，沒有女工和農婦活潑的協助，是不會成功的，女工和農婦幫助防止兵卒的脫走，收集武裝軍隊所必要的稅金，還在病院中照顧和看護赤衛兵。赤色戰綫的召集，在女工和農婦之間，得到了最熱烈的反響。有多數的女工們，特地被派遣在工業中心地的戰綫中。女工由於階級的本能，親切地洞悉到：婦女的真正解放，和一切的赤色戰綫的最初勝利之間有不可分的聯繫……但是勞動婦女爲了防衛蘇維埃共和國所建立的最大功績，却是激烈的內戰（它是鎮壓和反抗革命的一切對象的）時代中，她們所顯出的對大衆的援助的和積極的參加。

一九一九年白軍向頓巴斯和洛剛斯克進擊。同樣在一九一九年秋，但尼金和

紐賓尼基向赤色彼得格勒威迫。在最初的一擊，赤軍即能從白衛軍的手中把洛剛斯克奪還，這是由於女工和勞動者，從各方面大批的踴躍來參加的結果。當但尼金軍隊進擊的時際，托伏拉女工們的決議：「但尼金只有越過我們的死屍，才能到莫斯科去！」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這時她們在戰綫內擔負着挖戰壕和重要的通信連絡等各種任務。

當紐賓尼基進擊的時候，彼得格勒女工，參加防衛彼得格勒的工作，是一般人所週知的，已無用再說了，不知有幾千的彼得格勒女工們參加機關鎗中隊，或在電信隊和工兵中隊服務，在寒光秋色之下掘戰壕，在彼得格勒幫助裝置鐵絲網。女工們的特別功績，乃是作為監視隊，阻止從戰綫上脫逃的卑怯者和逃兵。她們手握武器，阻止着那些逃兵，喚起他們殉職的覺悟，使卑怯者自知羞恥，使他們重回到已經拋棄了的戰鬥部署中去。

女工和農婦在防衛共和國的工作上，雖然很重要，却只做了補助的作用罷。

了。至於在蘇維埃建設的許多領野中，婦女却是富有創造心和能動性的。這些只有清算我們革命過程的歷史家，才能夠公正地指出女工和農婦，是怎樣的具有許多創造心和活生生地實際的創造力，從事於對社會教育、母性的國家援助和保護工作。

假使婦女大眾對蘇聯政策的最初步工作不感興趣，不加以支持，那麼蘇維埃的權力，在這全般的經濟破壞時代，又缺乏必要的機構，在那麼短的時期內，能進行如此廣大規模的工作嗎？答案是很明白，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建設事業的突飛猛進，與婦女解放有直接關係，這是勤勞婦女大眾所首先明瞭的。這在許多婦女的成爲人民委員部的參與委員和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委員，以及在上級下級的蘇維埃機關的各方面工作等等事實上表現出來了。但是雖然這樣，以女工和農婦爲主的大眾們，從蘇維埃建設開始不久起，就注意到與自己勞動習慣相近而最容易理解的，且和自己天性最密切的問題——母性問題，



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婦女大眾們都在母性保護，社會教育和社會給養等各部門工作，在人家住宅中工作的婦女，是比較少數。在這時代的勤勞大眾，似乎還不能怎樣清楚地理解，由於住宅條件的更變，生活也改變了（雖則從婦女解放的觀點出發，在私生活方面，住宅問題的解決，其重大性是並不下於食堂的組織）。而且在這成爲一課的委員部開始工作的時候，曾經灌注全力專心把女工和農婦引入蘇維埃的建設方面去。我可以很正確地看到黨婦女部首先欲利用其集團的活動，使婦女在做慣了的部門中工作，此後再把婦女引入原來所不習慣的建設方面去。

從革命的初期開始，廣泛的婦女大眾就熱烈地改造經濟生活，使自己能從家族的隸屬之下解放出來。就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蘇維埃權力才能夠就其生活的領域內做出一個廣泛而大胆的計劃，即進行建設勞動國家的計劃。

男女的分工自然會引起的，婦女主要的近於處理下面的兩種工作。第一是

婦女們最接近最容易理解，而且和她們的天性有最密切關係的母性問題方面的工作。第二是和歷來在婦女之中，所感覺煩重的勞動習慣相結合的工作。在這裏女工和農婦不僅是男子的助手，且能發揮自己的創見。在國家建設的各方面，則由勞動者和農民做了主要的部分，婦女只分担了補助工作（不過也有例外的），但是，這樣的分工，却並沒有造成男女勤勞大眾利益的分裂，反而站在共同的不可分離的關鍵上產生偉大而正確的勞動計劃。

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就說婦女的能力，只能在和家政與養育孩子有密切關係的事業上去工作。相反的，我們知道女工和農婦在革命鬥爭上和建設上盡了很大的任務。蘇維埃共和國的任何計劃，假如沒有婦女參加是不能進行的。假使勤勞婦女大眾不很積極地參加，怎樣能夠和反革命、投機分子做執拗的鬥爭呢？假使女工和農婦不幫助動員計劃的實行，赤色戰綫的再度動員那裏可能呢？女工和農婦與流行病熱烈地鬥爭，不是對於保健人民委員會有極大的貢獻嗎？我國許多政

治經濟上的運動和經常的「週間」運動等，只是由廣汎的女工和農婦大衆活潑參加才成功的，這已是幾次銘記在我們的頭腦裏的事實了。而且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在獨裁時代，勞動婦女的勞力，由於她們自然發生的健全本能，以及爲了自己，爲了勞動集團而在新生活形態和新制度的建設上最有效地被應用着。由於革命經驗的教訓，使全體勤勞大衆的生活和健全的本能，正確地決定了自己建設的領域，這是可以斷言的。婦女在最有關係的部門中工作（社會的給養，托兒所，母性保護等工作），由此婦女常常要求支出最多的勞力，對革命的建設也貢獻了自己最大的勞動力。她們抱着對於建設完成最大限度的成功的願望，援助了整個勞動共和國。並絕對不像是布爾喬亞站在女權論的立場上，來宣揚空洞的男女同權主義；相反的却正確地理解着爲國家打算，並根據婦女肉體的特質，兩性間的不同和他們的優點與特性，在適合他們和她們間底共同目的，而分担着各自不同的工作。

合理的利用婦女的力量，使他們不做和男子同樣的工作，而保持母性的利益——這就是在勤勞大衆獨裁時代婦女勞動者的口號。

蘇聯革命的經驗，在別國的同志們是不可不學習的，勞動者獨裁時代的勤勞大衆，要想很迅速地建設新的生活樣式，不但要弄成巧妙地經營幹部——精通生產基礎的勞動者，女工以及赤衛軍的鬥士，——更必須弄成許多婦女勞動者，她們是新的社會主義生活的創造者，能夠巧妙的設立幼稚園、託兒所、公衆食堂，組織共同住宅，創造最合理的××家庭。勤勞大衆對於這種建設，沒有廣泛的婦女勞動大衆活潑的參加，是不能夠創造新的生活式樣的，因此，採取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婦女的問題，在一切國家的勞動階級看來是有重大意義的。在婦女之間的活動，已不僅是婦女勞動者的事業，尤其在階級鬥爭尖銳化，在不是枝節的改良，而是整個經濟和生活的根本革命問題的現時代，爲了公民生活戰綫的鬥爭和建設而巧妙的利用婦女力量這件事，是從普羅里塔里亞獲得政權起，即具有絕

大的政治意義，我們的敵人，也曾經嚴重的考慮過這一點。布爾喬亞政府發急起來了，或者是用政治同權，或者是用修正結婚法來作為禮物貢獻給婦女，想藉此唐塞婦女大眾方面的危險的批判和不满，這並不是偶然的。在婦女間的活動，必須常常從明確的原則出發，這原則就是男女勤勞大眾利益的同一，和運動上共同目的的相合流，但是附加於婦女身上的社會義務，從母性產生出來的婦女特質，是不得不考慮在內的。勞動國家不得利用婦女的勞動力；但是第一要把婦女引入最適合於婦女的習性，而產生最大效果的工作範圍中去。第二，婦女不但是勞動單位，並且是母性，這是不能忘掉的。婦女對於勞動集團担负着兩重義務，她們與男子同等工作，除此之外，還把新的成員，新的工作者貢獻給社會。所以勞動社會對於婦女不得不有特別考慮的義務。在獨裁時代我們不僅要獲得同權，而是堅決地要獲得：與擁護母性事業結合着的聰明的婦女勞動力，來合理地利用。

家族合處，家族間消費分不開的私有經濟制度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婦女被決

定了經濟上是非生產的勞動者，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解放是不能實現的，縱然布爾喬亞政府在形式的法律上是規定男女同權，而且還增添了若干好處，也是同樣不能實現的，只有在獨裁時代，婦女在經濟上生產上的職務已經根本變化以後，像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經驗所照示的那樣，婦女才能在社會生活中必然不可避免的成爲有益的社會活動家，這同時也創造了婦女解放的基礎。

在布爾喬亞世界內不能解決婦女問題，在蘇維埃聯邦中，一方面由於把婦女的勞動能力用到有益社會的勞動部門中，另一方面由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生活形態，才獲得了解決。女工和農婦痛苦疲乏於不自由和悲慘的「奴隸運命」中，於是她們發見了自己的血路。她們爲了生產和新的生活樣式的創造而愈多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和勞動，那麼時代所給與女奴隸的鎖鍊，就愈早解除。蘇聯革命在勞動婦女之前廣開了解放之門。現在的一切問題已成爲女工、農婦、職業婦女等自身是否認識自己的使命的問題了。基礎是奠定了，道路已經勘定了，指標已經樹立

了，剩下來的僅僅只有建設，建設，建設！

私有財產制的獨裁永久束縛着婦女，勞動者的獨裁——才使婦女自由！

### 參考書

- (一) ××黨在婦女間之活動
- (二) 黨的婦女問題的指令集
- (三) 勤勞大眾獨裁的三年間 (論文集)
- (四) 柯俞泰的女工農婦和赤色戰綫
- (五) 蒲基洛夫斯基的彼得格勒的防衛和女工
- (六) 桑莫伊洛娃的女工部組織的任務
- (七) 蒲洛尼娜的女工部的緊急任務
- (八) 柯俞泰的蘇維埃聯邦的女工和農婦







### 婦女社會科學常識讀本

沈志遠著 實價三角

本書內容包含哲學、經濟、以及社會形態之史的發展等諸問題，都以淺顯的文字和有趣的實例詳為解釋，是一本研究社會科學的最好入門書。

## 漢奸的子孫

尤兢作 實價六角

內有「忍受」，「夏夜曲」，「蹄下」，「神秘太太」，「回警」及「警號」等八個現實的獨幕劇。「漢奸的子孫」和「撤退，趙家莊」兩個集體創作獨幕劇。作者以他無比的熱情，最迅速地反映了活的歷史，以他深湛的體驗，正確地抒寫了現實生活的多方面。從本集子中的各個劇本，在各大雜誌上發表以來，各地戲劇團體紛紛上演，次次獲得最好的舞臺效果。上演的地域已經普遍到廣西，貴州和陝川各地的學校，村鎮和兵房。其中的一回聲，「警號」和「漢奸的子孫」等劇已各有二十餘次之多的上演紀錄。由作者根據親自導演過的經驗，多位劇作友人的意見，並參攷了各地的上演情形，加以修改和訂正後編成的本集，是國防戲曲運動中最先出世的一部力作。

### 社會科學研究法

(青年自學叢書) 四版 平心著 實價三角

### 社會主義講話

山川均著 再版 徐懋庸譯 八角五分

### 社會科學論文選集

平心等著 實價四角

### 民族問題講話

(青年自學叢書) 再版 吳清友著 實價三角

### 中國娼妓史

王書奴著 再版 實價一元

生活書店發行

0.45  
婦女活叢書  
廿六年三月二日

二之書叢活生女婦

# 新 婦 女 論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 著 者	A. M. Kollontay
譯 者	沈 玆 九 瓊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一 月 初 版

活生



\$0.60